

第一章 童年的噩梦

他差点成了“不准出生的人”

红卫兵闯进了民主道 58 号

九岁男孩成了操持家务的“高手”

世纪疑题：冯国璋历史上的功与过

冯巩是冯家冯海岗这一支系的“关门弟子”。

他差一点就被关在了进入人间的这道狭门之外。

1957 年，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是沉重的一年。

偏是在这年头，冯巩这未来的笑星在母腹中躁动，乐呵呵地要来“闯荡世界”了。

可是身为父母的冯海岗、刘益素两位年近四旬的知识分子却作出了“不许出生”的决定。因为他们已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加上各自都有工作，抚养和教育四个孩子已经够他们劳累的了。

他们商议将三个月的胎儿作引产处理。

某日上午，这一对夫妻便提上一兜日用品去了天津市河北区妇幼保健医院。因为，前些日子已和医生约定，床位早安排好了。

医生来了，却是一脸歉疚的微笑：对不起，你们预约的床位，因临时须安置一位重病人，暂时没有了，请晚几天再来。引产嘛，拖几天也误不了什么事。

夫妇俩只得打道回府，心里有些不愉快。冯海岗见妻子面色沮然，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来你肚子里这位还想赖着出生呢？”

刘益素看了丈夫一眼，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腹，似乎感觉到了胎儿的心跳，母爱之情油然而生，轻叹一声，“也许是该让他（她）出世呢。”

此后，两夫妻就不再提上医院引产的事了。也许没人知道，正是这个赖着不走的胎儿“掩护”父母躲过了“反右”这场暴风骤雨呢。

冯海岗在单位工作不顺利时，偶尔会发发牢骚。那几个月因妻子怀孕，家中事务繁多，厨中的柴米油盐，妻子儿女的衣食住行，天天忙得焦头烂额，哪有闲暇去考虑“给党提意见”这样的大事？思想上一“偷懒”，居然让他逃过了反右飓风。而当教师的刘益素本来就不爱多管教学以外的事，怀孕中后期，即反右运动进入最微妙阶段时，已请假在家休息，正好躲过了那场风暴。

这样，当 1957 年 12 月 6 日这天，排行第五的小儿子降生后，冯海岗、刘益素夫妇不觉四目相视，都露出了一个宽慰的笑意。但笑后又是一阵惶然。窗外北风凛冽，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还未停止。他们的许多同事、亲友都成了被点名批判、人人喊打的右派分子。就拿这家医院来说吧，原先熟悉的几位技术精湛的医生已都挂上了右派的头衔，连手术台都不让上了。

冯海岗给小儿子取名为“巩”。其意源于《楚辞》中“心巩巩而不夷”那句诗，乃心绪郁结、黯然神伤之意。

天津市民主道 58 号，一幢不很起眼的欧式小楼。

只是到 80 年代初，冯巩和父母兄弟姐妹们重新走回这幢曾留下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受辱印痕的楼宅，他才闪烁着充满情感的眸子，细细地将整座楼房端详了一遍又一遍。

在生命的头十个年头，他曾是那样天真快乐，无忧无虑。他是最小的孩

子，自幼便特别受宠，爱撒娇，七岁了还整天嚷叫着找母亲的乳头吮吸。快十岁了，不挨着母亲睡不着。

民主道 58 号楼宅，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冯巩从小就在欢声笑语中成长，父母和兄姐都喜欢他，溺爱他。因为他最小，又聪明可爱，小嘴又甜，最爱学人样学人话。有时哥哥做个有趣动作，叔叔讲段新奇故事，小巩看着，听着，而后一学一做，竟维妙维肖，逗得全家直乐。两个哥哥下国际象棋，他在一旁看了几回，便吵着要跟哥哥下棋。对弈了几回，嗨，竟赢了哥哥两盘，那时小巩才四五岁呢！

民主道是个热闹街道，有一群和冯巩的年龄相仿的儿童。大家聚在一堆玩过家家、抓特务。点将挂帅的，总是小巩。有一回刘益素放学回家，见冯巩正领着他的小伙伴在做操练游戏，便悄然站在一旁瞧他们玩。瘦条儿的小巩往台阶上一站，学着古装戏中元帅点将的模样，亮着尖细的嗓门吆喝一声：“众将有官，听令！”

做母亲的一听乐了，“小巩，你嚷什么？”当着主帅的小巩兴头正浓侧脸看看“捣乱”的母亲，不再理会，仍虎着脸大声重复一句：“众将有官，听令！”

他母亲笑道：“这可错了。应该先喊‘众将官’，下面应‘有’，你再说‘听令’，懂了吗？大元帅！”

小巩听明白了，在“众将官”面前受母亲的教诲，有些不好意思，咧嘴一笑，转身又颇严厉地对着“众将官”吆喝起来。

可惜，如霞的童年时光却让“文革”的飓风给刮散了；又像一张充满奇思异想的七彩画儿，给突如其来的野火烧着了，顷刻间化为一缕缕细微的青烟，缥缈不散……

“文革”的狂风巨浪，给一个不满九岁的孩童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似乎是一夜之间，天津整个城市就变成了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战场。大街小巷，从早到晚，从夜到明，只见一支支步伐雄健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人们喉咙嘹亮，神情激昂，胳膊上套红袖章，胸前挂红像章，面色涨得绯红，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革命”。他们把“反动路线”上的走资派一批一批打倒斗臭了，又开始寻找新的冲击目标。于是，扫荡残渣余孽的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

初秋的一个下午，一大群身着旧军装扎着军腰带的红卫兵高喊着口号闯进了民主道 58 号楼。“打倒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打倒反革命分子冯海岗！”“打倒资产阶级分子刘益素”……在阵阵口号声中，造反者在屋内翻箱倒柜，砸杯摔碗，声称要找出藏匿在室内的反动罪证。

整洁安谧的住宅被翻搅得乱七八糟，可是并没有什么“反动罪证”。一个造反派头头抓起冯巩玩过的一支塑料射水手枪，猛然大喝道：“冯海岗，你老实交待，家里藏了什么武器？手枪，还是匕首，有没有发报机？不老实坦白、低头认罪，决没有好下场！”

冯海岗心里嘀咕，是的，我家从前买过武器，但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父亲捐送给好友张学良将军，用来抗日的，现在清平世界，我们何必藏武器……但此刻解释无疑是火上浇油。他缄默不语，木然呆着不动。一旁的刘益素轻声道：

“我们都是普通职员，怎么会有武器……”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愤怒的红卫兵

喊着口号，拥上来按他们的头，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和木制挂牌。“把反革命分子押出去游街示众，斗倒斗臭！”

这些红卫兵来自附近的第三十中学，是些十五六岁的初二学生，他们似懂非懂的头脑里胀满了造反的热情。他们将自己所有的才智和学识用来对付被“左”倾思潮认定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使出了无情的手段。

足足半个多月，住在民主道 58 号的冯姓人，就像被驱赶被任意宰割的牲口，任凭红卫兵小将们训斥、辱骂、殴打。

那些天，不满九岁的冯巩，如受惊的小鸟，整天蜷缩在楼道边一个最暗的角落里，战战兢兢。往日嬉笑不息的小脸上，一双无忧无虑的眼睛流淌着痛苦伤心和困惑不解的泪水。

这是怎么啦？咱家人到底作了啥错事坏事？让人家这样折磨凌辱？爸、妈，你们怎么都不敢申辩？咱冯姓人家真的都是坏人吗？就连吃素念佛的太奶奶，连从小就瘫了双腿的七叔也有罪吗？

民主道 58 号楼宁静温馨的生活气氛被彻底打破了。冯家的保姆被撵走了，冯巩的大姐冯幸耘年初即赴西北支边，已与家庭中断了联系；读中学的大哥冯信被环境夹迫，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离家出走了；二哥二姐也承受不了压力，除了偶尔到家觅食充饥之外，其他时间都躲在外边流浪；只有小冯巩陪伴在饱受凌辱的父母身边。

狂风暴雨一旦降临，小小年纪的冯巩从此结束了他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在父母整天挂牌游街挨批斗的那些天，他这个不满九岁的小儿子竟自动承接了维系家人生存的重担。他开始学着做饭，干家务。凭着以往看大人们干活的印象，他放开手脚干起来。和面，粉和水比例难调，粉多了他就掺半瓢水，水多了，又添点粉……揉着大块的面团，一双小手又酸又痛。那面团还不肯听使唤，滚到地上，他慌忙捡起，把触地的脏兮兮的一层掐下来，再揉。蒸馒头不知道要放酵母，蒸出的是实心面疙瘩；后来懂得放酵母，又没放碱，蒸出的馒头有酸味……还有买菜、拣菜、生炉子、煮饭、炒菜、洗衣裳，等等，一道道繁杂的家务程序，这九岁孩童竟承受下来了。

这真不容易呵！

人有着本能的生存愿望。当一切依靠和扶助都失去时，会产生超常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肚子饿了，要吃饭，没有照应，只能自谋出路。对冯巩来说，1966 年 8 月，是他生命历程中第一个重要转折点：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

九岁的小男孩初次在艰涩的人生道路上展现自己的生存能力。

同时，作为后来杰出的艺术人才，即使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中，依然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

住处离他家不远的马阿姨，是邮局职工，爱唱爱跳舞，那时她组织了一个全由孩子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到街上去作宣传演出。马阿姨早已看中冯巩的表演才能，办宣传队对吸收了他。

一大群孩子聚集在一起，又是唱又是跳，多热闹，多开心呵！这比孤零零缩在家里熬日子的生活不知强多少倍呢。

在马阿姨的宣传队里，小冯巩如鱼得水，成了一名骨干。他很快就学会了流行的语录歌，还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许多首毛主席诗词。他还自做了不少演唱用的道具。弄来圆木一捣鼓，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打击乐器“沙巴依”；取张竹片一锯一削，就是一幅快板。在马阿姨的带领下，冯巩和小

伙伴们走街串巷，打快板，背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走一程，唱一阵；走一天，唱满街。每每到了傍晚天暗时才浑身汗水，口干舌燥地回家来。

等他走近民主道 58 号，见着暮色之中寂冷无声的家门，想到又将看见父母的满脸忧愁，小冯巩的全部兴奋和快活像被骤然冻结了一般。

小冯巩忽然心生一股无名的怨恨。恨面前这幢灰白色的楼宅，恨它给家人给父母给自己带来这么多惊吓和耻辱。

他想起前些天，不知哪位哥哥朝着父母恨恨地怨道：“咱家要不住这楼，也就不会招来那么多人恨咱家。生活在这鬼地方，真要倒一辈子霉了……”

他真想跟爸妈说：咱搬到别处住吧。这楼房谁爱住，让谁住去。

事隔 20 年后，民主道 58 号这幢楼宅，按照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的文件，正式命名为“冯国璋故居”，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追溯历史，这楼还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奥帝国的纪念性建筑呢。

民主道，从前称作“河东二马路”。早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打仗打败了，忙不迭割地求和，天津作为北方最大商埠，自然是列强们争夺的一块肥肉。二马路一带便是德国的租界，由德国巡捕管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当时的军政首脑们只顾打内战，对加入协约国同盟兴趣不大，议会讨论起来也是争争吵吵而已，一直拖着连一份宣战声明都没发出。

1917 年 7 月，冯国璋代替辞去总统之职的黎元洪，就任民国代总统之职，8 月 1 日从南京抵达北京。8 月 3 日即与有关人士商讨对德宣战事宜，8 月 14 日正式发布了对德奥两国宣战公告。到了 10 月就着手派兵去欧洲作战了。

对德奥宣战不久，德奥两国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和特权就开始收回了。天津河东二马路一带撤了德租界后，身为总统的冯国璋为了表示对德宣战的决心，就决定在原德租界建冯宅，买下了河东二马路靠近海河边的一块地皮，并开始修建，1918 年，德奥轴心国不敌协约国同盟而宣告战败。其时冯家楼宅也将竣工。而当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冯代总统也被他的老同学老对手段祺瑞撵下了总统宝座，举家迁到天津河东二马路新建的冯宅当寓公了。

中国当时的军政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实算不上有多大功劳，就连宣战也拖了很久。倒是冯国璋上台后立即发表了宣战公告，因此无论怎么说总算捞回了一个“战胜国”的美称。另外，冯国璋把住宅修在决意收回的租界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姿态，是勇为士先的爱国举动。

冯家的这位老前辈不曾料到，他引以为自豪的这幢楼宅，几十年以后会冠以“黑窝”的臭名，而其子孙后代则因此获罪。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采用了功利性的评判方式。有利于我者，奉若至宝；不利于我者，弃若粪土。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曾充塞于我们的文学作品、戏剧、教科书甚至历史类学术著作中。

近些年来，史学界已陆续对过去一些偏激甚至错误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重构，其中也包括对中华民国初期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判。

对冯国璋，这一位在民国初期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从有利于或者有碍于社会和历史进步这一基本原则出发，目前史学界大致有几点定论：

冯国璋曾依附于袁世凯，帮其训练新军，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时，又作为清廷和袁世凯所委派的先锋，攻打革命武装；“二次革命”期间又一次镇压了南方的进步力量。这是冯在历史上的劣迹。

但冯国璋也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他原是一个书生，在西方列强猖狂侵略和掠夺中国时，投笔从戎，有志于驰骋疆场，也属进步的开端。他是中国最早接受资产阶级军事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后执著于军事教育，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军事，遂奠定了军事救国的目标。在日本考察期间还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军事操典书《新军兵法操典》。袁世凯小站练兵，其实靠的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人。为用新法操练士兵，他们又合力编著了军事教科书《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共 22 册。此书由冯主编并撰写内中主要篇目。冯国璋在我国近代军事教育上是有功绩的。他曾先后主持或创办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经理及军械学堂、陆军贵胄学堂、王公讲习所、南京陆军讲武学堂、陆军警察学校等十几所军事学校。他培养的军事人才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李鸿章和袁世凯。蒋介石、张群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并经他保送赴日本留学的。因此冯国璋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军事教育家。

冯国璋的另一功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张勋复辟，冯的一生荣辱与袁世凯密切关联。袁对于冯国璋来说，最早是“明主”，有知遇之恩，所以冯早期随袁镇压义和团，攻打武昌城、南京城等，都全力以赴，无条件服从。但当袁称帝时，冯国璋深知袁此举实在不得人心，是社会大倒退，遂下决心站出来反袁，联络各地起事。而后张勋复辟，冯与张关系原很密切，为结拜兄弟，但对此事他明确反对，并兴兵讨伐，维护了共和体制。这些都是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表现。

因此，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个有影响的军事首领和政界人物，有功也有过，不能一概而言地称之为“反动军阀”，谓之“代表着反动落后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等等。

然而，从建国到“文革”，在我们的历史书和教科书上，冯国璋总是作为反动阶级的代表和腐朽凶残的代名词出现。鉴于这种令后代胆颤心寒的现实，冯家通常都缄口不提冯国璋三个字。即使问起，只要不是命令式的，也多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回避了。

要不是“文革”爆发，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左一个“冯国璋”，右一个“反动军阀”的字眼闹得沸沸扬扬，冯巩还不知道自己有过那么一个官位显赫的曾祖父。也难怪，八九岁的孩子，天真单纯着呢。父母和长辈们从来不提起曾祖父，堂上挂着的像框内是祖父冯家遇的遗像，清明扫墓祭祖，只到祖父的墓前磕头，说声爷爷保佑我身体好学习好长大有出息……哪会想到有一天竟冒出个让众人骂，又使冯家后人吃苦受辱的一个“反动可恶的”曾祖父来呢？

九岁的男孩痛苦不堪。他开始暗暗仇恨起那位从未谋面的曾祖父了。有一次一位好事的同龄男孩故意找了一本里面有一张冯国璋半身戎装照片的书，笑着说：小巩你看你看，这里有你太爷爷呢。小巩眼光扫过一下，见那是个半秃脑袋留两撇仁丹胡子的老头，猝然心里一阵战颤，辨不清是恼是羞是怜是喜，忙用手把那书推开了，嚷着：“我不看我不要看……”那天他闷闷不乐地坐在海河边的堤石上，直到天已全黑了，耳边传来母亲一声声焦急的呼喊，才拖着两条滞重的腿往回走。

他不想回家，不愿意看见那幢楼，一心巴望着能搬出民主道 58 号。他想，到哪儿也比住在这儿强！

没料到，不久，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帮”他实现愿望的是那些“革命造反派”。他们觉得，既然革了反动分子的命，横扫了牛鬼蛇神，那么还让那些“社会渣滓”住在楼宅里，依然过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岂不是白白革命一场？横扫，就得毫不留情，不留一点余地，非得把他们横扫出家门不可！

于是，也不知令从何出，冯家人被勒令，限某月某日前全部搬出民主道58号楼，违者以反革命论处。

当冯巩从愁眉不展的父母那儿得知此消息时，竟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他在床上躺着，睁着两眼想象着新家，那会是怎样的一幢屋子，那儿大概不会常有凶狠的面孔闯进大门吧？那儿也许没人知道他有那么一个“反动可恶的”曾祖父吧……

新家，在大昌兴胡同20号。

第二章 艰难的人之初

新家是一间仅 12 平方米的破屋，却成了冯巩的“世外桃源”

11 岁的男孩做了巧木匠

冯海岗成了老家不受欢迎的人

诗经村的美丽传说

少年冯国璋的读书生涯

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

大地之子安泰幼年的故事，流传很广。

安泰出生时就被巫师抢走了。因为会料算的巫师知道安泰长大后会成为力大无穷的好汉，成为反抗邪恶的领头人。

巫师想了个毒招，雇了个丑恶无比的胖婆娘照看安泰这婴儿，囑言她无论如何不能放孩子双脚落地。

胖婆娘遵命日夜督管着孩子，从不肯闭一闭眼打个盹。她用藤条结了个大筐，把渐渐长大的安泰放在筐内，然后扛在肩背上，整日地扛着安泰走来走去，不让他双脚沾地。

胖婆娘又高又壮，站立着身躯就像一座小山，被关在藤筐里的安泰望望离地面那么高，想下来玩也不敢呢。

巫师自以为得意，便对安泰母亲说：“你生出个力大无穷的儿子也没用。他将永远是我摇篮里的一个婴孩，一个长不大的废物蛋！”

安泰母亲又气又急。她想要提示儿子识破巫师的毒计。怎么办？她就托梦给安泰，告诉他，孩子，你已是一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只要你双脚一落地，就可以打败所有的对手。

睡在藤筐里的安泰醒来后，就对胖婆娘说：“你放我下地吧，我想自己走路。”可那丑恶无比的高大女人狞笑着说：“想下地，除非你自己往下跳，摔断了手脚腰背可怨不得我呵。”

安泰真有点怕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而且他的脚还从来没落过地，万一……但他相信母亲的话，决心照母亲说的去做。他就从高高的藤筐边往地面上跳。果然，脚一落地，他马上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成了举世无双的勇士。

大昌兴胡同 20 号，虽说离民主道 58 号不远，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生存世界。

这个大杂院是个典型的“贫民窟”。墙垣砖石颓败，门窗吱咯作响，没有一间不漏的屋，没有一处平整的地。就是这么个破杂院，竟挤住着 30 几户人家。这些人家大多数是从山东来天津谋生的，拉板车做泥工当木匠打短工扛零活，混得最好也就是瑞蚨祥等八大祥店铺里当店员。

1968 年寒冬的一天，冯巩和二哥冯达跟随母亲携带几件简陋用品，走进了大昌兴胡同 20 号院。他们的“新家”是一间仅 12 平方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破旧屋子。

这里不再会有民主道 58 号楼内的雅致、宁静和舒适，更多的是嘈杂、陌生口音和拥挤感。但这里也有普通劳动阶层的朴实、直率，还有在当时极难得的关切和热情。

尽管外面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大杂院内却如“世外桃源”，没有人去理会“阶级斗争”。他们该干啥还干啥，每天有规律地出门干活，回家

吃饭，上炕睡觉，生活过得很实在，也很安逸。大杂院像是一方超凡脱俗的净土。

冯巩在这个大杂院度过了生命历程中最艰难，然而也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一段日子。

当事业有成时，冯巩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是大昌兴胡同教会了我怎样面对生活，面对困难；没有那个大杂院的磨砺，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20世纪60年代末，冯家境况落魄到了极点。

几代人下来，尽管宦海沉浮，人世沧桑，家境时好时坏，但从未到过捉襟见肘的地步。

那年冯家的经济帐目如下：

冯海岗被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后，工资停发。全家八口人吃穿住花全部费用靠刘益素当中学教师的79.50元工资。每月须给在河间诗经村的冯海岗寄20元；再扣除15元，补交民主道58号楼被没收后居住两年所欠的510元房租；余下的40多元，要接济远在东北和陕西下乡的三个儿女，以及一直由他家负责照料的瘫痪人七叔冯海峨，剩下的才是冯巩和二哥、母亲的生活费……这点钱哪够开支呵。常常没到月底钱就没了，母亲只得寻件旧家当去贱卖了，以弥补全家的窘境。

真难呵，昔日“京东第一家”的刘家大小姐，早年辅仁大学数学系高材生，而今人民中学堂堂正正的优秀教师刘益素，面对空荡的食厨和凉锅冷灶，不得不为一块钱二斤粮票给孩子买点吃食充饥而含羞忍辱地出门借贷。

可是，即使告借也未必就一定借到呵！人家也要看你将来能还不能还，掂量一下值得不值得做这件或许是有出无进的好人好事呢。

六姑冯坤是位善心人，看着小巩哥儿俩日子太苦，就时常将自家吃的穿的拿来，或是揣两块钱几斤粮票来接济一下。那年头还得小心，生怕让人瞧见，怕戴个“与阶级敌人暗中勾结串联搞阴谋”的罪名，每次来看小巩都不敢进屋，躲躲掖掖地沿着墙跟走近冯巩家，轻声呼小巩过来，慌忙将所携之物往他手里一塞，就赶紧逃跑似地离去了。

如今，每当提到此事，冯巩眼前似乎还晃动着六姑匆匆离去时一晃一晃的身影。那时冯坤家的经济也不宽裕，她每次来送东西，连五分钱的公共汽车票都舍不得买，硬是一站一站走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淡忘了，唯有那难得的撑圆肚皮的一顿晚餐，冯巩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1969年深秋的某一天，二哥冯达高烧发热卧床不起，冯巩翻双杠把头摔了个小窟窿，血流不止。哥儿俩头对头躺在床上，饿过了中饭，又捱到了天黑，灶锅是空的，柜里没一点米面。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母亲才回家。整个白天她都带学生出外搞“拉练”去了。作为一名班主任，她心须拖着冠心病和高血压的身子随学生们到野外去“练好铁脚板，踏死帝修反”。顶风冒雨长途跋涉，走了百十里路回来，累得浑身骨头像要散架似的。却见两个儿子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病的病，伤的伤，不禁心痛得泪水直落。她忙转身买来几个大馒头，一捆白菜和一包咸菜，煮了一锅菜汤，母子三人掰馒头就菜汤，饱饱地吃了一顿，这一餐足足花了三角多钱，是迁居以来从未有过的奢侈享受了……

那几年，冯巩和二哥都正值窜个头的年龄，但家里哪有钱添置衣物？冯达的衣裤是接了一截又一截，补了一块又一块；冯巩则顺理成章地当了哥哥

破旧衣裤的“新主人”。

寒冬腊月怎么熬？母亲找六姑相助，把棉被拆了，用手工给哥俩做了两条又厚又笨的棉裤。冯巩眼馋别的同学都有流行的绿军装，做梦都想有一件，当妈的就想法将白被套染成草绿色，裁制了一件“绿军装”……

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没有扭曲少年冯巩纯真的心灵；人世间的寒暑风霜，更磨炼了他顽强生存的韧劲。

母亲是他第一位也是最好的老师。母亲的话他句句听，母亲的每一举动都影响着他，教育着他。

从民主道 58 号楼一迁进简陋破旧的屋子里，面对窗口呼呼刮进来的凛冽寒风，母亲爽朗地和两个孩子开玩笑：“好凉快呵，小达小巩，咱就像到北戴河疗养一样呢！来，过来看看窗外有啥好风景，没窗玻璃更看得清呢……”而后三人一起乐呵呵地把破窗用厚纸糊得严严实实。

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冯巩从没听过母亲的抱怨声或长吁短叹。她时常告诫哥儿俩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再苦的日子，只要适应了，就不觉得苦了。”

母亲说的这些话，冯巩一直牢牢记着。

在生活的最底层，一切伪装和矫饰都不需要了。大昌兴胡同 20 号院内，那些不懂得“革命原则”的齐鲁汉子和婆娘们，有的是豪爽、正直，和热情助人的秉性。

他们对新搬来的“反革命家属”母子三人毫无忌讳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见那屋没生火炉，孟大妈会自动进屋去捣弄炉膛；瞧那小哥儿俩中午了还饿着肚子，黄大娘笑呵呵送来一碗饺子，让两人分着吃……什么“反革命”，俺可只瞧着这娘仨过得挺苦挺难的，不帮衬着点那还是个人吗？

冯巩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家新天地。他马上和院里的孩子混熟了。冬天他用螺丝把旧冰刀固定在木板上，制成“冰鞋”，和小伙伴们上海河滑冰；夏天则玩弹球，砍木头，到海河里游泳，一泡就是大半天。家里缺烧的，他挎个篮儿和小伙伴上工厂的煤碴堆里捡煤核，半天就捡回来一大篮呢。

大杂院的大人孩子都喜欢冯巩的聪明、机灵和懂事。他敬重长辈，小嘴“大爷、大娘、叔叔、姑姑”满院地叫。谁家缺水，他会帮着拎；哪家炉中添煤，他帮着去铲；有事要传个话，他拔腿就去了……

院里有位韩世明大爷，有一手好木匠活，走南闯北一辈子，经事多了，见的人也多了。他最喜欢冯巩，常带他去钓鱼、打猎，有几回看冯巩喜欢瞅他做木工活，便存下心，对刘益素说：“刘老师，小巩这孩子特有灵性，不比一般孩子，长大了准能有大出息。我眼光不会错的。让他跟我学点手艺，日后也能有点用的。”

刘益素点点头，“行，就让他跟你学。”

小巩真的认真地学起木匠了。锯、刨、砍、凿、拉线、上梢，在韩大爷的指点下，居然能做出家具了。不久，12 平方米的陋室里就摆上了 11 岁小木匠做的小桌小椅，还有小书架、小板凳……

大姐冯幸耘在大西北戈壁滩上当“农垦战士”，日子苦得不行，连老鼠都穷凶极恶，半夜敢跳到床铺上打闹。小巩为让大姐能睡个安稳觉，找些旧木料打了一只拉盖门的柜子，大姐收到不满 12 岁的弟弟送她的礼物，激动不已。20 多年过去了，大姐现已调回天津工作，新家具添置不少，但唯有这只木柜她仍珍藏着。她常对人说：“这是在我最艰难时，小巩送我的，什么好

家具也抵不得这只旧柜子！”

冯巩的一双小手确实巧，父亲冯海岗在河间乡村“劳动改造”，陋室内的破铁炉没烟囱，屋里整日烟气弥漫，人被熏得呛咳不止。冯巩听父亲这么一说，即将两块马口铁的炉档板拆了，铰铰剪剪，敲敲打打，硬是做成了六节烟囱，让父亲带回乡下用。

1968年底，冯海岗被遣返原籍劳动改造。

原籍河间县诗经村，对他来说，宛如天边外一缕即逝的云丝。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印象。

1919年12月冯国璋在京病逝。在一片悲戚声中，冯家遇的第三子冯海岗出生了。其时冯家人忙于处理前冯代总统的丧事，对这个不适时降生的第八孙不屑一顾，只有生母悉心照料着。

冯国璋的葬事隆重非常。在灵柩出京运返故乡河间时，整个起杠祖道仪式阵营宏大，震动京城朝野百姓。据1920年2月3日《晨报》记载：

上午八时起杠，出帽儿胡同西口，经地安门大街，沿东皇城根向南，入安定门大街，经大佛寺前，八面槽大街，王府井大街，转西经东长安街，经过宗人府夹道，往南经户部街，过中华门，出正阳门，转西至西站，上专车。沿途经过各街道均铺黄土，各机关搭祭棚二十馀处，市民观瞻盛仪为之塞途。灵前仪仗甚为威武，其仪仗次序：首为步兵一连，骑兵一连，海军陆战队一连，军乐队全队，保安队一连，游击队一连。次则为松柏狮鹤人物和各要人及部下之祭旗祭伞约三十馀对，花圈二十馀对，又花亭八座，内有冯公遗物如衣服、刀剑之类，次为神主亭，再次为僧道两班，客亭一座，冯公生前乘马一匹，魂轿一乘，又次之则为孝子及执绋者约百馀人，细乐一班，柩后随有眷属亲戚送殡之素轿四乘，马车十馀乘。仪仗之盛约延长二里，行至车站已下午一时，换十六杠上车。二时开行，步军统领王怀庆代表大总统送至保定。

次日，灵柩由保定车站起杠入西门，出东门，直至诗经村方向。曹錕派马队一连护送河间金棺。送行至河间者各机关一人，与冯公私交极深而送到原籍者有王克敏、冯耿光、师景云等三四个人。

又次日。灵柩安抵诗经村，落杠奉安祠内。

尚未面世的冯海岗在母亲腹内随同送葬亲友队列出京城至河间老家。父亲冯家遇则在灵柩前执孝子礼，心境悲戚之中还夹有几分难以言喻的忧愁。大树既倒，往后的日子必然会有极大变化，尤其在此国运不济、战乱频仍的年月。所以冯家遇对在父丧期间出生的第三子没有多大兴趣。

按冯家族规，父亡，孝子须丁忧六年。所以冯海岗自落炕到六岁，即1920年至1925年，在河间老家，度过了他的稚童时期。待父亲服丧期满，一家人便搬出诗经村，到天津定居了。

冯家的直系亲属此后陆续都离开了河间老家，绝大多数住在京津两地。

到后来，故宅除了管房子和管祖茔的，竟无一个后辈在那儿长住了。

几十年过去，故乡故土对于冯海岗确实早已十分陌生。解放后由于政治原因，冯家后人未能获准回乡去祭扫祖坟，而故宅田园自然也早就分给了别人，冯家后代就极少有回故里的了。“文革”初期，冯国璋及冯家祖坟被造反派粗暴地破坏了，冯氏后人就更不愿回去了。

谁能料想，到了60年代末，年近半百的冯海岗，竟又被“革命者”发配到故乡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诗经村那位 30 来岁的革委会主任摇晃着脑袋，拒绝承认冯海岗为本村人，“谁是冯海岗，咱村有谁认得？咱诗经村没这人！老天爷，咱村人够多了，够穷了，还让添个半老头来争食吃？这可不行了！”

遣送冯海岗的人再三强调遣返“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的政治意义和迫切性，又答应补偿给村里 600 元钱。

600 元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那位主任这才算勉强点了头。

诗经村，这个位于冀中平原中腹之地的村庄，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许多优美的传说。

相传秦灭六国后，焚书坑儒，欲将非秦正统的文化遗产全部抹煞。当时山东曲阜有毛亨兄弟为躲杀身之祸，逃进深山隐居，博学多艺的毛亨靠记忆辑录了《毛诗》廿九卷，《诂训传》三十卷。《毛诗》即以后流传下来的《诗经》。

毛亨无后代，其弟毛萇仅粗通文字，以务农为业。幸有侄儿毛萇聪明过人，五岁便跟伯父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七岁学《毛诗》、进而学《诂训传》。成人后娶妻，生一女名文倩，亦聪慧过人。

这年山东境内忽然流行瘟疫，毛氏族人多被夺去性命，毛亨也染疾将死，临终前把侄儿毛萇叫到床边，嘱他赶紧离开此地，找一个“福地”去向世人传播《诗经》。

毛萇遵伯父之言，赶着一头老牛拉着破车，载着相依为命的女儿文倩，离了山东境地，一直往西北踽踽而行。父女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某日来到旧赵国东北部一个叫尊福的地方。毛萇听说叫“尊福”，心里猛然一动，对女儿说：“你爷爷说找福地，这尊福可称得福地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于是他们就在尊福安了家。

由于毛萇博学多才，精于《诗经》，被村人聘为塾师，继而便声誉远扬，各地好学之士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

尊福东南八里外有东西两村，风景秀丽，民风敦厚，经常邀请毛萇去讲《诗经》。毛萇经常在弟子们陪同下外出闲游。一次游至东村正东五里之外的古洋河畔，看到古洋河西侧一块河荒地处长着一片稀疏的树林，从远处望去树林如长在一个大浅盒底中；当人们步入树林向四周望去，又像立于土丘之上。毛萇不禁赞叹道：“好境地，好境地！此乃一条古沙龙盘踞之地，沙龙终有腾飞之日。”后人便称之为黄龙湾。过了 1500 多年这里成了冯家的祖茔地。当地人便说，冯国璋之所以能够当上大总统，是因他家祖茔地是块风水宝地。冯国璋逝世后亦埋在祖茔地里。

东西两村为纪念毛萇在此传授《诗经》，便把村子更名为东、西诗经村。冯国璋就出生在西诗经村。

毛萇在尊福讲学数十年，老时已双目失明。其女嫁与本乡赵姓书香人家为媳，见父亲双目失明，她便毅然继承父业开办讲诗学堂，以后人们为纪念毛萇父女的崇高文德，便改尊福为崇德。因该村距县城 30 里，又俗称三十里铺。在毛萇卒葬之地，后人修建了毛公祠，并建起毛公书院，“戊戌变法”后称毛公学堂。

冯国璋的家世，可谓渊远流长，据《冯氏家谱序》记载“爱考冯氏派出毕公。夫毕公周文王之长子，封于冯地，故姓冯……累朝显达尤盛，如汉光武时冯异称为大树将军，明太祖时冯胜称为宋国公，其最显然者也，岂非皇族哉。”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冯氏始祖冯禄自安徽省奉命北迁，长

途跋涉达四年之久，才定居于现在的西诗经村。

明清年间冯氏家谱曾两次遭兵火，其中一段无法补续。现存的《冯氏壹支家谱》仅能确定以三世祖冯禄为此支的第一代祖。相传至第十一代，形成西诗经村有名的冯家东西南北四大院。冯国璋的祖父冯丕振是正南院。冯丕振是晚清的一名太学生。

冯国璋之父冯春棠，青少年时代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童生，但其秉性过于刚直，脾性失之暴烈，在一次参加乡试时，当他把写好的卷子装入号筒时，被一名考生泼洒墨汁脏了卷面，他顿时火冒三丈，伸拳就打。两人竟在考场殴斗起来，结果双双被主考除名。冯春棠一气之下，就此废辍学业，不求仕进，自甘堕落，整日嗜酒无度，挥金如土，将一份殷厚的家业折腾得所剩无几。

冯春棠娶三十里铺孙氏为妻。孙氏是个贤慧女子，对丈夫放荡无羁自甘消沉的生活很痛心，经常耐心规劝，同时尽力勤勉持家，但终究挽救不了日趋败落的家境。

冯春棠与孙氏共生四子：长子佩璋，次子蕴璋，三子琥璋，四子国璋。夫妻俩便把家业中兴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谆谆教诲儿子苦读仕进，耀祖光宗。

长子佩璋，天资聪敏，曾中廪生，是附近有名的刀笔手，但身处衰落的家境之中，又有父亲那般坏习气，渐渐走上不务正业之路，调词架讼，追欢取乐，玩走马，养戏班子，邪门歪道无所不为。

次子蕴璋，字达廷。仪表堂堂，学业优异，曾考中拔贡，候选州判未果。

三子琥璋，字汉符，庠生。

四子国璋，字华符，生于咸丰八年十二月四日，即公元 1859 年 1 月 7 日，据当地人传说，其母生他的前一天夜间，梦到一个明亮的大星星飞入她的怀中。春棠为此十分高兴，认为此子是星宿下凡，将来必主大贵，故名以“国璋”。

冯国璋因排行第四，故乳名四儿，生得身材小巧，聪明乖巧，家人及乡邻都喜欢他。只是家境已日渐贫困，到他出生已是糠菜半年粮的光景了。因供给三个兄长上学赴考家资已尽，到他需就学时便捉襟见肘，无以为继了。为供四儿上学。父母毅然扒了砖房的砖面卖了。

四儿在这种清贫家境中长大，便格外懂事听话，读书十分刻苦，每天都是早到校晚回家，尤其是午后他总是头一名到校。后来有几位同学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家午饭过于简单，冯四儿总是拿着菜团子边走边吃，所以很早到校。

冬季是最难熬的一关，四儿连棉鞋也没有，脚冻得七裂八瓣的。他为了暖脚，在自己靠墙的书桌下面用土坯垒一个槽子，槽里装满麦秸，上课时就把脚伸到麦秸里去取暖。当时教他的塾师有两位，一是西三里的刘秀才，因常穿长袍大褂，人称刘大褂子，另一位是本村的孙先生。冯四儿读书刻苦，成绩突出，很受先生钟爱，同学也敬重他，有的见他吃不饱饭，就常常带玉米饼子到学校给他吃，也有的把他请到家里去吃顿饱饭。

但因家境太苦，父兄们常不落窝，家里有时连烧水做饭的柴都没有。母亲就叫四儿去拾柴禾。他先不愿意旷课，怕拉下功课，母亲只好劝慰几句，说你不是还给我讲“朱买臣休妻”的故事吗？朱买臣当时家境不好，什么事都得干，可他胸有大志，后来还是金榜题名了。读书上进是一辈子的事，

眼下却得有柴烧，才能过活呵。

冯四儿听了母亲的话，就拿了一本书，背了柴筐向村东树林中走去。林中有许多老鸱，一见人去了便一阵惊飞。他仰面看树杈上有不少老鸱窝，心想把这些窝捅下来，不是很好的柴禾吗？于是他就爬上树去，折一支长树枝去捅老鸱窝，连捅了五六个，地下就落了不少干柴禾了。

他开心地把柴禾装进筐，心想这办法好，省下功夫还能读书，就坐地上拿出课本来读，“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

忽听有脚步声，抬头一看竟是孙先生。冯四儿赶紧站起来，“啊，孙先生……”

孙先生微微一笑，“我来看我的这片林子，没想到碰到你在这儿读书。”

四儿顿时红了脸，没想到树林是孙先生家的，“对不起，我撅了您的树干棒，还有……”

孙先生和悦地摆摆手，“没关系，只是你这样上高树太危险。这样吧，以后没柴烧就到我家去肯。对了，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呵？”

四儿低头道：“我家缺吃少烧，娘让我拾两天柴禾再上学。我知道旷课不好……”

孙先生说：“那好，你还照常上学，家里的难处我想办法帮济一下。”此后孙先生经常送些柴米去冯家，使冯国璋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冯国璋后来做大官了，许多亲友去投奔他，求他周济或谋个官职。他希望孙先生能来，准备以重金酬谢，以报答恩师。可一等再等，孙先生总不来，他忽然明白自己想错了，圣人不可屈致。于是多次写信给孙，请他出来做官，但都被一一谢绝了。

冯国璋卸去总统之职还乡时，带着大批贵重礼品去酬谢孙先生，孙先生却拒不接受，后来想了个办法，派人送了二斤茶叶给孙先生。孙想茶叶属一般礼尚往来之物，就收下了，而后打开一看，竟是满盒钞票。他立即重新包好，提笔在一个纸条上写了“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贴在茶盒上派人送回冯府。

冯国璋与他的另一位启蒙先生也有个有意思的小故事。那位刘秀才人称刘大褂子，一天到武备学堂去求见冯总办。门房告诉他，冯大人有令，凡求见者须先递名片。刘先生一听，即将大褂脱下，交给门人，“你把大褂一献，就说姓刘的求见，他就知道了。”

门人心里奇怪，果真按他说的回禀。冯国璋一见大褂心里便明白来者是谁，立刻出门迎接，离着先生很远就脱帽鞠躬说：“见衣如见人，未曾远迎，请恩师原谅。”

冯国璋热情款待刘先生，欲给他谋个好职位，刘先生不愿；又想送些财物，先生仍执意不受。冯国璋恳切道：“先生无论如何也得收学生一件东西作为纪念。”

刘先生见冯国璋这么说，便道：“那你就送我一口寿材吧，这是终生纪念。”

冯当即说：“这好办，等我替你制好了送去吧。”

刘先生回家不久，冯国璋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口棺材。刘先生一看是口薄木棺材，心里有些不高兴，过了两三个月，有个客人来，说起此事，刘先生不免口出怨言。那客人是个老木匠，就去看了那棺材，竟连声夸奖：好材好材！这是地地道道的阴沉木！

再把棺盖打开，里面还放着几十斤牛肉。隔了两三个月，那肉色新鲜得竟像刚宰的。刘先生这才恍然：“唉呀，我差点怨了人家一辈子。”

冯国璋 12 岁入毛公书院读书，书院当时有两名比较有名望的先生，一位叫吴震；一位叫白广川。白先生精通数学，曾著有《初学易解》、《九归算法》、《添元》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名师指点下，冯的策论和数学极优，后来科试得中案首。

在毛公书院读书时，冯国璋仍很俭朴，尊敬师长，礼貌待人，三十里铺一些文墨之士都看重他是棵好苗子。冯自己也很有抱负，和同学说：“大丈夫一生，应忠君爱国，四海为家。”

吴震和白广川两位先生对冯格外器重，悉心教诲，吴震还把自己妹妹托人说亲许配给冯。这就是冯国璋的原配吴夫人。吴夫人生了家遂、家迪、家遇三个儿子和大女儿家逊，1910 年去世。

冯国璋在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他的外祖孙家就在附近。孙家从明朝起就是远近有名的财主，其时虽渐败落，但在河间北部仍为首屈一指的富户。童年的冯国璋在外祖家常遭白眼。每逢荒年旱月母亲短不了去三十里铺娘家借粮，也常遭其兄弟们的冷遇，甚至发生争吵。冯的舅父们说他家不会过日子，就会糟，会要。这给年幼的冯国璋心灵上投下了世态炎凉的阴影。这也是他刻苦攻读，一心想争口气，出人头地的精神动力。

在毛公书院读书时，他很少去外祖家。他不想看到富亲戚的冷面孔和白眼。倒是有个远房舅舅，待人和蔼、笃诚，人送别号“菜团子”，他家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却对艰难坎坷中的冯国璋十分照应，常以粗茶淡饭相待，并在精神上给以鼓励。冯反而对这个“菜团子”远房舅舅很感恩。

有一年他由保定探亲回家路过三十里铺时，前呼后拥的马弁副官们吓得村民们乱跑乱藏，以为军队又来抓夫抢东西。“菜团子”正在村外背着粪筐子拾粪，来不及跑开。冯国璋远远地认出了他，就滚鞍下马，毕恭毕敬地向老人施礼问候。“菜团子”见是做了官的外甥，便大声向乡亲门喊道：“别跑了，不是坏人，是我外甥小四儿！”

这个心眼太实的舅舅，一边跟着冯国璋一行的马队走，一边拾着那些马拉的粪。当他拾粪时冯国璋只好站着等他，走出村子，冯说：“舅舅您请回吧。”

舅舅却说：“让我跟着再拾点粪吧。”

冯国璋哭笑不得，只好陪着走。他看老人已十分衰老，还如此劳累，便说：“舅舅，您以后别再拾粪了，买点地，盖几间房，过几年舒心日子吧。没钱，上我那儿拿。别再受苦了。”

舅舅说：“不用了，小四儿，你表弟过不了日子，我也老了，地多了种不了，有啥用？我看哪，你给我几百个铜钱零花，对付买个烧饼果子解解馋就足够了。”

冯和随从们听了都笑了，他让随从给了“菜团子”300 块银元。

这位舅舅傻了，“哎呀，给这么多，我怎么花得完哪？我也拿不了呵。”

冯说：“把粪倒了，放在筐里。”

“那不可惜了这粪？我用褂子兜吧。”

“菜团子”走后，随从们笑着说：“老人家害得我们好苦，让大人走了那么多路。”

后来邻居们都数落“菜团子”，地买多了你不会雇人种，租给别人种？

操不了心不会雇管家？真是天生受苦受穷的命！

可是这位“菜团子”一家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份，算作被压迫受剥削阶层，这也是“祸兮福之所倚”呵。

光阴荏苒，几十年一晃而过，到冯国璋的孙子冯海岗重返故里时，西诗经村已非旧时模样。昔日的冯府大院早已颓败，残墙漏室寄住的是外姓人家，是一张张陌生的脸和异常警觉的目光。

诗经村美丽的景致已不复存在。大片树林和村头的参天古木在大炼钢铁时统统砍伐了，土地荒芜了，瘦瘠了。“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人心不和，生产落后，每人每天口粮只有八两杂粮，还多半是山芋干。

作为受管制分子，冯海岗这位不谙农事的半百老人每天得提锄头下田干活，常常累得不能动弹。有时捏着锄把在村东一望无边的大田里锄苗，暑热和劳累使他几欲昏厥。时常会到离祖茔不远的地上干活，望见祖父那如圆丘一般冷寂肃然的陵墓，他心中便升腾起无限的感叹和悲凉。

冯海岗暗自感叹自己命运乖舛不济。似乎出生在祖父的丧期便是一种不祥之兆。

他的童年及少年时期，生活是较富足安逸的。八岁起与两个哥哥一起念私塾，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还有千家诗、唐诗、宋词等。11岁上正规小学，从三年级起读；而后上南开中学，1937年初中毕业，考取北京汇文中学，因七七事变不能上学，转到天津耀华中学读高中。位于租界的耀华中学其时很有名气，校长赵天麟是位爱国志士，他在师生中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日主张，结果被日本特务暗杀。

冯海岗1940年考入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学成毕业。但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闲着。当时他血气方刚，急欲将一腔报国热情报效国家。日本投降后，他四处找工作，有亲友将他介绍给当时北平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徐慧东。姓徐的见他是冯国璋的孙子，便竭力鼓动他到党部做事，当即给办了入党手续，并委以“北平市党部第八区党部执行委员”之职。

冯海岗不知深浅，以为是为国民服务，正是他学教育的本职。等他浑浑噩噩当了半年“党部委员”，才醒悟出此非正当职位，赶紧抽身辞职。但为时已晚，他这一历史印迹让他后半辈子吃足了苦头。

1950年，肃反运动开始不久，冯海岗被检举历史上曾当过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一职，结果判了四年徒刑，1954年出狱。1956年分配在天津河北区房管局工作，每天出去收房钱。1957年反右使他惊魂不定。1959年得肝炎，两三年不能上班。到身体恢复后，房管局分配他的新工作是给建筑工地的泥水匠做下手，拌灰、和泥、拉砖。这项工作一直干到1968年被遣返原籍“交由当地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为止。

回首往昔，这位1944年辅仁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黯伤不已。偷偷看一眼当年毕业时戴着学士帽拍下的那张毕业照，目光落在当年那张年轻英俊、微带傲气的脸上，心中品味着几十年来的曲折经历坎坷命运。古人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我少壮也曾努力了，仍落得个老大徒伤悲，又是怎么回事？该怨谁呢？

无独有偶。

与他同样命运的还有叔伯兄弟冯海。海是冯国璋长子冯海遂的第三子，排为冯国璋第四孙。他解放前曾留学美国，专攻机械学。学成回国后自办小型机械厂，获得了成功。解放后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修理厂任工程师。

一直较为顺利，不想到了“文革”，便成了隐藏在革命军队中的坏人，批斗，交待，清查，一遍遍一次次地洗刷身上的“污浊”。到了林彪的一号令下达时，便首当其冲成了遣返对象。

两个叔伯兄弟，几十年未曾谋面，却不料在老冉冉将至时会以“坏人”的身份在故乡故土相聚。虽说是整年相聚，却又因身份特殊，不能坐一起聊聊父兄及祖业之事，倒是有机会在村里时有的批判会斗争会的台角边“碰头”，相视一个无奈的眼色而已。

多么令人伤感的一幕呵！

早年冯家的祖辈父辈们吃苦耐劳，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出走，一心为的是寻找广博的学识，谋求更富足的生活，向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为国家为社会创下轰轰烈烈的事业，为祖上争得荣耀，为后代子孙挣下铁打家业。

然而星移斗转，此一时彼一时矣。有谁知，如今学得满腹经纶，却不为当今社会所欣赏、赞许，反而成了落下罪名的把柄，招人白眼；反而要押送回原籍让那些同乡父兄监督劳动，改造掉满身的臭知识分子味儿和满肚的酸墨汁水。

这是何等荒唐的年代呵！

第三章 亮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少年不知愁滋味
艰苦的劳动换来了一把羡慕已久的京胡
爱说故事的瘫子七叔成了冯巩的启蒙老师
蒋老师把他从后台推上了前台
戴口罩的不速之客竟是慕名来访的马季

文革时丁点儿年龄的冯巩自然不会有父母兄姐们那么多的思考和忧虑。此时他幼稚的心灵中仍保存着纯真和快乐的天性，依然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仍能在穷困和低卑的境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块小小乐园。

如果把冯巩的少年时代与其曾祖父相比，两人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父亲潦倒落魄，而其母却又性格较刚强，善持家；他们都较早就懂事，知晓事理，并且天资极高，好读书；另外也都会在艰难困苦之中巧遇善良同情，或者说，有某种好机遇。

当然，冯巩有自己的特殊天赋，那就是他的艺术天才。这一点他与曾祖父冯国璋不尽相同。

冯巩自幼就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感悟天性。似乎是有意跟父母给他取忧伤意味的“巩”名开玩笑。他喜欢笑，喜欢听笑话，听相声，看各种令人愉悦的文艺节目。家里有他，就断不了有他的欢笑，和他为忧伤的家人带来的欢乐。

但那时候令人愉快的文艺节目太少了，冯巩只好将兴趣转向体育活动。

有一阵他极喜欢打乒乓球，在校球队里称得上是“第一块板子”。那时乒乓球正在为中美关系的微妙转折做“红娘”，各地都极重视开展这一活动。但他受挫了。选送佼佼者至区少年体校时，第二、第三名都选上了，偏偏把他这“第一块板子”涮了。原因么，很简单……

受挫的冯巩很快就产生了新的着迷点——国际象棋。有一段日子他和二哥冯达放学一回家就下棋。推车，跃马，出王，走后，兴致所至，常常顾不上吃饭睡觉，有时得让母亲催声连连，才不得不罢手。战到后来，哥俩的棋艺便平起平坐，有时冯巩还能连赢二奇几盘呢。

当然，天性好动，满耳满脑是艺术细胞的冯巩有更大的爱好。

1969年以后，“革命样板戏”成了八亿人民唯一配给的精神食粮，台上演的是样板戏，广播里唱的是样板戏，电影拍的是样板戏。冯家爱京戏也有传统。冯海岗原先年轻时玩过票，喜欢摆弄京胡、二胡，从前生活安定时，闲来无事，他便有滋有味地拉上几段曲目，流畅欢快的《小开门》，悠扬婉转的《西皮流水》，低回幽怨的《夜深沉》等等。这些旋律自小便印在小巩的脑海里了。社会上大唱大演革命样板戏之风也触动了他的艺术知觉，于是，经父亲与好友——天津一位琴师周玉铮商量，冯巩成了周的学生。经这位名琴师悉心指教，他很快就入门了，不到三个月，居然能像模像样地拉出几段样板戏曲调了。喜得周先生直夸：这孩子真聪明，将来准是一把好手！

冯巩学京胡入了迷，心里便暗自嘀咕，想要有一把自己的琴。

一天放学后，神使鬼差似的，他竟转到闹市区的乐器店里。柜台里乐器非常多，琳琅满目，可他一眼看准的只是其中的一把京胡。

多漂亮的胡琴呵，紫竹担子，黄杨木轴，绷得又紧又匀的乌蛇皮蒙子，棕黑色的弓把……标价，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惊人的数目：12元。

“是要这把胡琴吗？你看看吧，这是最好的一把呢。”

营业员笑眯眯地将京胡递到他手中。

冯巩激动地握着胡琴，摸摸琴身，捋捋马尾弓，而后壮胆试了试音色，呀，真不赖，音质又脆又亮。他真是爱不释手了。

营业员这时准备收钱开票了。冯巩如梦初醒一般，连连摆手。“不不，我……我忘带钱了，下回再来买吧。”

他讪讪地将胡琴递还过去，转身逃命似的离开了乐器店。

去了一回乐器店，想买一把胡琴的念头使冯巩着了魔。但是钱呢？这可不是一毛两毛，甚至也不是一块两块钱，而是整整 12 块钱呢！

向母亲要是不可能的。每月总共才 70 几块钱，要还房钱，还得顾着八口人的吃穿生计，12 块钱，那就相当于他和二哥两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他没向母亲要一分钱。

他必须自力更生，自想办法筹钱买胡琴。

母亲为贴补家用不得已变卖家什的作法启发了冯巩的想象力。对了，他想到五爷爷冯家周原先也酷爱京戏，买过一副板鼓，闲时敲着玩，“文革”一来，五爷爷全家也被赶出了原先的住宅，那副板鼓弃在角落里蒙着灰尘呢……他兴奋地钻进楼道，在灰蒙蒙的暗角里，果然找到了它。

板鼓在委托商店卖了五块钱。

还差七块钱呢？还有啥招可想？

晚上冯巩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呵想呵，猝然心里一动：那楼内过道上早已废弃着一只大铁炉，那可是一大堆废铁呵！反正没人用它，变废为宝，多好啊！

第二天，冯巩起个大早，奔到民主道老屋里去“侦察”那个目标。糟了，炉子还在，却让一大堆砖砌垒在里面，没法搬动它。

他搓着手围着那小山似的砖堆走了几圈，心里发了狠：搬！咱天天背诵老三篇，如今活学活用《愚公移山》，老愚公连大山都不怕，咱还愁对付不了这座小山？

此后几天，冯巩一放学便奔到民主道 58 号，对着砖山又敲又砸，将砖弄松动了，便拆下搬走。这可是真正的体力活，不多时便又脏又累，汗流浃背，脸如花面猴。

冯巩搬砖的行动惊动了住在近处的瘫子七叔冯海峨。他叫喊道：“小巩，你在干啥？”

“我要卖这大铁炉。”

“卖铁炉干吗？”“买京胡。我想……”

七叔大声吼道：“不能卖！为一把破京胡，你就要变卖祖产？你是想做败家子？告诉你，不能动铁炉！”

冯巩听七叔骂他败家子，不觉又惊又急，梗着脖子犟口道：“这破炉子多少年了也没用一回，搁那儿也是废铁一堆，把它换成有用的，怎么叫败家子呢？”

他求琴心切，便不顾七叔再嚷再骂，继续搬他的砖。连干了三天，硬是把几千块砖拆掉搬开，把铁炉拉出门卖了八块钱。

他兴冲冲赶到乐器店买来了朝思暮想的那把京胡。一手捧着宝贝胡琴，一手捏着剩下的一块钱，冯巩去了七叔的小屋。他把一块钱塞给七叔，并请求原谅自己的冒犯举动。

七叔见他这模样，真是又气又疼，叹息道：“小巩，我要这块钱有啥用？我也不是心疼那一个旧铁炉子，可这里面有道理，很深的做人道理呵。”

七叔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村子有两户人家，两家都有田产家业。两家的粮田紧挨着，只隔了一条狭窄的田埂。有一回甲就对乙说，这条田埂反正不能种庄稼，你就让给我家吧。我给你钱。

乙想也对，田埂有啥用，让给他，还能得些钱，何乐而不为？就同意了。

谁想甲却在那条田埂上种了一排泡桐树。泡桐长得快，很快就又高又壮了，树根伸展到乙的田里吃肥，宽展的树冠将乙的稻麦遮住了日照，使之大大减产。

甲就又说对乙说，反正你这块田收成不好，不如卖给我，我给个好价钱……后来，乙的田产全归了甲，乙竟败落成了穷光蛋。

七叔摸摸小巩的脑袋，深情地说：“你还小，不懂的事还很多呢。日后你就会明白的……”

七叔冯海峨，这位自幼因疾而长年瘫痪在床的长辈，是冯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好的启蒙老师。虽因长期瘫痪不能上学，他却勤奋自学，博闻强记，精通文史，参加天津市首届函授大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获取毕业证书。

七叔一直与冯巩一家同住，由冯海岗夫妻照料生活。七叔最喜欢冯巩这个小侄儿，而冯巩也最敬重七叔，自幼便常听他讲有趣的故事，讲笑话，《聊斋》、《水浒》、《三国》、《西游记》，讲得绘声绘色，让小巩如临其境；《丢驴吃药》、《大保镖》、《三进士》、《葫芦知县》、《连升三级》等笑话，讲得妙趣横生，逗得小侄儿抱着肚子笑。就是这些文学艺术的原汁，早早地便注入了冯巩的记忆深处，成了他日后走上艺术之路的基础和源泉。

冯家人被赶出民主道 58 号楼宅后，残疾的七叔竟没有安身之地。亲人们为他在这幢被没收的楼房侧檐下搭了个小屋，供其暂且安身。冯巩听七叔讲过《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便称这小屋为“七叔的小屋”。他和母亲、二哥每天轮着往“七叔的小屋”跑，给七叔送吃的、用的，日子再苦，咱家的人也都得活下去呀！冯巩很乐意母亲指派他给七叔送东西。一到“七叔的小屋”就一屁股坐到七叔床边舍不得走，要听七叔讲故事。渐渐地长了年岁，七叔给他这唯一的听众讲“大道理”了。

冯海峨是个思想深邃，极有个人见地的人。虽瘫了双腿，但思维极其敏捷，对历史及时政都有独到见解。可你想想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好结果？

作为唯一听众的冯巩，至今仍记着七叔向他宣讲的那些“大道理”的内容：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主张把人类从中世纪教会的宗教世界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保护个人的权利和人格，主张解放人类的精神力量，认为人应当积极地生活，竭力积累财富。资产阶级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但取得政权后就抛弃了它，又要压制自由思想。人文主义在中国，就像一架富丽堂皇的马车，谁要想乘这辆车，弄不好就会被碾个粉身碎骨……”

“毛泽东思想确实了不起，它把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都压倒，共产党靠它取得了政权。可现在它被曲解被糟蹋了，开始走向极端和专制，成为专制的工具了……”

“陈云搞经济有一套。他说要搞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经济，可咱国家学的是苏联斯大林那一套计划经济管理，只会越搞越糟……”

七叔一谈起他的各种见解便是一套接一套，没完没了。冯巩似懂非懂，只觉得新鲜，有意思，眨巴眨巴眼睛，却想不透，悟不清。

七叔拍一下他的小脑袋，笑道：“别瞎琢磨了。要懂这些，起码得再过十年二十年。”

而今再回想七叔的那些“大道理”，冯巩更加敬佩那位身残志高的长辈了。事实证明七叔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就因为他的这些“反动言论”被个别“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告发，竟被重重地判了15年徒刑，因身体残疾，而实行“监外执行”。

粉碎“四人帮”后，七叔得以平反，但长期的精神压制和生活贫困，使他身体越来越坏，终于过早地病逝了。当七叔去世的消息传到正在外地演出的冯巩耳里，他禁不住为这位自小敬重的思想启蒙老师和刚直不阿的硬汉而涕泗交流。

一把小小京胡，启迪了冯巩的艺术知觉，把他引上了通往艺术殿堂但却荆棘丛生的道路。

1970年春，冯巩在河北区庆安小学以五门功课500分的满分成绩毕业，升入天津第二十六中学。

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微妙而具戏剧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霸权大搞军备竞赛，为成批地制造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核弹头投放大量资金和技术力量；非洲国家则一个个地独立或一次次地发生政变；在亚洲，日本经济在急剧膨胀，新加坡、南朝鲜及台湾香港也已呈经济腾飞的态势……而中国，这个自称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搞得最热闹的是演“样板戏”！

“反动家庭”出身的冯巩凭一手好琴艺，成了二十六中宣传队的骨干分子。

在校宣传队他如鱼得水，不光京胡拉得悠悠然，还学了板胡和弹拨乐器，会全套的样板戏唱腔和任何流行的革命歌曲。大合唱他是指挥，两条细长胳膊挥舞得很像那么回事。

读初二时，天津市要搞全市文艺大汇演。二十六中立誓要拿下一个大奖。负责宣传队的蒋道燊老师原是部队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很懂艺术规律，自他抓了校宣传队后，年年比赛都得奖。可要保住奖状锦旗实在不易，天津是个艺术人才的藏龙卧虎之地，没一点绝招不行。

想绝招，绝招就来了。这年天津曲艺团的朱学颖、常宝庭、王培元写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相声段子，电台用了一周时间天天广播。蒋老师先还很高兴，想让学生学，可播得多了，天津人人都快会说了，还有啥意思？正抓耳挠腮着，又听中央电台播放了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他喜出望外，忙将这个段子录下来。

然后他开始在校宣传队一帮人马中物色说相声的。挑来挑去，挑中了冯巩。嗯，这个学生长得瘦长，但温文尔雅，口齿清楚，普通话也标准，而且聪明活泼，爱逗笑，平常学生们扎堆聊天，总听他在侃，侃得众人哈哈大笑不止。

蒋道燊就把冯巩找去，说：“我想让你学说相声，行不？”

冯巩眼睛一眨，“行，可还得有搭档。”

“你看谁跟你搭档好？”

他随口便说：“陈世岳吧。他行。”

陈世岳在宣传队吹笛子，一副憨厚相，确实具备捧哏的条件。蒋道燊心里一喜：还真有眼力，跟我想的一样！

冯巩原先大多是搞器乐，总在后台，说相声可是正经地上前台唱主角呵，蒋道燊试问道：“你会不会怯场？”

冯巩嘻嘻一笑，“前台后台不都在台上么？我可不怕。前台说完相声，返回后台拉京胡。”

他却没想到，从后台迈步到前台说了相声之后，他就与前台结下不解之缘了。

当初这位相声天才只想为学校争一份荣誉，拿一个大奖。他把说相声当作是“客串”，就狠下功夫地去学去练，连上学路上和躺在床上也是连说带比画的，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汇演这天，二十六中的“秘密武器”一上台，就招来了一阵鼓掌声，讨了个头彩。两个学生有声有色地说开后，台下掌声竟一阵又一阵，等冯巩抖出最后一个包袱，整段相声戛然而止，台下掌声火爆一片，连评委也拍手叫好了。

二十六中洋洋得意地拿到了第一名的奖旗。就这一次，冯巩、陈世岳两个初中生会说相声的名声就传开了。

就在这年冬天，两个穿军大衣的人来二十六中指名要找蒋道燊老师。

事先蒋老师已接到市教育局电话，说北京电视台有人约见。等见了面，来人摘下大口罩，蒋不觉一愣：这不是马季和唐杰忠吗？

“哎呀，两位……怎么来啦？”

马季快人快语，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听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学生相声说得不错，我们想听听，蒋老师能不能给安排一下？”

相声大师要看自己的学生说相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哪能不答应呢？于是，蒋老师马上去把冯巩、陈世岳叫到办公室来了。

两个中学生看办公室里坐着两个戴大口罩的陌主人，以为是什么领导要欣赏他们的表演，便无拘束地说开了。

马季、唐杰忠边看边交换眼色，不时地点点头，等两人说完了，两位相声大师连连鼓掌，然后拉下大口罩，站了起来，乐呵呵地说：“不错不错，说得很有味道。”

冯巩和陈世岳都愣了：这不是电视上说《友谊颂》的马季、唐杰忠老师吗？闹半天我们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呵……两人不知所措地红了脸。

马季笑眯着一对小眼睛，走过去拍拍冯巩的肩膀，“小伙子，说得不错，以后跟我学相声，怎么样？”

怎么？马季要收我当徒弟？这是真的……仰脸认真看了看那位相声大师圆乎乎笑眯眯的脸，那上面充满了真挚和信任。冯巩心头一热：

“哎……”

两个学生兴冲冲地离开办公室后，蒋道燊买了两斤包子，招待两位相声大师吃午饭，边吃包子边聊。马季认真地对蒋说：“冯巩这学生说相声是苗子，好好培养准能成材。能不能让他跟我去学？”然后问及冯巩的家庭情况。

蒋道燊便如实地把冯家的复杂历史关系讲述了一遍。马季听着，开朗的脸上堆起了愁云。是呵，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怎么可能通过严格的政审关呢……他沉吟半天，还是表明了自己的明确态度：

“不管怎么样，这徒弟我是认定了！”

冯巩不知道蒋老师和马季的这番“幕后交易”，他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之

中，逢人便说，我见着马季了，他听我说《友谊颂》，夸我了，还要收我做徒弟，跟他去说相声呢！

好事成双。为表彰他在全市文艺汇演中夺得头奖，学校破例为他的入团申请开了绿灯。15岁的冯巩成了共青团员！

多好啊！他，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少年终于脚踏实地扎根在了红色土壤之中，共青团员可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呵，这样一来，鼓满风帆的艺术之舟又将载着他驶向光辉灿烂的彼岸……同学们，老师，还有母亲和亲友们都向他祝贺，替他高兴。

“好好干，再接再厉，为咱争口气！”冯巩几乎被幸福感所湮没，整天乐乐呵呵，开口便笑。只要好好干，前程似锦！这一信念已牢牢矗立在他的胸间。他每天大清早就跑到河边空旷地，拉开嗓门说《报地名》、《地理图》、《对春联》等绕口令，锻炼嘴皮功夫，课馀时间他钻到学校的防空洞地下室去练。那时候，凡是“文革”前的相声段子都是毒草，绝不能说的。可冯巩明白没有那些优秀的遗产，就难以学好相声。他暗暗收集，求借，转抄，弄来了一大堆所谓的“毒草”，如饥似渴地往肚里灌。赶上节假日或空暇时间，他就往北京走，登门找马季老师请教。

马季言出必果，对这位孜孜求艺的小徒弟格外器重，句句口授，字字校音，遇上演出时间，干脆带了冯巩去现场观摩，人见他这胖鼓鼓的相声大师旁边跟着个细竹竿似的少年，便笑问：“是谁呀，这孩子？”

马季呵呵一笑：“我徒弟，怎么样，身材不错吧？”

有一回冯巩去医院看望住院的马季老师。马季正躺在病床上写一个相声段子。他告诫冯巩，“要当一名好相声演员，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不但要学表演，也要能拿笔创作。咱们这一行，自己不能写就等于少了一条腿，你只有一条腿，怎么走得远，跑得快？”

冯巩听从马老师的教诲，果然拿起笔来学创作了。他先“描红”，把收集来的老相声段子，整理起来，反反复复地念、背，琢磨其结构形式，艺术展现规律，然后试着，照样子改写一段，再改一段。

母亲发觉每天晚上到夜深了，小儿子仍趴在自己做的小桌前，时而写字，时而皱着眉头沉思，便问：“小巩，你这是在干啥？”

冯巩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在瞎琢磨，看能不能自己写相声段子呢。”

母亲赞许道：“好，是得学着写。不过你得多看书，学习掌握各方面知识。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才行呢。”

在老师和母亲的鼓励下，冯巩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木头》、《养蜂新人》、《我爱南山》等一批相声段子。这些作品虽然还很稚嫩，带有模仿痕迹，但它们出自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之手，也确实是十分不容易的。

就这样，冯巩揣着一颗执著追求艺术的百般虔诚的心，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艺术殿堂。

第四章 好男儿当兵去！

他想当文艺兵，但那只是一个泛起即破灭的美丽泡影
投笔从戎的冯国璋终于敲开了幸运之门
走出国门的冯国璋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军事操典
冯巩当了一回“黑兵”

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内，一切都似乎那样美好，同学老师们的赞誉，家人亲友们的鼓励，得奖，演出，欢笑声，掌声，红色的团证团徽，作业本上的100分……理想之舟在疾驰，幸运女神已站在彼岸向他招手，露出神秘诱人的微笑！

好消息：工程兵文工团领导点了冯巩的名，要招他入伍，当专业相声演员！

听说了吗？兰州军区空军文工团慕名来函，要调冯巩，已经发出家庭情况调查表了！说是先到咱学校，由蒋老师转去的……同学们传言纷纷，又朝冯巩投以羡慕的目光。

沈阳军区文工团来了几个人，带了正式介绍信，还有报考表和政审表，听说冯巩没费劲就通过了初试和复试，只有政审表……

参军，多么诱人！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在当时，“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风起云涌，连三岁小孩都一心巴望着能“穿上绿军装，手拿冲锋枪，保国卫家乡”，年轻人更是以入伍参军为此生最大的幸福和最可炫耀的成功之举。

何况像冯巩这样家庭背景复杂的青年，如果能真穿上一套草绿色的军装，那该是何等崇高和荣耀呵！参军，就像神奇树上悬挂的金苹果，离饥渴已久的冯巩近在咫尺！

而且，要吸收他的又是部队文工团，那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殿堂！那时候，各地方除了保留了几个样板戏剧团之外，其他文艺团体撤的撤，并的并，几乎都搞光了，文艺园地万马齐喑，一片萧条落寞，唯有部队文工团族旗招展，鼓角嘹亮，如同荒漠中的小块绿洲。谁若能进得去，无疑就有了一展才华的宽广天地……

可是，如同被巫婆念了咒语，施了法术，部队文工团来考察冯巩，他们来时兴冲冲，走时却悄然无声；商调函、政审表寄出了，就再也不见回音……

冯巩先是满怀希望地等着，扳着指头盼着，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又徐徐坠没于西山岭后。热乎乎的胸口渐渐让失望和沮丧弄得灰冷。

冯海岗单位的一个政工干部一语道破了其中原委：“冯海岗的儿子也想当兵？冲这家庭出身就没门儿！”

一道深深的沟壑将满怀期望的年轻人隔在了咫尺之外。曾经一再展现于眼前的那幅绚丽多彩的前景画卷，被阵阵凉风和冷笑掠走，如同过眼烟云……

名声在外的天津第二十六中宣传队，队员们一个个都被文艺团体招去，不到两年就有60%的队员进了部队文工团。可唯有宣传队里最好的队员，被撇在了一边晾着。骤喜，骤悲。如同儿戏一般，一轮轮，又一回回，最后仍是一个大泡影。

冯巩几乎绝望了，他终于明白了，他再怎么有才华，再怎么有革命热情献身精神，人民解放军偌大的营盘军寨里也无法给他一寸置身之地。

因为他是冯国璋的曾孙。

冯国璋何许人也？那些年教科书上称之为“反动军阀”，破坏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元凶之一，篡权称帝的逆贼袁世凯的爪牙帮凶这些人物的后代岂可混入我们纯洁无暇的革命阵营里？终于，绝望的冯巩憋不住痛苦和怨愤，他向父母责问道：“我怎么摊上那么个害人的太爷？他到底做啥坏事了，害得我家这么多年翻不了身，受气受罪……”做父母的还有什么话可说？“小巩，你别问了，咱家……怪谁呢？你忍忍吧。”作为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的风云人物，冯国璋一生复杂多变，节人评说不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照一个旧时代人物，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某种承递作用的历史人物，不能一言以蔽之，更不能以偏概全。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始于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以前有些史学家将改革归功于袁世凯。其实确切地说，真正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北洋三杰，即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其中，冯国璋最为突出，且在其后半生中一以贯之。

冯国璋的青年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猖狂侵略我国之时，当时不少有志报效国家的青年人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纷纷投笔从戎，走上了保卫国家，反击侵略的疆场。冯国璋就是其中的一员。

冯国璋从毛公书院学成后，与吴氏凤姑娘结婚，继而有了两个孩子。其时家境虽贫困，但夫妻和睦，生活安定，吴夫人精于女红，且勤俭持家。然而家园虽好，终难遂平生之志，光绪五年、八年，冯国璋两次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不禁愤愧难当，向妻子发誓道：“我若不混出个功名富贵来，愧对列祖列宗。”

于是他找了族家叔父冯甘棠，因冯甘棠有个朋友在保定莲池书院任职。冯国璋一是求叔父托人情让他去莲池书院深造，二是请求叔父给予经济补助。他不无哀伤地说：“我家生活这么困难，而我年过 20 仍一事无成。万请叔父拉扯一把，让我有个出头之日。”

冯甘棠本来就欣赏冯四儿这个聪慧的侄儿，看好他会有出息。沉思片刻，便说：“这样吧，我写一封荐引信你带着，再送你一头小毛驴，去保定可作代步。到那儿你卖了驴作日常开支用吧。”

冯国璋此番去求学果然有了出息。他发迹后就把冯甘棠接去任所，上下人等都称之为叔太爷。

保定莲池书院并无固定学制，根据学生入学时基础和三年一度的科举制，一般修业为三年。课程设置除“四书”“五经”外，“经史子集”均有，后又添设英、日语等。

冯国璋入莲池书院后，学习更加勤奋刻苦，由于阅读范围扩展，眼界开阔，渐渐悟出时局与前程之道来了。某日晚上与一位同学促膝谈心，冯国璋说：“从当今而言，学文想出头难于上青天，而学武则易掌大权。咱得在军事知识方面下点功夫。”

这时冯已下定了弃文从武的决心。当时他有个族叔在天津大沽淮军盛军营当文案（文书），冯国璋便去投奔他了。族叔人很好，留他住下，一时谋不到差使，就让他磨石刻印来维持生计。过了些时候，费了不少周折，才算在营中补了员，让冯国璋当了一名学兵。

冯国璋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之一。

盛军是周武壮公周盛传统领的部分军队。这支军队大约 3000 余人，驻防在大沽小站一带达十馀载。该军一面开垦稻田，一面练兵。周盛传在当时很

有影响。故冯国璋也是慕名而至。

文人当兵的冯国璋在军营很快就受到了上司的赏识。而且人缘不错，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帐。闲时就到族叔房中找书看，尤其是军事知识方面的书，读得很认真很仔细，读了一遍又一遍。

族叔也是个钻研学问的人，系举人出身，很欣赏这族侄的才干和灵气，经常与他谈古论今，赋诗填词。逢有机会便向该营统领刘祺夸赞侄儿的长处。所以等本营有机会保送一人去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时，冯国璋就被选中了。

天津武备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学堂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事、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兵、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

冯国璋为首期学员。按李鸿章原定办学意图，将各营送来的弁兵，挑取百余人入堂肄业，届时便把头批学生发回各营授事，充作下级军官；复挑一批学生再入堂肄业，其优者留堂作为帮教习。但后来却作了有利于冯的变更。

冯国璋入天津武备学堂，深知机遇难得，更加发愤苦读，尤其在军事知识上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工夫不负有心人，到1890年第一期学员们毕业考试时，冯国璋考取了第一名。李鸿章在毕业典礼上讲：“这次毕业考试，考在前三名的都将委以重任。”

本期学员成绩优秀者还有段祺瑞、王士珍，二位与冯国璋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还有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曹锟、李纯等。这批人，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都把他们的名字收纳于帐下，成为北洋新军的最高将领，即所谓北洋武备派。

而冯国璋当时就学时便以勤奋好学锋芒初露而著称，颇受德国教官及学堂总办荫昌的赏识。他们时常向李鸿章提及，因有李、荫两个汉、满大员的器重，给冯国璋此后的发达铺就了良好基石。

毕业典礼后，冯国璋便焦急地等待着分配。他自然希望学有所用，委一个有职有权有所作为的好差使。其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战争阴影已很浓重了。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很希望能披甲上阵，用所学西方新式兵器战术，搏一个浴血沙场，封妻荫子的辉煌前途。

但等了又等，等来的却是让他留校当教习的委任状。他有些失望，但也体会到这是爱才的李鸿章对他的器重。任教后，他每天早起晚睡，身体力行，凡要求学员做到的他都以身作则，教学比较妥当。但他后来渐渐发觉，那些行伍出身，手握兵权的旧式淮军将领，根本不把武备学堂的学员放在眼里，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得不到重用，就连他这个武备教习，也常遭淮军将领的冷遇。冯国璋决定改换门庭，寻找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地方。次年春，他走进了淮军驻芦台将领聂士成的帐营。就在这一年，已被朝廷委以重任的聂军门要考察东三省及朝鲜，勘测地形，以准备与日本对抗的武力。冯国璋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便携带十几名武备学堂的学生，随聂同行。此行历时八个多月，跋涉二万余里，几乎踏遍了东北及朝鲜的各个山梁沟壑。一路上风餐露宿，历尽艰险，所到之处，山川要塞均由冯等细加勘察，用新法绘图，标明地形地貌、风土人情、驻军防守等。冯所收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义汇编成《东游纪程》一书，其中冯国璋担任注说编辑。

正是由于冯国璋参加了东三省及朝鲜各地的考察，使他在第二年的中日战争中有力地辅佐聂士成抗击了日军的进攻。“各军皆败，只有士成军可战。”

因为有《东游纪程》作重要参考，聂士成率部进退自如，指挥有方，在成欢驿和九连城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还利用易守难攻的摩天岭地形阻击来犯日军三月有馀，大挫日军锋芒。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的充分信任和赏识，任命他为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而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协商实施条约上的具体事宜。在聂士成的力荐下，李鸿章向西太后推荐冯国璋为赴日随员。当时清廷驻日使臣裕庚也极力保奏冯。就这样，冯国璋生平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东渡日本海，来到了那个刚刚以武力战胜中国的国度。冯国璋在出使日本期间，感慨颇深。对比之下他更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庸败懦弱，也认清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趋势。要想抵御外侮，必须富国强兵。他不得不服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能人将才辈出。他有心广泛结交日本军界将领，与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将领来往密切，经常宴请和馈赠礼品。在交往中探询日本军事的变革之途。在日本期间，冯国璋不仅实地考察了日本军事教育，还阅读了大量的近代世界军事著作，获取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实用资料。他不舍昼夜，将记录的资料分门别类，汇编成册。后来，当袁世凯看到冯国璋在日本编写的《新建陆军操典》等书时，惊喜不已，认为乃“瑰宝也”，即委冯以要职，协助他在小站操练新军。

袁世凯精权术，会用人，是其擅长，但他仅是行伍出身，虽有一段在朝鲜带兵作战的历史，但严格来说对军事尤其是现代军事是十足的门外汉。袁争得小站练兵的职权，是欲以此作为日后飞黄腾达的跳板，所以他须收罗人才，培养亲信。他对冯国璋的器重也是从自己的私欲出发的。

冯国璋得到袁的重用，喜出望外，决心大干一场，以遂在日本苦苦研学二年之志。他统筹兼顾，精心谋划，忠于所事，为小站训练新军办了许多实事。

他运用已掌握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教育的知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著了近代军事教科书——《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作为新建陆军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这也是清末我国军事学校和编操新军的主要教材。冯国璋任全书统稿，承担“讨论折中，而兵法、操典、营制，饷章以及各项图说”的主编任务，而且还根据自己的擅长亲自编写了从第一册至第十册的步兵操法、枪法和作战要领等重要章节。

1899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遂调冯国璋担任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帮袁将旧军操编成新军。

冯国璋积极行事，将山东34个营旧军在短时间内编练为20个营的新军。由于他认真改编、严格训练，使原先营制纷杂、号令不齐、散漫无度的旧军成为面貌全新的军队。

次年袁世凯特地邀请了德国驻胶州湾总督抵济南观操。只见冯国璋亲自号令全军，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深感军旅操练精娴，训教有方，得知是冯国璋等按德国军事教育法训练新军的；便赞誉冯等为北洋三杰。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随其担任北洋军政司教练处总办，负责北洋新军统一编练任务。不久冯便奉命督办一所北洋行营将弁学堂。

冯国璋这回是独立创办一所军事院校，自知职责重大，亦是自己一生夙愿成就之目标，所以初创时要求就极其严格，规定凡教室、宿舍、操场、仪

器乃至自修房等都按西方现代军校规范设置。他亲自动手修订教材，制定章程，又高薪聘请日本步兵少佐多贺亲之任总教习，日本工兵大尉井上一雄任副总教习。

该学堂招收学员的规格很高，第一期入堂肄业的人员，武职高至提镇，文职至道员，他们这些人读书还带着侍卫班，另外还有经常出入朝廷王府的贵胄子弟，所以要按严格的军事院校纪律约束管教他们，十分棘手。

冯国璋仍制定了严格的校规纪律约束这些学员，而且还亲自过问校风军纪，赏罚分明。

其时，他的第三子冯家遇刚成年，也入该校就读。冯国璋对亲子也严加管束，不得有丝毫越轨。众学员见之，莫不生畏、感叹。

但也有极少数人生性傲慢放荡。有一次，一个贵族学员偷偷在校外宿娼并偷吸鸦片烟，无人敢当面责管。此事让冯国璋知悉了，立即亲临现场，搜查属实，当即命令随从将其人及烟具等物一并带回学校，该学员竟口出狂言，表示自己有贵族身份，奈何他不得。

冯国璋大怒，将军帽用力摔在地上，愤然道：“我可以不做此官，也要严明纪律！”

他亲自用军棍责打该学员，致使军棍折成两段，而后就将此人开除出军校。自后学堂内再无一人敢犯纪律。从此，这所学校的良好校纪和学风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之后，清政府又设立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和经理、军械学堂，作为将弁学堂的附属学校。这些学校均由冯国璋督办。

冯后来又把将弁学堂改建为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设步兵、骑兵、炮兵、经理、测绘五科。学员有的是各军营选送的，有的是从社会上招考来的。由于冯办学有方，军校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仅1904年就有5000多考生从全国各省汇集于保定，参加保定军事学校的入学考试，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后来的黄埔军校。在这众多的考生中，也包括如蒋介石、张群等人。蒋就曾在冯国璋创办的军校中学习，而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冯国璋治学严谨，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上严明的教范和校规，在当时军界尤其是学界赢得极高威望，他深受军校师生的爱戴。

他虽身处高位，却不妄自尊大，常以平等身份与师生在一起。有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有一尺多厚。雪后学员们扫除积雪，用雪堆了一个大狮子，其形栩栩如生。冯国璋正好路过，见了雪狮子，使驻足观赏，称赞学员们手巧。而后他对着这洁白如玉的大雪狮吟出一句上联：“日出狮子瘦”，让学员们来对下联。

学员们面面相觑，苦思不得佳句。冯笑道：“你们都很谦虚，不肯说吧？”

学员们说确是想不出，还是大人说一句吧。冯国璋略一恩忖，便说了一句，“月圆兔儿肥”。

这上下句，“日出”对“月圆”，“狮子”对“兔儿”，“肥”对“瘦”，确实很妥贴，引得学员们阵阵赞叹，“总办真是文武双全呵！”

1903年11月，冯国璋与满族军官铁良、凤山一同再赴日本考察军事，冯国璋此行是作为清廷的重要军事官员身份去的，受到日方的郑重接待，参观了日本的一些著名军校和兵营。此行令冯更坚定了办学强兵之志，并深深感到本国智勇双全的将官太少。所以回国后立即致函陆军部，拟从北洋武备学堂中挑选优等学生100名，改为陆军师范生，从速加习师范课程，备充各

省陆军小学堂的教习，并又亲任保定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督办。

1906年，冯国璋被清政府授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并兼任贵胄学堂总办。这贵胄学堂是专门为培养满族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的。专考收王公世爵及四品以上宗室，现任二品以上京外满汉文武大臣之聪颖子弟，教以普通学术及陆军初级军事学，并入军队观览学习。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多由冯国璋亲自给诸王公大臣授课。

冯国璋开办军事教育十数年，可谓功绩卓著，仅以他直接创办主持的几所军事学校而言，就培养了数千名人才。这些掌握了近代军事战略战术的毕业生先后被派往各军营，逐步取代了旧军官，使得中国军队发生了素质上的变化，真正成了一支“新军”。

1904年末，有位美国军官访问了保定军营后，大为惊叹，认为无论军官和士卒都显示出训练有素，军容整洁的良好素质，配备了最新式的毛瑟枪，而且枪法和美国士兵一样准。美国驻华陆军武官鲍威尔感慨地承认，“一支小小的外国军队能够在中国登陆，并且夺取任何重要目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当时的中国，保定的军事学校对青年学生们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纷纷到保定报考。这盛况使法国驻华武官赞叹不已，评价说：“对军事事务的兴趣在全帝国不断增长，每一个人、学者、学生等都想接受训练和穿军装，‘祖国’一词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仅从客观因素上分析，清末军队素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前爆发。由此看来，冯国璋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上的先创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冯国璋办军事教育的志向贯穿于他整个统军从政生涯。1913年10月至1917年8月，他在江苏任督军，四年之中大兴军事教育，先设立教育团和军事研究所，继而又在南京创办陆军讲武学堂，陆军警察学校，还创立了军事图书馆。

冯国璋在督军任上，还十分重视民众教育，鼓励地方士绅兴办教育事业。他召集江苏各界人士代表，倡议发起“全国教育会”，先在南京设立筹备组，以期普及至全国，但终因其时政治军事诸原因而未成。

冯国璋在江苏办教育之举，亦与其续夫人周砥有关。这里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冯国璋在原配吴夫人于1910年病逝后，数年内一直未续正式夫人。当他攻占南京，继而当了江苏督军后，袁世凯忽然保媒，要将他家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介绍给冯为续弦。

此事是袁让冯国璋长子冯家遂转告的。当时冯国璋踌躇不已，独思良久，最后答应了。

周砥当年也曾是京津的著名新女性，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时代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和宋庆龄、何香凝并称为“女师三杰”。

但走出校门后，她又遵从恩师之意在天津一心从事教学。后女师校长傅增湘介绍她去袁世凯家任他妻女们的家庭教师，职责是让袁的姨太太和女儿们认真读书写字。袁世凯窃据大总统之职，搬进中南海后，周砥便不在袁家教书了，但她与袁的三姨太相处很好，故时常出入袁公馆。

冯国璋心里清楚，袁保此大媒用意是要在自己身边置一耳目。本当婉言谢绝，但他又不忍失去这次联姻机会。

冯国璋以往时常去袁公馆，与周砥有过数次言谈接触，很为她的才学风度所动。冯国璋身份渐高，迫切希望有个有知识、懂礼节、善交际的贤内助，而周砥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是京津知名的才女，通晓几国语言，知古晓今，有思想有头脑；虽年近四旬，是老处女，由于天生丽质善保养，仍如廿七八岁的风韵少妇，且举止端庄，落落大方。另外还有一点，冯国璋最初投笔从戎所进的大沽口“盛军”，其首领便是周砥的祖父周盛传，后任湖广总督，是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将军。冯国璋对周盛传十分崇敬，认为自投了“盛军”后此生才开始转上顺势。爱屋及乌；他对周砥便更多一份爱怜了。

冯国璋和周砥于南京举行的现代文明婚礼，在当时成了一大新闻。

袁世凯以娘家人自居，让三姨太闵氏和长子袁克定专程护送周砥从京城到南京，还为周砥准备了一份极其丰厚的嫁妆。

冯国璋与周砥结婚后，关系相当融洽。婚后没几天，二人便一同去视察江苏女校。周砥是专司教育的，对冯国璋热心教育自然十分赞同和支持。她在南京数年，经常参加一些扶助教育的社会募捐活动，捐钱捐物，创办学堂，尤其重视儿童教育和妇女自主，积极鼓动冯国璋倡议成立“全国教育会”。周砥在江苏教育会任会长，出了许多力。在那连年征战的混乱时期，唯江苏一地大兴教育，这与其他省的地方军阀、官僚摧残教育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冯国璋及夫人周砥在江苏兴办教育之业绩，迄今仍为江苏教育界人士所追颂，并载入有关史册。

至于两人的感情，因其联姻不免夹有袁世凯的用心，故起初两人有过摩擦和防范。待袁称帝至“驾崩”，两人便前嫌尽释，心志相投了。因为从个人感情上说，袁世凯于他们两个都是“恩重如山”的，反袁，在冯国璋内心而言，也是极痛苦的一种抉择。再则，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行事，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周砥作为一个有现代思想的聪明女子，自然也渐能辨别是非曲直，所以最后两人便成了真情相投的夫妻。冯国璋有周砥为妻，如有得力助手相佐，后来便当上了代总统。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冯国璋才做了数月总统，贤内助周砥便得了病，拖了一段日子竟逝去了。冯国璋痛惜不已，心境大坏，此后便走了下坡路，未几便被段祺瑞挤下了台。

冯国璋此生，先从文，而后习武，由无名小卒成长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军事首脑，直至民国代总统。几十年间，可谓大起大落，历经沧桑，遍尝甘苦。在那个西方列强争相肉食中国的年代，作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偏又文运不济的穷秀才，冯国璋选择了一条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路，也是他顺应时势而变的最佳抉择。

诚然，最初他弃文从军，动机皇为个人出人头地，找条出路。但到后来有了较多的经历见闻，尤其是亲身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的惨败，看到日本的富国强兵之势，使他的的爱国热情和兴国雪辱之志不断升华。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才促使冯立志办军事学堂，操练新军，培养出一批批有用的军事人才。

因此，尽管限于时势处境和其他原因，冯国璋作为清政府或袁世凯的部将，有过剿灭义和团运动，镇压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罪错，但也不能抹煞他在其他方面所做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功绩。不能否认，若客观公允地作一评价的话，冯国璋可以称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学有智谋的军事家和一个有成就的军事教育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当冯国璋的曾孙欲承前人之志，

一心想步入军营锻炼时，却被道道禁牌挡住了道路。

那头一道禁牌上就写着：因为他是冯国璋的后代！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时看来很有道理很得众势的事，过后一看一想，便只有可笑和悔疚的份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冯巩中学毕业，进了纺织技校，从技校毕业出来就进了机械厂当钳工。还在说相声，搭档是比他小一岁的刘伟。两人一起合说相声已好多年了，在天津纺织机械厂又成了文艺骨干，成了少不了的“宝贝”。

冯巩在进厂的两三年内，接连创作了《谱新曲》、《老班长》、《炉火正红》等段子，在《天津演唱》上发表，又连续在天津文艺汇演中获表演一等奖、创作优秀奖……似乎可以安身立命了。

但是他“贼心”不死。

他仍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走进军营。他憋着一口气，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要当一回兵，穿上军装，戴上军帽，走上部队文工团的前台说相声，给成千上万的官兵们送去欢笑，让那些军官领导们承认他冯巩，不能与从前那个成长为旧军阀的太爷相比了，他是新社会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热迎青年，一个立志献身艺术的优秀青年！

年头捱到了1977年。

这时中国政坛处于微妙的交替时期。一股清新的空气正在冲涤那窒息多年的浊气，其重要标志便是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

有一天，马季忽然传给冯巩一个信息：沈阳军区有个基建工程兵部队爱才如命，该部队首长已发下话来，不追究家庭出身，重在个人表现，只要是真人才，我们要定了！

果然，没隔几天，两个精神抖擞的军人来到工厂，要求协商征召冯巩、刘伟两人入伍的事宜。

但是工厂领导不同意。咱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干吗要让你们挖走？部队需要，咱工厂更需要。咱纺织机械厂4000多工人，就爱听他俩说相声，厂宣传队还靠他俩撑着得奖呢？

协商来协商去，厂方不肯让步。

部队两人摆出强硬态度：“你们不放，我们也招定了。只要他们本人愿意，你们怎么拦也拦不住的！”

两位军人就去做冯巩的工作。

“这样能行吗？”

“准行！只要你们愿意，什么都可以解决，一到部队就让你穿上军装！”
草绿色军装，多么富有诱惑力呵！

虽然只是一句口头承诺，但已将冯巩心头那行将熄灭的希望之火重新又点燃了。

他兴冲冲地跟家里人商量。

不料，父亲不赞成，哥哥皱眉头直摇头，就连一向鼓励儿子求上进不畏难的母亲也持怀疑态度。

“那到底是什么部队，在哪儿，你弄清楚了吗？没有参军指标，部队和地方弄僵，就怕将来想退步回天津都困难。”

几十年的风霜历程，使这位中学教员预感到事情决非天真性急的儿子想象的那么美好，中国的事情复杂多变，尤其是那样的年代，挫折和教训已经够丰富够惨痛了。

做母亲的除此以外，更有一层情感的失落难以言表。她真舍不得朝夕为伴，同甘共苦的小儿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单身独力地专闯荡世界，孩子还个，还不满 20 岁呵！

听到一片反对声，冯巩着急了。盼呵盼呵，好不容易才盼来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若放弃了，又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了却当兵的夙愿呢！

“你们……你们总说让我争气，要我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又说这不行那不行的。我没去，怎么知道不行，不去闯一回，我还争的什么气？”

冯巩此时已铁了心，非去不可。什么厂方不同意，没参军指标，不合程序，他都不管，有那军人一句话，他全信了。走！不管它，天塌下来我也要闯出这窝囊人的地方！

最后还是冯海岗给儿子放了行。做父亲的也打从年轻气盛的年岁过来，男人志气可鼓而不可泄，他开了口：

“就让小巩去吧。去一趟试试，吃点苦，受一次磨难也有好处，男人么。不行的话就回来，车到山前必有路。”

于是，在工程兵部队那两个军人的“策反”下，冯巩和刘伟两个工厂的“逃亡者”，悄然离开天津，坐上北去的列车，出山海关，闯“关外”去了。他们怀着对人民军队的崇敬和神秘感，带着对美好前程的想象和憧憬，轻身简装到了千里之外辽宁省法库县工程兵部队的某工地新兵连。

法库在辽宁省的西北角，紧靠内蒙，是个偏僻贫瘠的小县，这儿的冬季比渤海湾来得更早，呆得更久。还没到 12 月，寒流骤降，刺骨的北风裹挟着鹅毛大雪在荒野上呼啸长号，气温竟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严寒冰霜和荒凉寂寞如一对恶煞门神，威吓两个来自热闹大都市的小青年。

冯巩和刘伟是作为文艺兵特招进部队文工团的，怎么一来就把他们放进新兵连集训呢？原来工厂头头得悉，这一对“宝贝”是工程兵部队偷偷“劫”走的，怒不可遏，即向天津市革委会、工程兵总部、沈阳军区告状，甚至将状纸送到了中央军委。

让两人下新兵连，是要避避风。

这一“避风”，可让他们吃了点苦头。

两人到了基地，因没列入编制，算“黑兵”，不能享受正式军人的待遇，没有军装，连必不可少的御寒冬装和大头皮靴也挨不上边。家里带来的简装根本无法抵御这严寒坚冰的侵袭。看着两人冻得瑟瑟发抖的可怜相，连队领导借给他们一套冬装。

同连队的新兵多来自农村，他们好奇地打量一高一矮两个大城市来的新兵。听说两人原是一家大工厂的，便很纳闷：好好的呆在天津大城市，拿每月 40 多元国家工资，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这俩傻蛋有福不享，跑这穷乡僻壤来当工程兵，吃苦受累，真不知中了哪门子邪了！

望着野外茫茫的雪地，简陋的营房，感受到呼叫着的北风袭来的彻骨寒意，面临这艰难而尴尬的处境，冯巩心里也有些发怵。

苦，他是从小受惯了的，冷点也无所谓，担忧的是第一步迈出了，下一步是否能踏踏实实地踩下去……他只能为自己和伙伴刘伟一个劲地打气：没事，熬几天就会习惯的，不吃苦中苦，哪得甜上甜？

军营生活开始了。

新兵连是给新兵蛋子们调教脾性，“上笼铐”的，管理极其严格。每天 6 点起床，十分钟整理内务和洗漱，紧接着便出操，顶着凛冽寒风在雪地上

齐步跑，快跑中喘着粗气，上唇茸毛似的胡须很快便结上了冰碴，冻出来的鼻涕也在几十秒内结成了冰。排长领着喊口号，一二三四，士兵们也和着声喊，零下30几度的严寒中，嘴一张开，再合上竟能觉出口内似有冰碴撑着，合不妥实了，这也是一种寒气的“速冻效应”。

出罢操回到营房，立即用餐，一个班围成一圈，啃馒头咸菜，吃大和菜。

工程兵算得是最苦累也被人视为最窝囊的兵了。譬如这个基地的工程兵，作为兵的职责，便是一年到头专门挖煤，为部队和地方提供燃料。许多人当三年兵挖三年煤。

吃罢早饭，全体新兵便下煤井去挖煤。井下滋味难捱。井道内狭窄黑暗，阴森潮湿，打风镐，撬煤块，推煤车，哪件活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天干下来，熬到爬出煤井，身上脸上乌黑一片，浑身骨头如同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忍。

晚上还有学习任务，读报，读文件，讨论国家大事。熄灯号响，才能倒到床上睡觉。睡，一下子也睡不着，腰背难受疼得厉害。

两个城市兵悄声说话。

“喂，腰背不好受吧？”

“嗯，你呢？”

“差不多，这身皮肉跟咱们当工程兵可吃一回苦啦。”就是这时候，冯巩也不会失去幽默感，“好在没谁当逃兵。”

“喂，冯巩，你说咱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以后若是还当不上文艺兵……”刘伟欲言又止。

“嘿，没事，首长都拍胸脯保证过了。军人说话硬碰硬的，还能赖帐？”

冯巩话虽这么说，心里也没底。但他是领头羊，不能先泄气。就想法引刘伟高兴宽心。他想出个话题来。

“你知道，我大哥插队的地方，就离法库不远呢。你信不信，说不定我们有机会碰上他来法库卖马呢！”

大哥冯信比冯巩大九岁。1968年插队到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共呆了11个年头。那地方离位于辽宁西北的法库确实很近。有一回冯信回家过年时，说起插队务农的一些事，有苦涩辛酸的，也有颇具意趣的。

冯信所在的生产队很穷，到年底分红没钱可分，队长被要钱买票回家过年的知青们吵得挡不住了，便去牵来一匹马，“把马牵到辽宁那边去卖个好价钱，回来交帐，支钱，滚你们的蛋吧！”

知青们便兴致勃勃地牵着马走了百十里地，到辽宁那边去赶集，卖牲口。

赶集卖牲口是有一定行规的。他们不懂，买主问这是几岁马，要掰嘴看马口，他们不让；买主按习惯伸手过来摸价，知青不知其故，触电似的甩开那手，“干吗干吗？要买就买，你乱抓乱捏人家的手干吗？咱又不是细皮嫩肉的姑娘，真是的！”

好容易把马卖出手，又不知道该把笼头卸下来。俗话说“卖马不卖笼头”。回来后又让队长好一顿骂。不过骂归骂，马儿已换了钱，众知青欢欢喜喜支了钱，坐车回家与家人团聚去了……

“刘伟，说不定这一阵我大哥又会来法库卖马，咱有机会星期天去一趟法库，没准能见着大哥一帮人牵着一匹枣红马在牲口集市上站着呢！”

说得刘伟也来了精神，将脑袋伸出被窝，侧过脸来说：“那咱们先不让他们卖马，得让咱们先骑上遛几圈，玩个痛快。”

“让他们请客。卖了马他们有钱准要吃一顿，来它一顿萝卜炖羊肉……”

“不，得吃蒙古味的手扒羊肉，那才带劲呢！”

“嘘——”旁边的新兵警告过来了。

两人赶紧闭了嘴。

也不过是说说高兴，精神会餐一回而已。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星期天，却规定不许去县城玩，整理内务，做好事……后来好不容易去过一回法库，用十来分钟在小县城里转了一圈，也没见着他们向往的牛马集市，自然更不会有大哥冯信那一帮子知青们和他们的高头大马了。

冯巩是能够律己的。眼看着在这个工地每天出操挖煤，耗费时光，就急得不行。于是自订了一个学习计划：

每天出操前半小时起床读书，晚上学习到九点半。星期天除了洗衣服做好事以外，就是自学。

他把带来的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和成语词典、字典都摆列在床前。时间安排得很具有“历史”意义：今天看古代诗歌总集、明天看屈原楚辞，后天看西汉前期散文和辞赋，再看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同时交叉着背诵唐诗，今天须背熟李白的《将进酒》，明天拿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后天再攻白居易的《琵琶行》的前50行……加强文学素养的同时，每天复习相声的绕口令，说学逗唱都得练，不能搁生。

过了两个月，师部领导估计“劫人”的风头过去了，就通知冯巩、刘伟上铁岭师部文工团报到。

到了铁岭，师首长和文工团的团员们像迎接远方征战归来的将士一样热情周到。团长为他们卸背包，团员们笑盈盈地端来了热乎乎的洗脸水和茶水，围着两人嘘寒问暖，问长问短。师政委李佐军还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说是为两人接风洗尘。

冯巩这下可是头一回经历这么热烈而感人的欢迎场面，头回感受到部队这种大家庭里真挚而温暖的战友之情。对比往昔那种冷漠的环境和仇视的目光。真是天壤之别，顿时有股暖流在胸口奔涌。

师部文工团有20多人，大多来自基层连队，也有几个乐手和歌手是像冯巩那样“曲线入伍”进来的。这个团实行“乌兰牧骑”式的宣传形式，节目要灵活多样，队员须一专多能，而且演出频繁，流动性特大。他们一年四季都得随施工部队的移动而动。这一阵还在沿辽河边走，说不定下个月就奔进兴安岭的崇山密林中去了。工作是十分辛苦的，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是等闲之事。工程兵大多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段开设新路，铺架桥梁，许多工地只能步行去，演出用的道具服装乐器之类，全得20几人分别肩扛手提，十足的江湖戏班子形象。

但是冯巩干得挺欢，精神上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充实。这是个团结和睦的战斗团体。团内同志不分职位高低，演员没有主次之别，把方便让给他人，困难留给自己，等等。冯巩很受感动，很受鼓舞。他也尽力地去干，抢扛箱子，帮着布置演出场地……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一段生活经历时，冯巩仍能清晰地叙述一桩桩感人的小事，体味那种难能可贵的战友亲情。

但他却未能继续呆下去了。

因为过了一年多，他和刘伟仍未能解决军籍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俩穿着军装是非法的，是冒充的军人，是一对“黑兵”。

不是部队不尽力，为解决两人的入伍问题，师部曾三次派人去天津斡旋，结果都是败兴而归。

1978年底，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招生。早知冯巩、刘伟这对相声苗子的王光斗和王刚便瞄上了他俩了。看过表演，当场兴奋地拍板：只要他们师放人，咱们一定收！

但毛病的根子仍在天津方面。天津纺织机械厂的负责人口气铁硬：不行，人必须给我送回来！不然，官司打到中央，你们部队也是要输理的！

部队再也顶不住压力了，只好决定放冯巩、刘伟回天津。

这是一次悲惨而不无悲壮意味的“溃败”。师政委李佐军是“冯刘事件”的始作俑者，但弄到后来却又悲剧性地做了“挥泪斩马谡”的诸葛孔明。他再一次邀请冯巩、刘伟去他家吃饭，但这次显然是“最后的晚餐”。

爱才如命的李政委面色黯伤，十分负疚地给两人敬酒辞行，愧言道：“真对不住你们了，人来了一年多，又让你们这样回去，请多多原谅了，谢谢你们为部队做出的贡献。你们有才华，还很年轻，此后一定会有远大前程。这我早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是金子总要闪光的。别灰心，有空回部队来看看……”

冯巩是重情义的人，听首长说出这番肺腑之言，心中一阵酸涩，也被深深感动了。

“政委，咱到这儿来，没啥好怨的，也不后悔。首长和同志们对我们这么好，一年多来在部队里学到的东西，一辈子都受益。这是实话。您千万别有歉疚……”他反倒劝起政委来了。

两人悄悄回到天津。

他们已经做好了挨克的思想准备。但始料不及的却是极其凶猛的当头一棒。

一张醒目的大布告贴在墙报栏上，浓墨大字赫然写着：

冯巩、刘伟二人目无组织纪律，擅离职守，旷工达一年多，经研究决定予以自动离职处理。鉴于二人已一年多未参加团组织生活，作自动离团论处……

另有些以此儆众的话。

这便是厂领导们对冯刘两人这一年多参军历史的“盖棺论定”。

胆大妄为的小子们，你们自以为有才能，有门路，可你孙猴子能耐再大，也还是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你们哭去吧！

两个年轻人呆立在布告前，久久地移不动脚步。在那时，这种严厉的“双开”处理，就意味着你已被社会剥夺了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形同一个废人！

第五章 120 公里走了八年

纵是好马也只得吃回头草了
沈永年探家，探到了天津的一对“宝贝”
侯跃文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陈书记
一台好戏换一对“厂宝”

冯巩自然不会放弃他的相声。

在厂里工作，又与外界常接触交流，听的新鲜事也多，这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他善于捕捉一些有趣且典型的事例人物，很快就编成有针对性并很有趣味的相声段子，在厂里的文艺演出时推出来，往往立即就成为轰动全厂的热门话题。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冯巩先后创作演出了《红娘》、《忏悔》、《螃蟹的功能》、《生活与礼貌》等具有浓郁工厂生活情趣的相声段子。这些作品相继在《天津演唱》上发表，其中的《生活与礼貌》还在全国性报纸《工人日报》上发表。这可是制线厂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突破。冯巩给厂里带来了欢笑，激发了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青春活力，又赢回了许多奖励和荣誉，这使厂部领导们满心欢喜，“伯乐”陈逸民更是笑口常开，一再地在大小会议上表扬冯巩的工作成绩和热情。

陈逸民有心要培养冯巩挑大梁。这小伙子会有大出息的，各方面才能都具备，咱可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呵！他在厂部会议上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让冯巩出任厂团委书记。

这可让人事部门的同志为难了，档案上分明有一页写着，因无故旷工脱离团组织，冯巩已被取消团籍了。没有团籍的人怎么担任团委书记呢？

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库，工程兵师政委李佐军挺身而出，“谁说冯巩不是团员？我们给他开证明！他在部队人过一回，一切手续齐备。不信来调查好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新矛盾，也是老问题又一次横在了冯巩和陈书记面前。

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侯跃文领着该团领导走进天津制线厂，协商要把冯巩、刘伟调去当专业相声演员。

是一次偶然机会，让铁路文工团发现天津的这对“宝贝”的。

三个月前该团编剧沈永年回天津探亲，偶而听朋友说，有两个在张善甫的游说对象中，有个人叫陈逸民，是天津制线厂的党委书记。听说冯巩、刘伟是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便十分爽快地说：

“是人才，我就要收。”

他把两个处于落魄之中的年轻人招进了制线厂。

陈逸民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老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酷爱文艺，也谙熟用人之道。他看中了冯巩、刘伟两人确实有才华，认为只要善加诱导，准能为他这个几千人的大厂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

他对被他“保释”而来的冯巩进行了一番教导后，拍拍小伙子的肩膀说：

“小冯呵，你还年轻，闯世界可不那么简单，得身骨硬翅膀硬，还得看准时机……你既然回来了，就静下心来好好工作，以后嘛多为厂里的文艺活动出力。听说你们家……唉，也挺难的，好好干，总会有出息的。”

纵然是好马，也只得吃回头草了。

冯巩老老实实回到车间干他的钳工，一天到晚八小时拿扳手钳子，对付冰凉的铁家伙。常常低头躬背干半天也懒得说一句话。

陈逸民书记心里惦记着他，不久，一声令下，就把他抽调到厂团委去搞文体工作了。陈笑眯眯指着冯巩说：“你到我们厂当钳工，那不屈了才？听着小伙子，好好施展你的才华，把厂里的文体活动抓起来，搞好了，将功赎‘罪’吧。”

冯巩深知陈书记的一片爱才之心，便下大力扑在了文体工作上，很快就抓出了实效。他办起了青年之家，组织起宣传队、体工队，组织美术讲座和裁剪学习班，还拉起了一支“红娘队”，专门帮大龄青年铺架“鹊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京津沪三城市纺织系统组织青年工人文体比赛，冯巩带领的天津制线厂代表队在多项赛事中名列榜首，给厂里抱回了一堆奖状，赢得众人交口赞誉。

在张善甫的游说对象中，有个人叫陈逸民，是天津制线厂的党委书记。听说冯巩、刘伟是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便十分爽快地说：

“是人才，我就要收。”

他把两个处于落魄之中的年轻人招进了制线厂。

陈逸民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老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酷爱文艺，也谙熟用人之道。他看中了冯巩、刘伟两人确实有才华，认为只要善加诱导，准能为他这个几千人的大厂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

他对被他“保释”而来的冯巩进行了一番教导后，拍拍小伙子的肩膀说：

“小冯呵，你还年轻，闯世界可不那么简单，得身骨硬翅膀硬，还得看准时机……你既然回来了，就静下心来好好工作，以后嘛多为厂里的文艺活动出力。听说你们家……唉，也挺难的，好好干，总会有出息的。”

纵然是好马，也只得吃回头草了。

冯巩老老实实回到车间干他的钳工，一天到晚八小时拿扳手钳子，对付冰凉的铁家伙。常常低头躬背干半天也懒得说一句话。

陈逸民书记心里惦记着他，不久，一声令下，就把他抽调到厂团委去搞文体工作了。陈笑眯眯指着冯巩说：“你到我们厂当钳工，那不屈了才？听着小伙子，好好施展你的才华，把厂里的文体活动抓起来，搞好了，将功赎‘罪’吧。”

冯巩深知陈书记的一片爱才之心，便下大力扑在了文体工作上，很快就抓出了实效。他办起了青年之家，组织起宣传队、体工队，组织美术讲座和裁剪学习班，还拉起了一支“红娘队”，专门帮大龄青年铺架“鹊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京津沪三城市纺织系统组织青年工人文体比赛，冯巩带领的天津制线厂代表队在多项赛事中名列榜首，给厂里抱回了一堆奖状，赢得众人交口赞誉。小青年的相声说得很棒，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呢，他被好奇心驱使买了一张票。

这天冯巩和刘伟表演的是《红娘》。沈永年看罢大为惊喜，回北京后马上去找说唱团团长和同行们，“真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表演风格非常‘雅’，没有丝毫天津旧艺人的俗气。这是人才，难得的人才！”

团里有几个人半信半疑，也赶去天津看了一回，转来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

当众人说三道四时，侯跃文在一旁听着，一直没吭声。相声艺术大师侯

宝林的这位三公子有个怪脾气，不轻易信人。别人说好，他肚里便嘀咕，是吗？真那么好？两个天津工厂的小青年能有几斤几两，值得这么多张嘴为他们评功摆好？好，那我也得去瞧一眼，是骡子是马，得亲自过目一回。

他就约了石富宽悄悄去了天津，看罢，一咧嘴，哎，真不赖呢！咱得把他们挖来！

侯跃文成了最积极的“挖宝派”，唆使团领导下决心快行动，“晚了就让别人挖走了！”

沈永年主动请缨去打前锋，先找两个年轻人谈，再探探该厂领导的口气，愿不愿放人。

这天冯巩、刘伟正在车间干他们的本职工作，一身油腻的工作服，手上拿着手钳，脸上淌着汗水。

“铁路文工团，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性专业文艺团体呵，居然看中我们，要我们去当专业相声演员，哪还有不乐意的？”

“不过你们最好跟厂领导好好协商。”

这时的冯巩已非两年前毅然“私奔”去当兵的毛头小伙子了。得稳着点，别再犯那种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膻的错误。

此时的冯巩已很能品味出“卧薪尝胆”这句成语的复杂含义了。要有耐心，要能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练就一身本领，只要人们乐意听相声，他总有闯出去的一天！

家里人几次劝他好好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冯巩深知一心不能二用，发愤地钻书堆，玩命地去考两回，兴许真能敲开大学的门。可这代价却太大了，他就再也不会可能潜心钻研自己酷爱的相声艺术，不能做一个相声演员，做一个第一流的艺术家了！

冯巩此心已定，这辈子就跟相声擦上了。自从1972年那回蒋道桑老师一时心血来潮，把他拽上相声这条船，他就再也不下来，再也不想下来了。

冯巩在厂里卖命地干，为工厂争荣誉，争名声，一方面是报效陈书记及制线厂的厚待，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的再次“冲出天津”打基础。“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制线厂毕竟只是个行业工厂呵，外面的世界更精采！

陈逸民书记友好地接待了北京来的“说客”。笑眯眯听来者说完，面孔就板下了。

“不行！冯巩、刘伟是我们天津的人才，制线厂的文艺骨干，我们决不会放的！”

沈永年虽说碰了硬钉子，好歹也还是探出了陈逸民的“薄弱环节”：一方面不肯放人，一方面又极爱人才，要造就人才。

第二次，就是正式的“板门店谈判”了。已有“先锋”沈永年的情报，此番的谈判主力侯跃文胸有成竹，一见面便和陈书记大侃人才问题。先说天津制线厂能培养出冯巩、刘伟这一对相声演员不容易，难能可贵；话头一转，又说真正要让人才有大作为，最佳地方当然还是北京，还是专业文艺团体，譬如铁路文工团，出了某某某某等许多著名演员，不少原先都是从基层培养，推选上来的……。

陈逸民以守为攻，回答也是滴水不漏。“培养人才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北京的水能养鱼，天津的河也能养鱼。专业文艺团体需要人才，咱一个几千人的工厂也少不了好人才呵。”

“可您得替他们俩想想前途，那么好的苗子，窝在棚子不可惜了吗？千

里马难找，伯乐更难求。日后两个年轻人到外面有了出息，也是您栽培的恩德，会感激您一辈子的。再说为国家输送人才，在贵厂也是一份重要贡献……”

陈逸民渐渐地就不多出声了。

侯跃文不愧是相声大师的后代，能说，且句句踏在理上，大道理是基层单位对国家奉献人才，小道理则讲人情味儿，好容易才练成了一对相声演员，不让人家走自己喜欢的路，那不就有点那个陈逸民开始松口了：“咱们再研究研究吧。”

侯跃文心里暗喜，起身告辞时一再地握着陈书记的手，“拜托，拜托了。那我们就等在招待所听您的回音了。”

陈逸民为两个年轻人的事犯愁了。

回家后他茶饭无味，家里的喜庆气氛反而让他烦心，躺到床上蒙着被子睡觉，可脑子里总是晃来晃去是冯巩和刘伟那两张笑呵呵的脸，怎么办？让走，还是不让走……

第二天一早，他没去机场为旅行结婚的儿子儿媳送行，而是急匆匆赶到厂里，找来了冯巩、刘伟。

“说实话，我为你们俩的事，一宿都没合眼，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我确实打心眼里舍不得你们走。厂里有你们的用武之地，生活、工作各方面待遇可以尽量优先。你们决心要走，我也不强拦你们，强按牛头不喝水。如果因我影响了你们的前程，那我就太缺德话说到这个份上，实际上已是同意放行了。”

到此刻，冯巩除了感动，还能多说什么？陈书记真是不易呵，他从困境中把我们解救出来，帮我们重整生活和理想的风帆；现在又豁达地放行。他是真舍不得放走人才，何况厂里必然还会有各种议论和压力……心中不由得一热，冯巩的眼泪就下来了。他拉着陈书记的手，哽声道：

“陈书记，我会一辈子记着您的……”

等铁路文工团再派人来商量，陈书记朗声对来使说：“咱想通了，为了他俩的前途，为了相声艺术后继有人，咱忍痛割爱了。”

没想到会这么顺畅，沈永年简直有点喜不择言：“哎呀，陈书记您可……这么开明的领导真是少有呵！”

“可是放他们，咱可有个条件。”陈逸民瞧着沈，停顿片刻。沈永年忙说：“您尽管提，我们能办到的尽量办到。”

“冯巩、刘伟两个小伙是咱厂的宝贝，要走也得走得风光气派。旧社会娶媳妇迎新娘讲究个仪式。我的意思，你们铁路文工团来我们厂走走，演一场好节目，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把他们接走，怎么样？”

沈永年当即答应。没多久，铁路文工团呼啦啦开来一辆大客车。侯跃文、石富宽等一批著名演员都来了。在制线厂工人俱乐部礼堂举行了一场别有趣味的“娶亲”演出。

一场高水平的演出让全厂人都乐了，心服了，行！冯巩、刘伟去这样高档次的专业文艺团体深造，以后准能露脸扬名，那也是咱制线厂出来的人才呢！

1980年9月18日，冯巩带着一床军棉被（这是他当“黑兵”的纪念物）和几件换洗衣服，乘上了驶往北京的列车。

进北京了。

终于有了这一天！

向往北京，是每一个有志于艺术事业的男女共有的心音。

北京，那里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艺术的集萃之地。若说天津或别的什么城市是藏龙卧虎之地，那么，只有北京才算得是龙腾虎跃的演武场，争奇斗艳的百花园。“藏龙卧虎”，一个藏字一个卧字，便把某种局限和拘谨形容透了，要在中国艺坛争得一席之地，要想早日阔步艺术殿堂，蟾宫折桂，唯有进京！

天津到北京，相距才 100 多公里，坐火车仅需两个小时，睡一小觉的功夫便到了。可是冯巩却整整“走”了八年！

自 1972 年，蒋道桑老师把他推上说相声的前台，那年冬天，因相声大师马季一句要收他为徒的承诺，少年冯巩便栽下了那个矢志不移的坐标：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八年，整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呵！

回溯往昔，23 岁的冯巩真是感慨万千，浮想连翩。八年里，吃苦、受累是本份事，蒙屈、挨整，成了家常饭。因为那个沉重的“反动家庭”的羁绊，因那僵化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使得一个有志青年不得不承受一次次的精神和物质的巨大压力，又一回回地从挫折和痛苦中挣扎，挺起困乏的身子，心里说：我非要争这口气！

用了八年的心血和毅力，终于跳上了“龙门”。

也幸亏不久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股强劲东风的扶助，才天遂人愿有了关键一步的飞跃！

坐在硬座席上，冯巩静静地望着窗外初秋时节那一片茵绿的庄稼地。生机勃勃的原野给了这寻找艺术之门的年轻人以愉悦和信心。

进京，那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会有接踵而来的困难和挫折，也会有拼搏后得来的成功和鲜花。

冯巩暗暗给自己鼓气：进了北京，好好干！

第六章 晋京——进京

47岁的冯国璋首次晋京，做了八年的朝廷命官
跪拜礼种下了祸根，南京都督终于向坐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发出了催命的“密电”

重返京城的冯国璋只坐了一年代总统交椅就让同学好友段祺瑞弄下台了

首次在京城大舞台亮相，冯巩差点让观众给撵下来
人进了北京，可“魂儿”还在天津，激怒之中他打了请调报告
还是马季伸出手，把爱徒领进了中国广播说唱团

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春，冯国璋因办军事学堂有功，治学育才有方，被清廷赐予“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这一皇都要职，正式地应诏进京赴任。郑重地说，这是一个文官武将梦寐以求的升官进爵的良机。奉诏晋京，可算得是皇恩浩荡呵！

是年冯国璋47岁，正在年富力强之时，便做了朝廷大官，得了高位厚禄，确实实地实现了当初穷书生时立下的追求目标。

春阳和煦，东风胎荡，一路上，燕舞莺歌，柳绿花红，气象万千。首次做京官的冯总办坐着八人大轿前呼后拥地出了保定城，而后换骑一匹披金戴银的高头大马，往京城驰去。

然而，令随员侍从们大惑不解的是，升了职当了京官的冯总办，骑在高头大马上，沐浴美妙阳光，尽阅田园春色，却是一张愁眉不展、忧郁难解的面孔，大人难道不想当京官吗？

确实如此。

此时的清王朝已近崩溃。慈禧垂垂老矣，而光绪皇帝则如同僵尸一具，朝中满蒙大臣非死即病。而手握重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司马昭之心”，凡清廷中稍有头脑者便看得出端倪了。眼瞅着大清江山将倾，一些年轻满族将官便起来与袁争权，以铁良、衣弼等为首的少壮将领凭借其坚实的靠山，夺了袁世凯的部分兵权，使北洋六镇交出了四镇。

铁良争到了陆军部尚书这一重职，就下决心彻底搞垮袁世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须分化瓦解北洋集团。三年前，铁良曾和冯国璋一同去日本考察军事，两人言谈之中颇觉投机。铁良看出冯的才干和志向，觉得冯与袁并非一类人物，就留了心要把冯从袁身边拆开，为己所用。

所以，他和一些清廷重臣保举了冯国璋进京任职。此举可谓一箭数雕，给冯升作京官，他必然对清廷感恩戴德，疏远袁世凯；用冯的才干培养一些能带兵打仗的满族武将，日后便可取代袁及北洋军中的汉将；如冯不肯入笼套就范，便就近解决，以免后患无穷冯国璋又何尝不能猜出清廷那些满蒙大臣们的用意居心？他深知皇城不是好呆的地方，伴君如伴虎，弄不好就会落得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可悲下场。

但圣旨已下，又怎能抗旨违命？于是思量了又思量，盘算了再盘算，才提心吊胆地进了京城。

冯国璋一进北京，即被铁良迎进了尚书府。铁良作出极亲热的姿态，手搂着冯的肩膀，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你已由正二品升为正一品了。”

冯国璋听了，赶紧作受宠若惊之态，欲下跪作谢，被铁良一把搀住了。

“你我亲兄弟一般，何作大礼？冯老弟若要谢我，只需好好地办贵胄学

堂，为朝廷效力就足矣。”

是日，铁良在府第正堂摆设盛宴为冯国璋接风。满桌鱼肉，搏中美酒，铁良及其妻妾儿女一群人笑脸以待，但冯国璋心里明白，这酒不是好喝的，弄不好就是鸿门宴再现。

席间铁良和家人频频劝酒，冯国璋也作兴奋状，敬来便喝，铁良喝多了酒，便破口大骂袁世凯，冯国璋亦随声附和。不过两个时辰，冯国璋已觉酒多了，深怕酒醉吐真言，便倒在椅子上假装醉得不省人事。

铁良见状，即唤人将冯扶进客房安顿躺下，冯国璋顺势推舟，也就宽心睡着了。

等他半夜醒来，却发觉身边偎着一个娇小美貌的女子。惊起询问，却道是铁良军府内侍女，遵命前来侍奉冯大人的。

在那种微妙时局中，冯国璋猜测铁良此举必有美人计之意。便不敢妄动，细细问那女子何名何样身份，言词小心，低语轻声，慢慢地便让她说出真实内情了。该女子叫何艺花，是个汉人，自幼生活在铁良府中。其母是个女佣，而从不知生父为谁。说到后来，女子便悲切落泪了。“我母亲原是良家少女，是被抢进府中的，被府中男主人欺负了生下了我。她仅仅因为摔碎了一只玉杯，就被二太太用金钗刺瞎了一只眼睛，后来被卖给了蒙古人。母亲要带我去，铁府人不肯放，大人，请你救我出去吧？”何艺花说着，跪在了冯国璋跟前，痛泣道：“大人，只要您能救我出去，我一辈子给您当牛做马，不敢求荣华富贵，能当个丫环侍候您就心足了。”

冯国璋把女子搀扶起来，郑重地说：“好吧，我一定救你出去，还要帮你找到母亲，让你们母女团聚。”

待天色亮起，冯国璋便携了何艺花去见铁良，假意说此次晋京，未携家室，身边寂寞不过，很想找个合适的女子为伴……。

铁良哈哈一笑，便说，“那就让何姑娘跟你去，给你解解闷吧。”

这样，铁府的这位侍女就跟随在冯国璋身边，作了他的侍妾。铁良自以为得计，好比在冯枕边安了“窃听器”，可以随时监视这个汉族官员。却不想何艺花早已向冯国璋掏心掏肺，真情直诉了。当铁良着人借探访送礼之名，找何艺花摸冯国璋的底，她自然拣一些对冯有利的话去应付，反而使得铁良对冯增加了好感，以为已经笼络住这一汉人，拆散了他和袁世凯的密切关系。所以就视冯为亲信，经常在慈禧等人面前夸奖冯国璋的才识和对朝廷的功绩，让给予封官进爵，以笼人心。

其时，身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的冯国璋却是如履薄冰，在宫廷内外小心周旋，说话办事，一举一动都不敢稍有失当，在那些王公世爵，满族权贵和他们骄奢无度的子弟面前，不卑不亢，让他们觉得此人饱有才学又非骄横不羁，一些日子下来，就纷纷颂说冯国璋如何好了。

于是朝廷对冯国璋的恩宠便接踵而来。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蒙前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袁奏请，赏给冯三代正一品封典；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正黄旗蒙古新旧营房城房官大臣着冯国璋管理，钦此。”同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冯国璋着补授军咨处正使，钦此。”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旨：“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着冯国璋补授，钦此。”同年十一月初九，恭逢恩诏加一级；1909年，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恭逢恩诏加一级；同年同月二十八日，恭逢恩诏加一级；同年闰二月十五日，奉旨派出稽查西陵梁格庄值班兵丁大臣真是皇恩浩荡，恩宠无比呵！汉人冯国

璋首次晋京供职，便受朝廷如此重用，多次提拔赏赐，看似辉煌炫目，前程无量，但冯国璋心里清楚，这一次次的恩赐，又何尝不是一条条绳索，一副副笼套？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谁知道哪天那满清主子一翻脸，不会把这些恩宠都收回去，治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冯国璋在京城当官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为担惊受怕，度日如年的时期。他住在城内一座极普通的民宅中，作伴的唯有何艺花，每日上朝或是去授课，两人便后别一番，恐怕此一去便再不能相见。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慈禧相继死去，次年，三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继位，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新皇帝年幼不理朝政，管事的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戊戌变法”时，光绪错用人轻信了袁世凯，结果被那人在慈禧面前奏了一本，从此废了帝业，凄惶而死。载沣要为兄长报一箭之仇，泄一肚子鸟气。加上朝廷中如铁良、衣弼等一些满族官员也纷纷提醒载沣，袁世凯野心勃勃，不除此贼，大清难保。

摄政王便下了狠心，给了袁世凯一个“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病”的放逐处置，让其回河南彰德洹上村养病去了。

袁的革职使得朝廷中担任要职的汉族官员噤若寒蝉。冯国璋更有“唇亡齿寒”之忧，有一次，冯国璋应邀去参加铁良的一次围猎活动，在追捕一头鹿时，冯坠马受伤。这正好为他躲避京师的紧张气氛提供了一个借口。

他即向铁良请假，要求回保定养伤。铁良知道汉族官员人人自危的情况，便安慰他，“冯将军此伤与袁世凯的‘足疾’有所不同。冯将军是明伤，袁世凯却是暗伤，明伤好医，何回籍养病？”

虽有铁良的宽慰，冯国璋仍是心存馀悸，处处谨慎，遇事也常常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绝不敢显山露水。

1910年6月，他的生母孙太夫人及元配妻子吴氏相继在保定病逝，他连忙上奏，要求回原籍安葬亡人。但朝廷仍是不批准。

冯国璋这才明白，那些满族权贵对他所谓的信任，完全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为了把他这袁世凯的左右臂缚紧在皇城内，虽有高官厚禄，实是遭了软禁了，他冯国璋，堂堂正一品的汉族官员，原不过是禁在皇城内的一名囚徒！

此一段时光，冯国璋真如陷身囹圄的待刑之人，唯一能倾吐衷肠的只有何艺花一人。而两人即使在家说话也只能说得极轻，还得故意把留声机放得很响，以防朝廷的密探偷听了去。每日清晨上朝时，冯国璋便让何艺花为其整理衣冠，两人默默相望半晌，如同永诀，不忍告别。傍晚下朝了，何艺花早早便候在巷口，远远见着冯国璋的身影，便兴奋不已地奔去迎他。那情景像是迎接探险归来的勇从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国璋做了整整五年京官。这五年的京官使他处在双重的世界之中，一方面是沐承着浩荡皇恩，职权荣誉看似无以复加，荣耀已极，而其内心则始终惶惶然如惊弓之鸟，少有乐趣和安宁。

幸亏南方闹起了革命，朝廷为剿灭“乱党”，才把他派出去充任了荫昌领导下的征讨大军第二军的总统领，冯国璋终于有机会辞离了京城。

清廷用冯国璋去剿灭“乱党”，却不防他悄悄去彰德见了袁世凯，依了袁“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诀，有意拖延时间，目的是要压清廷为袁“平反”，重新启用袁氏，再掌北洋兵权。

冯国璋对袁世凯一直怀有知遇之恩。当清廷削除袁兵权，放逐其回家养病时，他认为摄政王等满清权贵是有意对汉人排挤压制。但他未曾料到袁世

凯野心更大，官复原职并不能令其心满意足，袁是想借辛亥革命之火，达到从清廷手中篡夺最高权位的目的。

与野心勃勃、老奸巨滑、惯会耍权术的袁世凯相比，冯国璋就有点迂腐了。他一心要知恩图报，立功受赏，以图个功德圆满、封妻荫子的好结局。一个要借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以期乱中夺权；一个却欲显一下力挽狂澜的好身手，赢得一世英名，流芳后代。

这一来，冯国璋和袁世凯两人便开始有了分歧和矛盾。这矛盾在进攻武汉三镇之战事之中，便很微妙地显露出来了。

1911年10月25日，清廷按袁世凯所奏，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领，29日与荫昌办妥交接，即开始全力进攻位居长江北岸的汉口，11月2日攻陷汉口。

按冯国璋部署，应当紧接着再攻汉阳、武昌，但袁世凯以兵员军火不足为借口，令其暂缓攻城，仅以炮火隔岸轰击。

这时袁世凯便开始周旋于义军和清廷之间，实施其夺取最高权力的计划了。

稍后，为了增强袁世凯谈判的筹码份量，才又令冯国璋率军攻打汉阳。

11月27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一夜之间攻占了汉阳。此役毕，冯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

正当冯国璋饮马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

这使得冯国璋大惑不解了。

袁冯二人的矛盾在于：袁世凯早就存有取清廷而自代之的心机，而冯国璋却从没往那儿想过。他虽然对清廷满人权贵压制排挤汉族官员的做法不满，但决无贰君之意。

自幼便习四书五经，已存满腹经纶的冯国璋，十分敬仰前辈汉族官吏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他平日尤其爱读《曾文正公家书》之类的书，对曾国藩的文韬武略推崇倍至，也有意效仿曾某，做一个忠君报国，留芳后世之人。

这就很让袁世凯伤脑筋了。他原以为冯国璋是他最贴心亲密之下属，必然一呼即应，心领神会，却不防冯会这么不解人意。

得了“按兵不动”的密电后，冯国璋一次次地电催袁世凯，要求决然出击，不能放过战机。袁世凯被催得没办法，就派了个心腹去面见冯国璋，以言试探道：

“革命党一旦反攻过来，你打算怎么办？”

冯说：“我只有忠心报国，不知有他。”

袁第二次又派人去说：“天下纷扰，莫固执己见，倘时机到来，你也可酌情行事。”冯说，我意已决，请勿多言。

袁见冯与自己的意图不合，第三次忽然派人到汉口见冯国璋，令其班师回京。冯问有无上谕，来人说是宫保（指袁）口谕。冯恐其不实，于是发电向袁询问，袁回电不说有无此举。冯因来人甚唐突，很怀疑其身份，可又不敢轻易处置，只得让宪兵管带王某把这人送回北京，路经彰德，又为袁克定截去。

由此冯国璋对袁的动机产生怀疑，于是他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一时

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三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召见冯国璋。

不想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已有防备，抢先去见隆裕太后，摇动口舌，使冯的计划泡汤，还差点被袁干掉。

而后袁便委派段祺瑞急赴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而冯则被调回京城，继载涛任禁卫军总统领，兼察哈尔都统。

袁世凯的权术十分了得，他一方面将冯国璋以延误进攻时机为名，撤去其前军指挥权，以更忠心的段祺瑞取代，又为冯安排相当于京城卫戍司令的要职。这样既不得罪冯，又让清廷以为冯受袁排挤，乐意由冯来保卫京都。

冯国璋此时已清楚袁世凯心思，但对清廷也仍有感恩之情，所以也在两难之境。到袁世凯逼使隆裕太后逊国退位时，禁卫军官兵万余人，认为满族皇室面临灭亡，无不反对袁氏，欲起兵发难。这时冯国璋一方面深感袁世凯野心过大，逼人太甚，一方面也知清廷灭亡已成定局，再怎样也是难以补救了。这样他就只身去了军司令处，召集了全军官兵，自登高桌，向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的优待皇室条件，关于禁卫军额数奉饷仍如其旧，并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声明自己决不与革命党往来，倘发现言行相违，准许本军人员随时枪杀。又命公推两人跟随出入。当场推出正目福喜、德禄两人。冯立即派为副官，各赐马一匹，手枪一支，随同进城，于是风波暂息。

冯国璋在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证实他对清廷禁卫军的诺言，也为证明自己清廷一如既往的忠诚，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冯国璋仍保留着发辫不剪，他所戴的红顶花翎的官帽，也一直放在帽架上。

在攻打武汉之役及此后袁逼清帝退位，冯国璋对袁的所作所为很不满，但又不能发作，还得顺从，协助他篡夺权力。这是非常痛苦的，尽管冯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态，但这种屈服情绪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压抑不住而爆发有一件事可看出其中隐情。

袁世凯坐稳了民国大总统座位之后，有心要称帝为皇，便在中南海总统府恢复了已经废除的清廷跪拜大礼，小站出来的军人见了袁都要行跪拜礼。唯有段祺瑞脾性刚烈，极为反对在民国时期还要曲膝，连拜年也不去袁府了。

冯国璋就劝段：“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就硬拉了段一起去给袁世凯拜年，并且自己先跪下了，段见冯下跪，没办法，只好跟着跪下了。

袁见了这两员大将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来呵着腰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冯段坐了一会儿，再到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里本已十分委曲，怎想那位大少爷却端坐不动，受之泰然，只是微微地把手抬了一下，好像皇帝叫臣下平身的模样。

两人退出后，段祺瑞满肚子怨气，对冯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那位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辈子狗，过要做下辈子狗！”

这时一向能自制的冯国璋终于也发怒了，“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也忍不住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当一辈子狗！”

这事后来传到袁克定那儿，有人告诫他不该摆架子惹怒北洋两大将。谁知袁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的安排，这两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都有点尾大不掉的，我若不忤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会

爬到我头上来呢！”

袁大公子这话传出去，就不光是冯段二人气恼，连其他北洋军官也心生怨恨了。这就给此后反袁你帝埋下了火种。

1913年7月，南方又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破坏革命搞独裁的“二次革命”。7月13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继而江苏、广东、安徽、江西等省都宣布讨袁和独立。

冯国璋奉袁世凯之命，率北洋军南下。经激战半个多月，冯军及张勋军相继攻入南京城，前任江苏督军的张勋放纵部下犯好作恶，引起公愤，即由冯国璋接任江苏督军。

自1913年至1917年，冯国璋在南京呆了四年。

远离京都，隐居石头城，冯国璋确有如释重负之感。自1906年晋京，这几年正值朝政大乱，乾坤颠倒之时，虽经百般争斗，几经波折，仍保住了性命和官职，但那种风激浪涌后的惊悸，血雨腥风过罢的后怕，使得冯国璋早有远离京都闹市之心了。

冯国璋在南京，一方面治军抚民，休生养息，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安定和民众温饱之事；另一方面，也加紧与邻近几省联络，结为同盟。同时，冯国璋虽身为江苏督军，远离北京，但皇城内的风雨变幻依然是他密切关注的，尤其对袁世凯的野心十分警觉。

当他初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时，还将信将疑。尽管早几年冯对清廷的败亡还有几分怜惜，而经数年共和制的实行，尤其对照西方列强的国情，他已确信帝制在中国已决难通行，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实在是逆天下之大道，行自取灭亡之举，这不是太傻了吗？

冯国璋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他于1915年6月赴京谒袁。问袁：“外面都在传说总统要改帝制，不知是真是假？”

袁世凯作出感叹状，答曰：“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直说，自古开国君主年皆不过五旬。我已是近60的老翁了，鬓发尽白，精气将竭；再者说，大凡想做皇帝的，必须有好儿子，克绳基业，传之后代，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老三老四不过是纨绔而已，我若当皇帝，选谁当继承人呢？将来还不是尽招祸水？”

冯国璋又以话试探：“若众人都推拥你登基，那时恐怕想推却也难了。”

袁世凯微怒道：“我决不干这种事，假如真有人这样逼我，我就出国，找我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再不管国事了。”

冯国璋见袁信誓旦旦，也就打消了疑虑，返回南京了。然而没多久，北京以杨度等人纠办的“筹安会”开始公开倡导恢复帝制，袁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冯国璋才知受骗，愤然与周夫人道：“他哪里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工戏真是不错呢！”

自此，冯国璋走上了与袁贼彻底决裂之路。而袁世凯对冯也早生戒心，采取了种种严密的防范措施，在冯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又密电于张勋，嘱其就近监察；另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八师移驻上海监视冯国璋，再派卢永祥的第十师驻扎吴淞防备冯……

在这种情况下，冯国璋对袁已完全失去最后的一点信赖，当江苏为袁当皇帝而举行国体投票这场游戏时，冯托病不去；等齐耀琳巡按使亲去请他，才勉强到会，也仍是一言不发，呆坐而已。

袁深知冯国璋手握重兵，是个大隐患，便调冯进京去任参谋长，欲用“明

升暗降”之策夺冯的兵权。冯知其阴谋所在，便托词养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无奈，只能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中下游，又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催冯进京就职。

拖延至年底，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告起兵讨袁，在全国一片讨袁声浪中，冯国璋终于决定公开与袁决裂，反对帝制，成了北洋派中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个中心人物。

他与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派人物联系密切，尽力阻止北洋军与护国军交战，他在南京军署接见了他的女婿陈之骥、侄儿冯家祐和四川将军陈宦派来的代表胡鄂公，席间讲了个袁世凯书童献茶的故事。

袁的书童一次给袁献茶时，看到袁的床上趴着一个大癞虾蟆，不禁心一慌，手一颤，把袁心爱的一只珍贵的茶具摔碎了。袁从梦中惊醒斥问怎么回事？书童急中生智，说看到万岁爷床上盘着一条大金龙，心中一惊才把茶杯摔了。袁听了不但未加责备，反而赏给书童100块大洋。

冯国璋说完，三人都表示了反袁的心愿，他从中看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于是就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李瑞山、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芑铭等通电袁世凯：“速弃帝制，以安民心。”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将军密电”。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他气急之中，几乎晕倒。帝制派人物见此电，亦个个瞠目结舌，足见冯国璋此举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

据说袁世凯当夜便派专使押送一车至南京，密呈冯国璋，说袁公之意俱在车上了。

冯一看车上所载竟全是办酒席之物，其中鸡鸭猪羊等俱剖作半只。他即知袁之暗示：只要他不反袁称帝，袁情愿让南方半壁江山由他坐。

冯国璋摇头叹道：“袁公至今尚不明事理，非冯某不让他当皇帝，乃国人人情所迫呵！”

次日，走进了死胡同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未几，破了皇帝美梦的袁氏忧怨难支而一病不起，很快便一命呜呼了。

袁世凯称帝遭国人唾弃，蔡锷等在云南举兵反袁，反映了民心向背，但若无手握重兵的冯国璋等挺身反袁，恐怕袁某就有恃无恐，不会把民情和蔡锷那支滇军放在眼里。所以，冯国璋断然反袁，在这场反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是有一定功绩的。

然而一波方住，一波又起。

1917年7月1日，安徽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怂恿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由，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扶持清退位皇帝溥仪重新登基复辟的丑剧。

这无疑又是一次历史大倒退，招致国人的竭力反对，总统黎元洪宣布辞职，要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之职，维护共和国体。

在此国势危难之中，冯国璋迅即于7月3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讨张勋复辟，并立刻组织讨伐军北上。张勋复辟之闹剧不几日便收场了。

把张勋的辫子军驱出北京后，冯国璋欲还权给黎元洪。黎氏坚辞不受。于是冯只得担当起代总统之职，于7月底启程离开南京，8月1日抵达阔别4年之久的北京。

此番进京，已非初次晋京。当年是被提拔重用，受人恩惠，又受人掣肘时，

过的是小媳妇般提心吊胆的日子。

而这一回，冯国璋已是一国之主，坐上了最高权力座席，应是无所畏惧无可担忧了。

事实却不然。

冯国璋从本心而言，仍是怕进北京。前回在京数年，他已深知皇城重地乃深潭泥淖，稍有不慎便会陷身不拔，所以段祺瑞连续数电催促冯进京就职，他仍是一拖再拖，迟疑不定。

其时在他身边的亲信幕僚大多竭力怂恿他进京，而反对最激烈的是周夫人。她从先例及近况推断，冯若去京，虽可辉煌一时，却难以持久，将步前任之后尘。为此事两人还争吵起来，周夫人不免垂泪自伤。冯国璋叹息道：“我何尝不知道那京城是龙潭虎穴？你的话确有道理，可如今我已是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冯某此去，不求辉煌荣耀，只望能稍弭兵荒马乱，让百姓过几年安生日子。”

冯国璋进京即与老同学段祺瑞、王士珍团聚，恳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

然而没过多久，矛盾就起来了。焦点就是对南方两广及湘云贵的护法军的讨代问题。冯国璋认为连年征战，民生疾苦，不堪重负，以和平谈判以求统一。而一向骄横跋扈、刚愎自用的段祺瑞却非要武力镇压南方，曰“武力统一”。和平与武力，两者水火难容，府院争得不亦乐乎，段祺瑞屡屡使出辞职、逼谏、暗杀、兵截等招数胁迫冯国璋就范，后又下决心要把冯赶下台，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会”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形成“逼宫”之势，逼冯下台。

在段施展种种手段时，冯国璋一味求和谦让，以维持北洋军内部的团结，竭尽全力要实行他倡导的“和平统一”大计，因而对段的夺权阴谋毫无防范，待新国会选出，要挤掉他的总统职位时，才知道大势已去。

至此，年届六旬，历经沙场官场险径危途的冯国璋已心灰意冷，无恋栈之心，又因周夫人病故，越发悲伤有加，厌烦无休止的官场纷争，于是便从容下台，客客气气地与段祺瑞推出的傀儡总统徐世昌作了总统之职的交接手续。

1918年10月29日，二次进京的冯国璋结束了他的一年零三个月的代总统职位，离开北京，回到了原籍河北河间县诗经村。

冯国璋的两次入京，前番是其事业奋发向上时期，其间他孤独无援，苦苦周旋，方于数重危境中挣出一方天地；而后一次，则已走到荣耀和权力之极，以天下之尊而踞京都，却依然不得展其心志，畏缩行事，终遭罢黜。至此，方信京城泥潭之地，非久留处，决然挥手辞去，也可算亡羊补牢之策。

冯国璋最后一次进京，是徐世昌请他去做直皖系的调解人的。但没料想，此番作客京都，居然成了辞世之行。

他在北京没呆多久，忽染风寒，便一病不起，拖至年底竟逝去时隔半个多世纪，关于冯的病逝依然有种种猜疑，有文章列举证据说，系皖系人物暗中捣鬼，以除心患的毒计所致。

是耶非耶？如今已很难说清了。

进了北京，当上了专业相声演员，冯巩欣喜万分，感觉如在一条曲曲弯弯的狭巷里黑灯瞎火地磕碰了很久，眼前豁然开朗，看见了一片开阔无比的

绿色草地；又如久囚樊笼的小鸟挣脱而去，飞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宝殿……

人说，京城的水土最养人，在这儿谋食混碗饭吃很容易；可京城也是能人打堆儿的地方，是勇者的搏击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遛遛才清楚，混混容易，干好了就很难。

进了铁路文工团的天津小子，憋着劲地练他的嘴皮子功夫，起早贪黑，舍弃了所有的休息天节假日，连天津都很少回，使得家中父母担忧起来：怎么回事，小巩去了北京，攀上了高枝，怎么总不回家？就连过年也是应酬一般地呆一两天，还心事重重似的？是在北京又遇上啥为难事啦，可别又是因为……

冯巩的心事恐怕只有当时的热恋对象艾慧清楚。她知道冯巩心里想些什么，要做些什么，担心着什么。冯巩没功夫回天津，她逢了假日就上北京去探望，送去自家烧的冯巩最爱吃的菜，把他床底下乱塞乱放的脏衣裳搜出来洗净晾干，折叠好了供其换穿。冯巩没时间陪她上街购物，逛公园，有时连坐下好好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可艾慧并不感到委屈或是担心恋人有异心，她明白冯巩情有所钟的，还是相声。

冯巩在等待“先声夺人”的机会。

这机会在他进京半年后才盼来。

1981年5月4日，首都体育馆。北京电视台在此直播庆“五四”文艺晚会演出实况。体育馆内座无虚席，18000多名观众都是冲着节目单上的许多著名艺术家而来的。

无名小辈冯巩跻身在众多名家高手之中，兴奋之中不无几分彷徨。头一回在这样大规模的晚会上亮相，他这个“丑媳妇”将要面对艺术品味很高且很挑剔的北京观众这一“新公婆”。行，还是不行，今晚可要见分晓了。万一演砸了，观众会毫不客气地把你轰下台去，而只要演成功，从此就可以在北京这块土地上扎住阵地，立稳脚跟了。这才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决一胜负之役。他为了放松自己过分紧张的情绪，就在休息室里不停地来回踱步，沈永年老师走过来，捏了捏冯巩的手，凉丝丝的，他关切地问：“小冯，有点紧张吧？”“真有点。”冯巩微笑的脸上皮肉有点僵硬。“甭慌。”沈永年轻轻拍一下后生的肩，“就按你平常的样子演。北京人可喜欢听相声了，他们会认你，给你鼓掌的。”轮到冯巩和刘伟上场了。

主持人李小汾以其独特韵味的嗓音说：“下面是相声《说话与礼貌》，由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话没说完，全场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热情性急的观众为自己所喜爱的侯跃文、石富宽鼓掌，没料想笑眯眯的李小汾停顿了一下，说出的却是“青年相声演员刘伟、冯巩表演”。就像给一堆刚燃着的火突然泼上了一盆凉水，全场的掌声戛然而止，传出一些小青年“下去，下去！”不友好的怪叫声，还有刺耳的口哨声。

见到这种情景，冯巩反倒冷静下来，把一股劲憋得足足的：哥们，对不起，今天我偏要上来！还让你们高高兴兴地鼓掌叫好！

上场了，两个20出头的小伙子，一身银灰色学生装，满面春风，精神抖擞，顿时给人一种清新欢快的感觉。三言两语一说开，有门儿，全场安静下来了。

《说话与礼貌》这段相声，是冯巩深入生活创作的，它紧贴时代脉搏，贴近青年人心声，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刘伟逗得生动有趣，冯巩捧得憨中见智，两人言来语去，妙语联珠，全场观众完全被吸引住了，投入而忘情的

欢笑声一潮接一潮，待收尾抖出最后一个包袱，场内掌声热烈持久，喝采声起伏不绝……。

台下的内行人在幕间暂歇时议论着：这俩小伙子不错，打哪儿冒出来的？是从天津来的？看模样还挺年轻，表演已很成熟了，肯定得哪位高手指点过了。是马季的徒弟？难怪……

首战告捷！

他已经感觉到演出成功了！回到后台，同行和前辈都走来向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握手表示祝贺，沈永年老师用力握了握冯巩的手，嘿，很热，掌心还有汗呢！

“小冯，感觉很好吧？”

冯巩感激地一笑，“嘿嘿，先还有点紧张，台下一起哄，反到心里踏实了。”

“今天演得很不错，我都看了，观众反映挺好，祝贺你了！”

这是个不眠之夜。

回到宿舍已过零点，冯巩躺在床上毫无睡意。终于跨出了进京以来的第一步，终于尝到了初次成功的甘甜之浆。此时此刻，这些年来向着艺术殿堂苦苦跋涉的经历中，一幕幕或欢或哀的画面，一回回或苦或甜的滋味，都一齐涌现，翻腾如潮，使他感叹不已，心涛难平，久久个能入眠。

东方欲晓，冯巩悄悄地走出狭小的宿舍，走向宽阔平坦的长安大街。

在太阳即将升腾的地方，朝霞缕缕，艳红无比。清晨的新鲜空气中透出一股令人激奋的气息。冯巩面向东方的绚丽霞光，深吸一口气，迈开步伐，在大街上轻松地跑了起来。此时，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铁路文工团的使命，是为全国的铁路职工送去欢笑和艺术美，铁路的两条轨道铺到哪儿，那儿就会有铁路文工团员的身影。

冯巩进了该团，在两三年内几乎走遍了全中国所有的铁道线，进团才两个月就去了黑龙江的加格达奇，冒着零下43℃的严寒为铺路工人演出。露天广场上说相声，四周是冰雪铺盖的山峦荒野，听相声的铺路工都穿着老厚的皮毛大衣，戴皮帽，为听清相声才把护帽翻上去了。可在台上说相声，得讲究个潇洒台风，精神气爽。冯巩咬咬牙，甩开军大衣，一身利索的青年装就站上了台，可脸上一笑就觉得皮肉不大好使，一动嘴皮子说话，下巴颏就哆嗦，呼出的热气似乎就会凝冻成一串串冰花……

1981年和1982年，四川和陕西安康两次发生特大洪灾，山体滑坡毁坏铁路；嘉陵江暴涨，冲垮铁路大桥，某处只剩下两根铁轨和残缺不全的枕木悬吊在空中，底下是呼啸奔腾的江水。铁路文工团奉命去抢险工地演出。车开了一程，前面路坏了，就得下来走。途经冲坏了桥面的铁路大桥，团领导犯愁了：怎么办？这桥路基全冲垮了，悬空几十米只剩两根光溜溜的铁轨，能过去吗？过不去又怎么去工地演出？

冯巩和一些年轻同事豪气十足，我们走过去！人家独木桥都敢走，咱双轨桥还用怕吗？

小伙子们的勇气鼓励了其他人，上！

冯巩乐呵呵地抢先一步，背了乐器作了开路先锋，上了悬空的“天桥”。双脚踏着滑溜溜的铁轨，一步一颤地往前挪，嘴里还不忘说两句俏皮话给后面的人鼓劲。

最后全班人马都过了这“双轨天桥”，又急行军几十里，按时赶到修路

工地进行演出。

这一路演出一路走，有心的冯巩还不忘打自己的“小算盘”。他利用演出间隙，深入第一线工地去广泛搜集生活素材。晚上，别人在简易房里睡着后，他偷偷地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创作，连续写了《拍手歌》、《青春之歌》、《鸟与人》、《生活的强者》等相声段子，这些取自工地现场，富有生活气息的相声节目在工地上演出，效果特别好。抢修工地的职工和解放军战士兴奋得把手心都拍红了。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创作表演的一些相声如《鸟与人》、《生活的强者》等，反响很强烈。

无论是巡回演出在铁路沿线上，还是献演在都市重要的晚会上，冯巩除了上台演出极其认真负责外，在后台和其他场合，他均以能吃苦耐劳，不计较名利得失而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称赞。每到一个新的演出点，他都主动承担了“装卸队队长”的职责，重活累活都少不了他。那瘦长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最需要人手的地方，大道具箱，扛起就走；乐器箱，一手提一个，乐呵呵地一路小跑还不忘说俏皮话。

冯巩在铁路文工团以勤奋好学，积极上进而获得高度赞扬，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个人，1983年还评为铁道部机关先进工作者。

铁路文工团驻地在北京确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沃土。这儿有参天大树，有奇花异卉，举目见芳草萋萋，流水潺潺，听莺歌鹤鸣，看飞瀑击涧，置身其间，可以汲取丰富的艺术甘泉，借助其优越的地势条件，攀援艺术之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进北京，在铁路文工团当专业相声演员，为的就是要摘取艺术女神额顶上的那颗璀璨明珠！

谁又能想到，铁路文工团，这赫赫有名的国家级文艺团体竟无力把冯巩这样的相声奇才真正地纳入自己的土壤之中。

冯巩又一次经受着与“黑兵”相似的“黑户口”的痛苦折磨。

每一次回天津，关切备至的父母便问：小巩，团里给你解决进京户口了吗？

他只能以假言搪塞：快了，团领导说最多到年底一定办好。

过年了，合家人吃饺子。吃得高兴时，母亲轻声问了一句：小巩，进京的事还不成吗？

吃进嘴里的鲜美的肉馅饺子也咽不下去了。

名义上调进北京，但户口和工资关系仍在天津制线厂。人去了铁路文工团，可“魂儿”还紧紧地系在天津的皮绳上。

一再地等待，一再地失望，委屈和焦虑，蚕食了他的乐观和耐心。三年过去了。冯巩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贡献，在团里充当主力挑大梁的演员，仍是拿临时工的工资，睡集体宿舍，“享受”编外人员的待遇。

生性乐观的冯巩不无痛苦地感觉到，铁路文工团对于他，仍是梦幻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宫殿，是热切之中暂现的一座海市蜃楼。他虽身在北京，但形同一只飘飞的风筝，命运之绳掌握在一只无形的手里，终难摆脱那种飘忽不定的尴尬……

1983年他和艾慧结婚了。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了出来：安家与立业。稳定的家是事业成功的一个条件，没法安下一个像样的家来，立业如何不受妨碍呢？

艾慧是个贤惠的妻子。她只是说，是北京，还是天津，咱得定个点，有个稳定的窝呀。

回天津？

制线厂的陈逸民书记也为冯巩的窘状犯急。这位厚道的老领导用好言宽慰他，并十分大度地承诺，“如果北京方面经济上有麻烦，你的工资、奖金、烤火费我们全包了。实在呆不下去的话，你就回来，回天津制线厂也照样可以发挥作用嘛。”

冯巩很感激陈书记的好心，但他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进了北京，我就非扎下根去不可。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铁路文工团的不少老师同事也为他的事着急。沈永年是当初发现冯巩这“千里马”的“伯乐”，他多次吁请组织上抓紧解决冯巩的户口关系问题。他找团领导，找铁道部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得到的回覆仍是老一套的话：没办法啦，编制紧啦，人员调动是很复杂的事，得经慎重研究讨论才能决定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个别团领导在使用和培养人才上，注重的是“使用”，那道理似乎很简单，牵进我院里的马儿，任我骑来任我使，其他的我不管。

1982年初，冯巩从马季老师处得知全国曲艺调演的消息，准备和刘伟带《拍手歌》去参加，请示了团领导，回答却是生硬的两个字：“不行。”“为什么，这些天不是没演出任务吗？”

“没出门演出，不能做准备工作吗？想演出还不好办，过几天要组队去东北慰问演出，你们弄两个新节目，一块儿去吧。”

这年的年底，冯巩得到中央电视台让他带《生活的强者》参加1984年迎春专场演出的通知。他又去请示，还是遭到拒绝，“这不行，明年的二·七大罢工纪念日，我们得去演出。”

“我看不会影响演出的，给我两天时间就可以了。”

那位领导厌烦了，“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冯巩，你得明白，总这样想入非非，不安心本职工作可不好呢！”

冯巩肚里窝了火，“这不是存心刁难人吗？就因为我是个没户口的人，是个临时的编外演员，就得由人捏软柿子，听人随意摆布？我呆在这儿还有啥意思？”

百般委屈之中，他去了马季老师家，把一肚子酸涩苦衷都倾倒出来。

马季此时已担任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团团长之职，深知死板僵硬的人事制度对人才扼杀消磨的危害性。他觉出爱徒在铁路文工团那种心境不舒畅的环境中，会影响到艺术追求和个人前途，与其窝在那儿，不如那个地方。

经过慎重考虑，马季就对冯巩说：“你上我这来吧。”

于是冯巩写了一纸请调报告，陈述理由，要求调动。

“辞职可以，调动？没门！”

有关领导发话了，同时找刘伟谈话，想通过刘伟来稳住冯巩。

冯巩也去做刘伟的工作。刘伟犹豫不定，“这边走了，万一那头又不着落，两头落空可就抓瞎了。咱可没少吃这苦头呵！再说，那边强手如林，姜昆、郝爱民、唐杰忠……我们去了也排不上号，在这儿好歹也算个人物。”

冯巩给他鼓气，“这事有马先生保着，黄不了。咱们过去虽是小字辈，可年龄也是优势。只要活儿拿得起，就准能站住脚。”

刘伟又有另一个难题，他的对象简星刚调来北京，还是合同工，他一调离，简星的工作也要吹了。

冯巩听刘伟这困难那顾虑的，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们这些年奔来

奔去，不就是为了追求相声艺术，追求成功之路吗？如果图安稳，实惠，那还不如留在天津……”

冯巩把刘伟的为难处跟马季说了。马季说：“他真有走不脱的困难，那你先来吧。”

仗义的冯巩又不愿意了，“我俩一直在一块，现在两人的问题都没解决，分开不好。要么暂缓一步，等刘伟把简星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再说。”

他把请调报告要回来了。

过后不久，刘伟因患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冯巩在照料他时，又谈及去广播说唱团之事，刘伟被他的执著追求艺术的毅力和真诚的友情所感动，答应一块儿要求调走。

于是他们两人在简星家，一起商量写份请调报告，报告中强调了要两人一起走。

这份报告恰好送到刚调进文工团的周信国团长手中。他不知内因，就有些不悦，我刚来你们就要走，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报告在总团团务会上一讨论，激起一片反对声，言词中不免对两个年轻人有偏激贬落之意，也有个别通情达理的，认为如果是调去中央广播说唱团，放他俩走也不是不可以。

冯巩刘伟想调走的事在团内也传开了，风言风语随之而来，“嘿，翅膀硬了，想飞了”，“这不是过河拆桥”，“俩小子还挺能攀的”……不通人意的损人之言，使两个年轻人十分伤心。他们想不到那些人怎么会把人想象得那么低下庸俗，那么市侩？我们不为别的，是一心一意要有个好环境可以施展艺术才华，多为人民创作演出好相声呵……

团里也有同情支持他俩调动的，沈永年、侯跃文这些师长好友，当初为冯巩、刘伟进团出了大力，眼下看他俩陷入困境也很能理解，很同情。侯跃文帮助他们跟领导沟通，劝说领导放行，沈永年则出主意想办法，把他俩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记挂在心上。

周信国团长经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和观察，对冯巩渐渐有些了解了。于是他就主动去找冯巩谈心。“冯巩，我来了这些日子，了解到你到铁路文工团这几年一直表现不错，这一阵你想调动没让走，你也没影响工作。我看得出来，你确实是个有才华有追求的好青年。说实话我真心实意地想留你在咱们团。如果你非要走，我想你一定要从长计议。目前说唱团只有广播文工团比咱们强，你要去就去那儿，我赞成；若回天津或别的团体对你前途发展不利。你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如实告诉我？咱们一起商量着办，好吗？”

冯巩见团长如此诚心相待，很受感动，便将自己的想法意愿和盘托出，如实倾诉。

周信国团长听了冯巩的肺腑之言，深深地为之所动，面前坐着的确是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好青年，能成栋梁之材的好苗子。不能因为人事问题耽误了他的前途和艺术追求。

他告诉冯巩，“放心，你的事我会帮你做工作的。”

周信国团长说到做到。他在团务会上明确表态，同意冯巩、刘伟调走，并对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耐心劝解，“冯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是不愿留在这儿，是咱没法解决最关键的进京户口问题。他要走，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他调去的是广播文工团说唱团，那儿他更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会。咱要是不放行，那就显得太自私，太不大度了。”

团务会终于通过了冯巩的请调报告。

1984年3月12日，冯巩走进了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当他站在北京城西南，复兴门西侧那幢不算太高，却极有气派的广播大楼前，仰望楼顶那高高耸立的铁塔，不禁悄然泪下……

记不清多少次了，他曾一回回走近这幢高大的建筑大楼，心里充满着神圣感和亲近感。它使他无限憧憬又无比向往。十几年来，就像一块强磁铁，吸引住了他的全部的心志和愿望。直到真正走进这幢大楼，他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东碰西撞，办工厂宣传队，当“黑兵”，进铁路文工团，历经种种磨难，似乎九九归一，总算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中央广播说唱团，如同唐僧取经经历遭八十一劫难终于到达了西天佛祖圣地……

中央广播说唱团，称得上是中国相声艺术的最高殿堂。这里聚集着几代相声艺术大师和众多著名演员，侯宝林、郭启儒、郭全保、马季、李文华、唐杰忠、姜昆、郝爱民……他们为中国相声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构筑起一座座相声艺术的高峰。

现在，新生的一代又来到了这座殿堂面前。仰望前辈同行们建造的金光灿烂的艺术高峰，捫心自问：我还能做得更好吗？

冯巩，这20来岁的年轻人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干得非常出色，要用最好的成绩来报答所有关心扶助我的人们！

古老的北京城，在经过1919年年底冯家一代显赫的军政人物创造的辉煌后，隔了60余年，又悄然孕育着冯氏后人在艺术上的辉煌。

第七章 15年圆了一个明星梦

黄一鹤导演主办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时想起了冯巩
一段《虎年说虎》，把冯巩的名字送到了十亿中国人的嘴边
大年三十的前五天，《小偷公司》被“枪毙”了，导演说你们再
弄出一个来争取上

苦熬几夜，写出三个相声段子，一举捧得头名状元的桂冠机遇，终于向28岁的冯巩这位已有14年说相声历史的有志青年颌首微笑了。1985年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和助手们在办公室苦思冥想，要设计推出一台迥异于前几年春节晚会的文艺节目。方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总是不很理想，或是节目不够火爆，或是演员太熟稔，或是……要让几亿观众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黄一鹤导演是个思维敏捷，极有艺术造诣的人。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从保险求稳角度考虑，上有经验的老演员，观众熟，印象深，只要节目质量尚可，就有良好效果。但是若想真有创新和特色，非得推出一批新人新面孔。新人往往有观众尚不知悉的“绝招”，一旦让这些有扎实艺术功底和特色的后起之秀在晚会上露面，拿出他们的“绝招”，会使整台节目焕发新奇感，取得出乎意料的良好效果。黄导看中了相声新秀冯巩和刘伟。他看过他俩的演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对年轻人行，表演轻松自如，各方面素质都好，而且创作上注重时代特色，颇有灵气。他了解到冯巩、刘伟的相声在京津两地和整个铁路系统都有了影响和基础。只要能博得艺术品位挺高的京津观众的欢迎，就能征服全国几亿观众！黄一鹤给中国广播说唱团拨了电话，点名要冯巩接电话。“冯巩吗？我是黄一鹤，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的总导演。我们打算安排你和刘伟在晚会上表演一段……你们能行！别客气……就围绕辞旧迎新，改革开放，虎年有新气象这个中心来构想……段子你自己写吧。七八分钟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完稿后让我们看看。”冯巩听完电话，十分兴奋。节目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出，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啊！从中央电视台1982年开办春节晚会节目以来，文艺界稍有名气的演员都期待着能在这台有数亿观众，影响极大的专题节目中“亮相”、扬名。几年来确有不少港台的和祖国大陆的演员，就是凭借“年三十”的大吉大利，一举跃过龙门，赢得全国观众的欢心，从而昂首阔步闯入了艺术殿堂。

千载难逢的机会，居然送上门来了！

冯巩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刘伟。当下，冯巩就进入创作状态，躲在小屋里，关了房门，用棉花塞住耳孔，（因他暂住的是说唱团办公室，紧邻的就是团部练功房排演厅，击鼓声和练嗓子的终日不绝）伏在小桌上写啊，想啊，过了吃饭时间，得妻子艾慧敲门大声喊他，才想起肚子早空了，赶紧扒了两碗饭，就又坐到桌边用起功来熬了一天又一天，相声段子改了一遍又一遍。到第六天，冯巩把修改了五遍的稿子《虎年说虎》交给了黄一鹤导演。

黄寻将稿子细细看了两遍，不禁拍案叫好：主题突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语言生动，相声包袱设计得前后连贯呼应，有张有弛，步步紧扣，恰到好处，可以称得上精品。

当下他便拍板了：上！

198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播大厅。别具一格的布景设计、观众席坐满了来自各界的特邀嘉宾，绚丽多彩的舞台上，灯光炫目，几架摄像机

在不同的位置将镜头对着舞台，整个演播现场洋溢着一片热烈欢快的气氛。

相声《虎年说虎》，第一个上场。俗话说“好戏在后头”，这样排列算不上最佳位置，但对初次亮相的冯巩、刘伟来说，却有“先声夺人”的吉兆。

两个年轻人，一身潇洒的西装，轻快地走上了演播台。此时的冯巩已没有早先初出茅庐时的局促和紧张感。在北京几年的演出和实况转播经验，使他少年老成，胸有成竹。

两人开说，一捧一逗，只一个小包袱，观众席上便响起欢笑和掌声。好，开头不错！接着，相声越说越有趣，台下掌声一阵又一阵。到末尾一句“你爱人说，在家里，你是老虎——她是武松！”冯巩一个喜而转嗔的神态，演播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叫好声不绝。

这是一段极妙的相声表演。两个年轻演员的精湛演艺，给现场嘉宾们带来了欢笑和惊奇，当下便纷纷打听这俩年轻人是哪儿的，真棒！同时也给电视机前的几亿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的晚会节目，《虎年说虎》得到了众口一致的赞誉。

一夜之间，冯巩就成了全国观众心目中陡然升腾的新星。《虎年说虎》这个相声成了人们拜年喝酒，饭后茶余谈论不休的话题。“那个瘦长个儿的，叫冯巩吧，真逗，那眉毛眼睛一耸一动都有戏，让人好开心。这演员准有大出息……”

一时间，赞美之词向冯巩纷涌而来，鲜花向他飘来，热情向他涌来，机遇向他奔来……艺术殿堂终于向这位苦苦奋斗了十几年的年轻人敞开了门庭。他看到了通向相声艺术巅峰那崎岖山道上隐隐约约的石阶和扶栏……

自后，冯巩和他的相声搭档每年都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奉献一段相声。到1994年已是连续九年了！

1987年春节晚会，他和刘伟合说《巧对影联》；

1988年春节晚会，他和刘伟、牛振华、李艺、赵保乐、戴志成、郑健等七人合说群口相声《求全责备》；

1989年，他与牛群结成新搭档，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相声《生日祝辞》；

1990年春节晚会上，他和牛群拿出了新节目《无所适从》；

1991年，他和牛群合说《亚运之最》；

1992年，两人合说《办晚会》；

1993年，他俩拿出《拍卖》；

1994年，他俩又合演了《点子公司》；

年年都上春节联欢晚会，回回都拿出叫得响、大受观众欢迎的相声段子。自1991年开始由观众对春节晚会节目投票评选优秀节目，冯巩与牛群合说的相声，已连续三年夺得了最佳奖。

一段相声，长不过十几分钟，短的仅四五分钟。在外人看来，似乎是极轻松极爽快的一笑而过的工夫，可创作者和表演者却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

圈内人才晓得：想进中央台春节晚会预备节目难，要让总导演最后拍板上演更难，想年年上晚会难上加难。

春节联欢晚会影响面太大，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几亿平民百姓，从边疆少数民族到海外华侨华裔，各行各业，无论男女老少，在大年三十这晚都要守在电视机前“守岁”，看电视，图的是热闹、欢乐、吉祥如意、和和美。俗话说，众口难调。要筹办好这样一台节目确非易事，从承办晚会的总

导演到各个节日剧组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长时间艰辛而又繁琐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有时还因某种原因而白白耗费，付诸东流。其中甘苦，唯内中人自尝自识。

连续九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演出，冯巩已是该台节目的“老人”，称得上“之最”了。他常感叹：这台节目是他精力投入最多，观众反应效果最好，也是受累吃苦最多，担心忧虑最重的！

1989年春节前两三个月，冯巩即与牛群开始着手晚会相声段子的写作了。这是他俩结成搭档后第一次在重大演出上合作，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关键一战。

两人在梁左原稿的基础上，反复琢磨修改，写成下一段相声《小偷公司》。它以小偷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荒诞的前提，大胆构想，设计新奇而富幽默感，借题发挥，影射社会弊端，辛辣地讽刺了时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风气不正等不良现状。这段相声十分精妙，出色地融合了相声艺术的多种手法，使整段相声高潮叠起，包袱不竭，让观众既得到欢笑和愉悦，又能在欢笑中品悟到内中蕴含的深刻而可忧的喻意。

作品刚拿到晚会筹备组，便在小范围中引起了震动。大家交口称赞，认为是冯巩、牛群合作以来的最佳成果，也可算近年相声的一篇精采之作，若经春节联欢晚会一播，定能收到极大反响，产生某种震撼作用。

节目很快通过了审查。冯巩乐滋滋的，就盼着春节快到来，将自己的佳作献给电视机前的几亿观众。

谁想就在大年三十前五天，他俩突然接到一个简短的电话：《小偷公司》不上了。

“什么，节目枪毙了？不是已经……离春节只剩五天了……”冯巩简直惊呆了！

节目就怕审查后挨枪毙。而春节晚会这台戏挨毙的比例可以说是很高的。著名相声演员、小品演员没有不吃过两回“枪子儿”的，扳着指头算一下，从早先马季、姜昆，到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黄宏、赵本山等，都有过惨痛的经验教训。

马季先生就曾为《宇宙香烟》而吃足苦头。为春节晚会上这个单口相声，他和创作合作者不知磨了多少个白昼黑夜，但领导审查时对这段相声有种种顾虑：“春节是喜庆吉祥的日子，弄这么个讽刺相声合适吗？”“我们香烟有少量出口，你们这样写会不会影响我国出口香烟的声誉？”马季无奈，只得直接去找“尚方宝剑”，将录音带送到正在住院的部长病床前，这才乞得一纸通行的允诺……演下来后几个创编人员抱头痛哭一回。

节目遭枪毙，冯巩并非初尝涩果。可问题是，早不毙晚不毙，单在仅剩五天的当口来这一下子呢？

剧组的导演话下留情：“冯巩，你是快笔，还有五天时间，你们再写一个顶上吧。”

五天，只有五天，就得拿出作品，排演熟练参加演出，这确实有点难为人了。

幸亏冯巩、牛群也非等闲之辈，闷头闷脑憋出了相声《生日祝辞》，勉为其难地将它推向了全国几亿观众，总算熬过了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大年三十。

这五天是怎么过的？只有冯巩和牛群两人感触最深。五天共 120 个小

时，他们几乎是掐着秒表大睁着熬红的眼睛度过的。为了憋出一段“合格”的相声，两个人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渴了喝口凉白开，饿了啃方便面和大馒头，没有白天黑夜，也记不清早餐与晚餐的间距。那状况就像古戏中伍子胥过文昭关，可以一夜急白头发！

相声是笑的艺术，但它决非仅仅逗笑而已。它的基本艺术规律是要将世事人生的可笑之处发掘出来，呈现给观众。所以，它不可不富有针砭时弊、启迪思考的社会功能。如庙宇中供着的大肚笑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如果相声连最基本的讽刺都难以保留，就势必导致观众的失望和不满。

冯巩热爱相声，相声也成就了他的美梦。但是成了名后的笑星却常常为自己未能给热心观众最好的回赠而内疚自责。

幸好，他还有补救的办法，可以在别的演出中尽力拿出最佳产品，献给观众。他参加各种文艺演出，随中央广播说唱团下基层演出，去边防前线，去海外访演，尽可能地扩大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感情的范围，表演自己的拿手节目。

冯巩有了名气，但他并不沉溺于观众的掌声和欢笑之中，他要攀登艺术之巅，付出艰辛的劳动，耗费更多的心血，去摘取艺术的桂冠。

终于又有了机会。

中央电视台与大连电视台等单位合办的第二届专业相声演员邀请赛隆重地拉开了大幕。全国有近百对专业相声演员入围角逐。竞赛规模空前，规则严格，采用初赛、复赛、决赛三次遴选的方式，决出优胜者。14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曲艺界专家名流组成了权威性的评议委员会坐镇赛场。

冯巩报名参加了这次竞赛，他要以最佳创作最佳表演来证实自己对相声艺术不懈的追求，心想，即使拿不到奖次也要让观众对他作一个全面中肯的评价。

这次竞赛可以自选自定节目，而且决赛将由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实况。这可是掺不得半点虚假和做作的公平竞争。全国几亿双眼睛都盯着荧屏瞧着呢，演员和评委不使出真功夫可不行呢。

冯巩给自己鼓足了劲，“干”！

但他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此时他与牛群搭档刚开始不久，公开合演不过几回，尽管两人志同道合，有许多融洽的创作思路和合作优势，但毕竟缺乏必要的合作实践，没有形成必要的默契和独特风格，而且还有观众和名家认可这关键一着，若两人配合稍有纰漏，难保不会丢失原有的好名声，弄个满盘皆输的结局！

冯巩和牛群鼓足了底气，干，就干个痛快，干得漂亮！

两人猫在一个房间里，苦心孤诣地创作，最后拿出了《出口成章》、《我是导演》和《灭鼠轶事》三个段子。准备初赛、复赛、决赛分别上台，出奇制胜，争取全面丰收。重点是《灭鼠轶事》。这是一个由同题裁小品改写成的段子，讽刺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恶劣作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批判精神。

他们以《灭鼠轶事》顺利通过了初赛。参加复赛的35对选手将经过四场复赛，决出八对好手进入最后决赛。

参加复赛这天，冯巩妻子艾慧带着三岁的儿子专程从北京赶到大连，为丈夫这次打擂来助威喊阵了。但冯巩却唯恐过多的情感投入反而有碍于比

赛，又让朋友代为接站安排食宿，他回避不见，一心投注于复赛。

复赛的淘汰率是 77%，几乎是每五对选手要淘汰四对，仅剩一对。他俩又一次成功了，进入了决赛圈。

决赛那天，冯巩、牛群拿出了得意之作《灭鼠轶事》，这个段子既有深刻内涵，又十分幽默、火爆，演出大获成功，掌声长时间不息。评分结果：冯巩在同场八名捧哏演员中获最高分，夺得第一名；牛群获逗哏第二名。

冯巩走上了领奖台，接过了一尊得之非易的金杯，面对摄像机镜头和许多频频闪光的相机，他瘦削的脸庞露出了成功后的喜悦和欢笑。

三十而立。他，一个曾被历史的套索勒得不能动弹，难以舒畅呼吸的名门后代，一个差点几让厄运剥夺了去深造和登台权利的孜孜学子，终于赢得了他的艺术生涯中极辉煌的一个定格瞬间，在生命历程的 30 个路标上刻下了一道光彩闪烁的印记！

第八章 欲登殿堂，先进孝堂

上大学——倪萍说者无意，冯巩听者有心

年轻的教师发现大牌明星冯巩听课时乖得像个大男孩

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笑星一上台就甩了个“包袱”一个念头，悄悄地在他的脑际萌生了。

这也许是飞鸟随风衔来的一颗籽儿，或许他的脑宇深处原本即有那么一粒让早霜打蔫了的嫩芽。总之，这细芽儿猝然复苏，瞬间便长成了一株壮实的小树，占据了她的全部思维空间……

冯巩想要读书。

这是 1989 年秋，正值他说相声拍电视最走红最火爆的当口。新闻媒介迅即以重大新闻的标题透露这一消息，套上醒目大字标题：“冯巩上大学”、“‘那五’去拿文凭了”、“笑星喜入学府门，牛群冯巩话缘由”……

一时间，冯巩上学这件事成了圈里圈外的议论热点，评说和猜测各种各样，不少关心喜爱他的观众还寄来了一封封信，就他欲上大学读书一事发表自己的见解，巨是劝阻的居多。

冯巩倒有点发懵了：怎么，我才有了点上学的意思，就成了一场辩论会的焦点啦？那咱也发表个意见吧，他就写了一篇《学无止境》的文章，发在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

可人们还不停地说道此事，冯巩去哪，仍有朋友和热心观众围着他，认真地向他陈述、剖析放弃说相声拍电影的黄金时节去读书的弊端，弄得冯巩有点哭笑不得，有时不得不预先声明，“今儿聚会，咱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冯巩想读书的念头，源自倪萍的一句话。那是 1988 年拍《那五》的时候。谢添为拍好《那五》，拉起了一个强大的演员阵容，有张帆、倪萍、李丁、唐远之、李文华、牛振华、牛群、史可夫等一大批优秀演员和笑星，而主角冯巩，那时只是算初进山门的小沙弥。那“众星拱月”的架势摆着，哪一颗“星星”也比这细眉一弯的“新月”要亮闪得多。

冯巩很快便发觉自己的劣势了。对作品和角色的理解，他总是具体和局部方面考虑得多，总体和全局上把握不准；重视语言是否精采，动作表情有无不当，而疏于能动地把握住人物内心的表现。

他很羡慕那些理论根底扎实，艺术修养深厚的演员。怎么人家一下就抓住了人物性格特征，表演起来就那么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举手投足，一个眼神，一段特写，都那么入情入理，玩儿得跟真的一样呢？

他尤其敬服与他配戏的倪萍。当时倪萍主演了《雪城》、《山菊花》、《祁连山回声》等多部影视片，获过金鹰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可名气还不很大。她在《那五》中演那五的妻子贾凤魁。初次与她合戏，冯巩便瞧出她那扎实的表演功底了。

为了拍好贾凤魁在新婚之夜悲喜交加的矛盾复杂的心态，倪萍坚持在拍摄时不用药水，要自己流出真实的眼泪。她手搭床沿，垂脸敛眉了一会儿，稍稍拾起脸来，就见眼眶里已噙满亮晶晶的泪珠，轻轻地说声“开始吧”。摄像机就抓紧时机，拍下了这组极真切动人的镜头。

一旁候戏的冯巩一击掌，嘿！这科班出身的就是不一样，真棒！

倪萍笑着接话：“你有兴趣也去科班一回。”

冯巩心头一震，“是啊，咱何不也‘科班’一回。可如今事儿太多，就怕……”

这次偶然的对话，触发了冯巩读书的意愿。而后，谢添及其他几位影视朋友也和他一起商讨了学习深造的问题，都认为他该去读书。

1989年初，冯巩暗暗打定了主意——去读书！

他找了牛群。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抉择，须和牛哥商量，两人是搭档，是亲哥们，又有很相似的曲折多难的生活经历。冯巩希望牛群能和他一块去求学。

“牛哥，这两年咱上的节目多，演出多，我越来越觉得有种危机感，咱这点文化水准生活积累，怕就要挤空挤干了，弄不好就成了一块没用的牙膏壳。你想：不再学点新知识，补充点新装备，能行吗？”

牛群本非等闲之辈，在军内有“才子”的雅称。其父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高级干部，是位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前辈，1961年去世前是天津财经学院院长。姓牛属牛的牛群是牛家的老末，以孺子牛自谓的父亲把小儿子的姓名叫作“牛群”，意为“咱家已有一群牛，该画个休止符了”。

牛群自小在知识环境中熏陶，虽因“文革”未能上大学，但好学肯钻研已成习惯，每年总要花费500多元订阅书报杂志。他能写会演，曾连续在全军系统的文艺竞赛中获得几次一等奖，《领导·冒号》使他声名大振。和冯巩搭档后，两人趣味相投，珠联璧合，已有许多次携手创作和同台献艺的成功之举。

冯巩的一番肺腑之言，也叩动了牛群久藏未了的夙愿，当下他便连声叫好，“这是清醒之药，上上之策！冯巩，这一着棋想得好，及时。没说的，我虽比你痴长几岁，肚里货色也掏得差不多了，确该让老牛添点草料了。”

冯巩见牛哥赞同此议，不觉来了情绪，把自己的谋划说了，“我打听了，今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要开一个进修班，专业科目很不错，正适合咱们学的。”

“行，就上‘中戏’了！”牛群爽快地说。

两人分别向中央广播艺术团和北京军区政治部呈交了求学报告，而后抓紧时间复习了功课，便去投考。

结果，两人都录取了。

这样，冯巩自1977年天津纺织技校毕业后，时隔12年，又走进了艺术院校的大门。

冯巩自小读书就十分聪明，每次考试成绩在班里都排在前几名，小学毕业考试竟五门课考了五个100分。上初中，他的兴趣广泛，稍后又专注于相声艺术，但也未影响其学业，考试成绩依然很好，但当时的社会现实摆在面前，上大学是绝不可能的，因几个哥哥姐姐都下放了，他的最好前途是留城工作，而当初能进工厂就非常幸运了。他初中毕业后，就作出以后当工人的打算，进了纺织技工学校，毕业出来就进纺织机械厂当一名钳工。所以，作为一名出色的相声演员，冯巩的个人学历上，最高学历便是“纺织技工学校中技毕业”。

当然，冯巩在走上相声艺术之路后，一直坚持自学中国古典文学，读唐诗宋词，读唐传奇元杂剧，自十四五岁起他便尝试着创作相声段子，十几年来，他创作的文字少说也有几十万。然而，冯巩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都在提高，人们欣赏水准也越来越高，自己不能总停留在那个原有的基

点上。不行，那将会被时代淘汰的！

应该说，是危机感催促着冯巩再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他这一步棋无疑走对了。

1989年，初秋时节，北京凉风习习，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莘莘学子，怀揣一张入学通知书，或是刚度过一个欢快的暑期，走进了各大专院校的校门，开始了他们的紧张而不乏乐趣的校园生活。

这一天，座落在北京东城区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悄然走进了两个人们很觉面熟的人。年轻漂亮的表演系一年级新生们眼最尖，老远就乐呵呵地叫喊过去，“嗨，是冯巩、牛群吧？怎么，上‘中戏’来上表演课啦？”

冯巩朝那些学生们扬了扬手，“活到老，学到老嘛。”

整座校园都乐了。

中央戏剧学院可是中国艺术院校的头一块牌子呵。自1950年4月20日建立以来，已培养造就了话剧、影视专业的表演、导演、舞美、戏剧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各种人才数千人。田华、李婉芬、李祥、简肇强、李玉茹、徐松子、游本昌、李法曾、李邦禹、姜文、吕丽萍、丛珊、王洁实、巩俐、蔡国庆……好一大批曾经走红和正在走红的戏剧影视舞台明星，都曾在这所学校求学，深造。有位艺术界人士曾说，没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当代艺术史得改写许多章节，这可是一句大实话。

就是冲着这个，冯巩才选中了上“中戏”的。

走进了戏文系影视编导进修班教室，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都乐呵呵地迎上来，握手问候，作自我介绍，气氛欢快热烈。

久违校园生活的冯巩在同学们的问候和簇拥之中，心情格外高兴，但听了他们的一些恭维之词，又颇为不安，真诚地说：

“能结识这么多新朋友，真是特别高兴。各位都是行家高手，已经硕果累累；咱是初进山门，得向各位师兄叩拜，希望以后不吝赐教，多多关照。”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进的这个班是带有专业研究性质的。同班同学大多原已读过专业艺术院校，并在艺术创作上有实践经验和造诣的人才。为此课程设置不同于普通本科班，既有高深的理论课，也强调从理论到实践的融会贯通。一年的学习期限内，他们要学戏剧发展史与现代戏剧、悲喜剧艺术、影视发展概论、中外影视艺术流派、中外戏剧特征、现代影视艺术状况、民族文化与时代潮流、现代摄影技术、影视剪裁、剧情与人物塑造、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结构戏剧、生活与创作、编与导等等几十门课和研究专题。为了完成课程，系里采用强化教学法，除节假日，其他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八节课，上午理论学术讲课，下午观摩实习，晚上还有必不可少的作业。

冯巩这还是头一回正儿八经地系统学习戏剧理论，课程量之大令他暗暗吃惊。他不比那些读过艺术院校的同学，不少课目还得从零开始学起呢。好在冯巩有天生不怕难的秉性，越紧张苦累，越富有挑战意味。他就越来越劲。开学不久，他就把自己学习的进程节奏调整好了。

一个名演员在座下听课，尤其是以嘴上功夫擅长的冯巩坐在那里，对那些讲课的年轻讲师、副教授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呢。他们起先讲课总有些拘谨，心里忐忑不安，我这笨拙的口舌，人家会听我说吗？可是见下面那位赫赫有名的笑星此时坐着，倒像一个十分乖巧的大男孩，睁一双眼望着老师，一副求知若渴的神态，他们的心神才安稳下来，从容他讲下去了。

冯巩也确是把自己当作了一名起点低的学生来要求的。除了认真听课、

完成作业，他还在课下拜同学为师，不时地向他们请教，提问探讨。他这种由衷的求教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令同学们都十分感动和敬佩，也都乐意和他平等交换学术意见，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

读书难，难在时间不够用。冯巩下决心要花一年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可他总也清静不下来。各地的演出邀请络绎不绝，各种会议通知连绵不断，还有如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也时常要请他去文学系讲课，还有厂矿企业界的朋友……他只能耗费许多口舌，婉言谢绝了。

但也有不少是推辞不了的，或是不能推辞的。“六一”儿童节整个下午和晚上，他要与孩子们联欢。他是三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亏谁也不能亏了孩子们！他所敬重的戏剧界前辈欧阳予倩先生的文集出版有困难，他积极组织并参加义演；南方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他加入赈灾义演团体；上海举办国际相声交流演播，关系到中国相声的声誉问题，他不能不去。为了不耽误课程，他和牛群星期六下午飞抵上海，晚上参加演出，星期天再返回北京，星期一早上又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

付出多少辛劳，就能收获多少欢乐。

学以致用，是冯巩下决心读书的根本目的。一年的课堂理论读完了，接下去的实习课，冯巩便参加了《离婚合同》的拍摄。在两个多月的拍摄期间，他抓住间隙，在研究角色塑造的同时，又从理论角度对自己扮演的人物进行剖析，写出了两万馀字的毕业论文《论 离婚合同 人物的塑造》，这篇以自己的表演实践为依据，又系统地给予理论探讨的论文，立意新颖，构思独特，指导老师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题目上侧写了个大大的“优”字。

作为毕业作业，冯巩编了单本电视剧《无处藏身》，反响很不错。圈内朋友说，嗨，冯巩一年的书没白读！

1990年底，中国国际电视剧研讨会在重庆举行。这是中国电视艺术界的一次盛会，有美国、前苏联、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国度的近百名外国同行欢聚一堂，交流体会，切磋技艺，谋求发展。

冯巩因在电视剧《那五》中的成功表演，被特邀到会，还特别写明要他大会发言。收到邀请信时，他正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便想，乖乖，这不是摆着个大考场让我去应考吗？那么多国内国外的电视界名家高手坐着，听我发言，说差了，还不让人家耻笑？

他想，既然敢赴考场，就得拿出真本领。于是认认真真地拟出一篇数千字的稿子，题目就叫《我演那五》。

参加会议这天，冯巩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一上台就甩出一个“包袱”：

“刚才咱们的女编剧发言很精采，很有感染力，赢得了男士们的热烈掌声。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想如果在座的女士多一些的话，我也可能会有她那样的礼遇的。”

话音未落，下面便爆出了掌声和笑声。

冯巩便在活跃的气氛中，津津有味地谈起了“那五”。他从对“那五”这一旧时代落魄八旗子弟的人物形象，谈到历史和现实的呼应，旧人物的现实感，旧故事的启迪意义。又谈了“那五”的独具韵味的性格特征，既带着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涵义。而后便从自己一个相声演员如何演电视剧的角度，剖解从相声到电视表演的异同和融台，谈自己的切身感受和追求目标……

他把刚从“中戏”学来的理论，融会在演“那五”的体验之中，谈得娓娓动听，头头是道，令一群电视界行家意趣大增，很受启发。等冯巩说完，

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间休息时，一些意犹未尽的同行朋友便聚拢来，和冯巩探讨电视剧的艺术特性了。

有位美国导演问道：“您认为导和演是什么关系？你演那五时是什么感觉？”

这可是个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专家论证起来能写一本厚书。冯巩想了想，巧妙地应对过去，“我认为导演就像汽车的电机，演员是汽车的发动机，须要电机启动，发动机才能运转起来……至于我么，演那五时我还没有发动机，坐的是电瓶车……”

这比喻形象生动，又谦虚有度，使大家开怀大笑。

一位新加坡导演曾看过冯巩在新加坡的演出，还读过不少有关他的新闻报道，就把话题转到他上学的事上了，“听说冯先生放弃演艺业，在中央戏剧学院深造，不知意在何谋？”

冯巩没想到外国同行也很关心他的读书问题，便将一肚子憋了很久的话吐了出来：

“我进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目的不是为拿文凭镀金，也不是为求得书香门第后裔的心理平衡，而是一次决定艺术生命和前途的慎重抉择。人的自然生命是由健康状态决定的，而艺术生命却是由空间和时间共同构成的。扩展和延长艺术生命的时空，是我读书深造的主导动机。

“自然生命与艺术生命的疏离与不同步，构成了我们每个艺术家人生命运的悲喜剧。艺术生命的质量取决于艺术家对自己艺术发展的设计、把握程度。要勇于向自己挑战，和自己过不去。自觉超越人类自满自恋的先天弱点，把艺术生命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避免艺术生命的萎缩和退化。

“就我而言，艺术生命的外时空由戏剧、电视、电影、广播、文学等等组成，因此要将自己投放到这当中去，进行多栖的艺术探索实践、开掘自己的艺术资源，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创造一个宽广的外时空环境。而艺术生命的内时空建构于自身。就像一块勤于耕种的地，需要不断地施放肥料，吸收有机养分，不断完美与外时空的联结对位，丰富自我的艺术修养……”

直站在旁边细细观察着冯巩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王岚，等冯巩说完就走过来，握着他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上学和没上学，就是不一样呵。”

听了导演的话，冯巩顿生一种被人理解的愉悦，“嘿，有您这句话，咱这一年书读得值了！”

第九章 海风是腥的，海风也是甜的

冯国璋为冯家订了“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排辈规定
冯家遇大声地回答德皇威廉二世，“不，我是中国人！”
因为买外国油漆受了窝囊气，冯家遇发誓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油漆

厂

冯海山悄悄渡海去了香港，又拿起了画笔
冯巩的香港、新加坡、日本之行
他在台湾见着了张学良

1909年，即宣统元年，50岁的冯国璋被清廷委以军咨府军咨使的要职。这一职务相当于陆军参谋长，要负责全国军队驻扎、调防、军事演习等重大事务。

同年10月23日，冯国璋作为清政府创办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先行者和大功臣，又被委以考试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考大臣。

在这一年，冯国璋为《冯氏家谱》重修作了序言，并规定今后冯氏家庭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

冯国璋作为起首的“国”字辈。

他的五个儿子为“家”字辈，分别取名为家遂、家迪、家遇、家迈、家周。

而孙辈从“海”字辈，有海岱、海崦、海岩、海、海岛、海等。

曾孙辈本也该从“禁”字，但因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迫，只能违逆祖上的遗训，以示与“反动家庭决裂”。所以到冯巩这一辈孩子就不再以“禁”字排辈了。而到了冯巩的下一代，则又接着“开”字的顺序取名，冯巩的儿子就叫作“冯开诚”。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

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子孙辈身上。

1903年，在他44岁时，奉清廷之命，与满族军官铁良、凤山再度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兼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督办。督办之职如现今之校长，是个掌有实权的职位。

就在这年，他的第三个儿子冯家遇考入了由他任督办的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冯家遇生于1888年，考入学堂这年仅15岁。他前面有两个哥哥，忠厚敦实的家遂奉父命在河间老家诗经村奉养祖母、母亲，顾守家宅；家迪自幼体弱多病，不能外出做事；而后面的两个弟弟家迈、家周还没出世呢，所以，冯国璋就极为器重这第三子家遇，决意要调教成国家之栋梁。

冯家遇聪明好学，且性格刚倔，好胜心极强。进入学堂后，便以一名普通学员的姿态勤奋学习各科学业，从不依仗父亲的名势。进校很久，同学中竟无人知悉这个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冯督办所钟爱的三公子。

这年寒冬，家遇所在的班练习骑术。冯家遇虽是其中最年幼的一员，却勇力过人，争先骑上一匹白马，未等那蒙古族教员吩咐骑马要诀，便一抖缰绳，乘马在尚残留片片积雪的操场上飞驰。

谁想那马跑得兴起，到操场尽头竟收不住步伐，而那头正好有几位身穿锦袍的武官大员徐步走来，丝毫未顾及急奔而至的白马。

就在那马眼看要撞上路人的紧急关头，骑在马背上的冯家遇猛地用双手紧紧勒住缰绳，使那白马在霎那间耸起前腿，直立而起，并愤然发出吁啾的嘶声。

行人居然就是本学堂督办大人冯国璋和他的僚属。这位受了惊的上司一仰脸，望见了那匹蹶前腿直立的白马，也认出了那位莽撞而勇敢的骑士就是他的三小子，不由地转惊为喜，大声道：“嗨，小子，真棒！”这以后，莽小子立马惊督办的小故事就在这所学堂传开了。冯家遇这个尚属少年的将门之子便开始引起众人的关注。他们毫无例外都猜测，即使不靠其父督办的提携，单凭冯家遇那聪明和勇猛劲儿，将来准是个统领千军的将帅之才。

但人们的预测都错了。三年后，冯家遇以优异成绩从武备学堂毕业，即考上留学生，渡海去了德国柏林工学院，攻读化学冶金专业去了。

北洋武备学堂内分设日文和德文两门外语课程。不知为什么，两度出使去日本的冯国璋偏给儿子选择了德文班，其后又让冯家遇考德国学校。其中缘故也不难猜测。日本虽然也已强盛，但它的成长也仅是汲取了西方列强的先进文化和科技，不过是学了别人而已。中国要强盛，就不必从日本去拿二手货，直接去西方学来更好！

1906年4月，18岁的冯家遇和一个姓张的德文班同学，乘坐德国远洋邮轮，飘洋过海，登上了那个高傲自负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四年留学生生涯。

柏林工学院，是当时德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这里集结了众多的科学家、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化工冶金等重要工业的优秀人才，成了维系德奥帝国先进军事装备的重要支柱。

置身于海外列强的国土上，年轻的冯家三少爷品尝到了一个懦弱之国的臣民在强悍帝国不得不忍气吞声的苦涩滋味。耻辱感反激发出一个有骨气中国人的奋发精神。冯家遇成了他所在那个班上最用功的人，连德国严厉有名的教授也不得不惊服这个中国小伙子的聪明好学。他们甚至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东方人留在德国，让这颗聪明智慧的脑袋为德意志民族效力。

但是，冯家遇有自己的主见和抱负，他一心想的是如何回国施展自己的才能。这一决心因一件偶然之事就愈加铁定了。

这年的5月1日，正是欧洲大陆最美的时节，柏林工学院放了一天假，大学生们都结伙去游公园。柏林市内有几座漂亮的公园，里面绿草如茵，高树参天，花坛中鲜花盛开，满园飘逸着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冯家遇和几个同学漫步在春光明媚的花圃小径上，心情十分畅快。忽然，公园的某处传来乐队的奏乐声。随行中一同学便笑道：是德皇威廉二世出游来了。

原来此时德国宫廷礼仪，凡德皇至某地，必由乐队奏乐，吹响号角，有特定的德皇号曲；若皇后单独赴会，则有皇后号曲；还有德皇与皇后同时到达的合曲。

几个留学生好奇地去看德皇和皇后究竟是什么模样。他们在一个不大的草地上见着了那一对统治德国的君主。在冯家遇看来，那德皇威廉二世留着浓密的胡须，目光如锥，不苟言笑，威严有过而慈祥不足；那位皇后面容消瘦苍白，看上去难说有几分姿色……

他正暗自寻思着，不想隔十几步远坐在一张舒适高背椅上的皇后抬起手臂，微笑着朝他勾了勾手指头，意思是让他走过去。

在围观的人群中，身材高大面容俊秀的东方青年冯家遇大概是很引人注目的，所以才招致那位皇后的好奇和青睐。但冯家遇却不乐意了，因为那皇后是用勾手指叫他，在他看来就像在招呼一条驯服的小狗。他故作不解，没动弹。

稍顷，就有一个满身披挂的皇家卫士走过来，和颜悦色地说：“德皇和皇后陛下请你过去谈谈。”

冯家遇这才慢慢走过去，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对德国最高统治者面前。

德皇一脸傲慢，没有一丝笑意，说话时拖腔拖调的，“你是日本人吧？”

冯家遇一听，又觉不舒服，即用纯熟的德语大声回覆：“不，我是中国人，是大清帝国派来读书的学生。”

德皇哦了一声，与皇后对了对眼，脸上稍有了些笑意，“看起来你还很年轻，德语说得很好么，你在德国要好好学，因为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里一切都是最好的，记住，以后回去后不要给德国丢脸！”

这话顿时让冯家遇窝了一肚子火。凭什么你要说不给德国丢脸？咱是中国人，好好学是为咱中国人，关你德国皇帝屁事？

公园邂逅德皇一事使冯家遇十分震惊，以致终生铭志，念念不忘，并对他此后的志向抱负产生重大影响。他曾数次与儿女们提及此事，谆谆言道：“到了人家外国，你才真正感到国家弱了，就被人瞧不起，咱们中国人，要在西方列强面前挺胸直腰，堂堂正正，就得下狠劲把国家治理好，真正强盛起来。”

海外的留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清廷虽给一点补助金，可哪里够开销？冯家遇虽有个做大官的父亲，但冯国璋早有儿女成人须自立的铁定家规，从不寄给一个铜子儿，要吃要住，还要攒下钱买专业书籍，几年内冯家遇买了大量的本专业著述，以备日后选用，这些书足够一辆马车拉的。

在大学学习的后期，他们去了德国最有名的克虏伯钢铁厂实习。在这家由最富有的犹太资本家开办的有十万工人的大厂区实习，经常要去操作现场做一些繁重的活儿。这在德国式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由于饮食太差，加上

气候不适应，同学张某得了肺病。他先还撑着瞒着不吭声，后来咳得厉害，咳出血了才不得不去医院，却已晚了，肺病已是晚期，拖不多久就死了。

冯家遇眼看着这位广东籍的同学好友死于肺疾，将年轻的生命抛置在异国他乡，一个美丽的强国梦破碎了，真是悲痛交加，难以言说。他和姓张的同学在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时就同在德文班，彼此十分要好，志趣相投，又一同出洋留学。两人同住一个简陋宿舍，同吃一份面包，怀有相同的理想，要为中国振兴干一番大事业。却不曾料到他因为饥寒贫病而早早弃世，只遗给了挚友一番酸涩痛楚的肺腑之言……

掩埋了好友不久，冯家遇发觉自己也染上了肺病，长咳不止。德国医生诊断后，用十分严厉的口吻告诫他，立即中止学业，赶紧去埃及尼罗河边休养治疗一年。

要治疗一年？还非得到北非那些著名的疗养胜地去？钱呢？还有更金贵的时间！难道让我把整整一年的功夫都花在晒太阳、泡海水上面吗？

冯家遇知道自己无法按德国医生吩咐的去做。万般无奈，他只得放弃了即将完成的学业，拖着病乏的身子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祖国。

此时是公元 1910 年，宣统二年。中国这块浸淫了数千年帝制皇权威势的土壤上已堆满了反叛的柴禾，反满清倡共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南方，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组织的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在北京及北方诸省，朝野内外一片混乱，相互防范，相互倾轧，而如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勃勃者则窥伺以搏。以上各种迹象都可看出，清廷的日子不会长了。

冯家遇回国后稍事休养了一段日子，身体渐好，就按自己的志愿，进了直隶省兵工厂，当了一名帮办，相当于副厂长。

年仅 22 岁的冯帮办初进自己国家的兵工厂，还带着一腔热情和美好的意愿，想象着自己可以好好地为国效劳，把兵工厂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国内一流的工业基地，但不多久现实却给了他一个莫大的嘲讽。

这座名为兵工厂的厂子，实际上只是个稍像样一点铁匠铺，不要说自己设计制造兵器，就连较先进的枪炮都不能修理。机器简陋，人才奇缺不提，就是担任主管的那几位满汉官吏，也是不学无术，只知弄权舞弊，中饱私囊。那位脑满肠肥的督办除了捞取私利，从不管厂里生产情况，收到冯家遇几次递呈的改进工厂的建议，都轻易搁置在一旁，还以讥言报之。在这家兵工厂，冯家遇竟成了受冷遇受孤立的人。喝了一肚子洋墨水，怀了满腔爱国热情一心要报效祖国的冯家遇，碰了多次壁后，深知再靠这样的腐败朝廷，中国是无望了，后来他就离开了直隶省兵工厂，开始酝酿自己筹办实业工厂的规划。

自 1915 年始，冯家遇走上了工商实业界，先后创办了保定电灯公司、天津恒源纱厂、天津大陆银行、大城银行和天津东方油漆厂等。在他几十年的实业生涯中，投入最多且办得最出色的是东方油漆厂。

创办油漆厂的起因是为买几桶油漆而引发的一场争端。

大约是 1920 年春夏间，冯家遇在天津建造一幢住宅，一天他急需几桶油漆用于门窗涂刷，便去一家德国商行购买，时值周六下午，那家商行的伙计，一个略会叽咕几句德语的中国二毛子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说该商行规定周六下午一般不售货，除非是与商行关系亲密的西方商人和官府权贵。

性格倔强的冯家遇一听便暴怒了，用一口流利的德语狠狠骂了一通，然后脚一跺，发誓道：“我自个儿办个油漆厂，看你们这帮恶狗还能傲气几天！”

当时说的是气话，回家后冯家遇仔细一想，才知真要办成油漆厂，难度

是极大的。

开办最大的难处是资金。其时冯国璋刚去世不久，因原先替冯家操持产业的管事贪心捞钱，办完老爷子的丧事后一结算家产，竟处处亏耗，无钱可养冯家后人了。幸亏冯家遇看出破绽，找人封账查核，查出漏洞，管事不得不吐出贪污的大笔资产。

靠着这笔钱，冯氏五兄弟和其他眷亲有了生活着落。但冯家遇想办油漆厂，拿大笔资金投资单靠遗产这点钱是不够的。他只得去找合伙人，找了两个合伙人，即陈菽良、孙润甫；合伙人也没多少钱，最后冯家遇用全部家产作了抵押，从他本人有股份的大陆银行借了五万元钱，统共约六七万元作了开办油漆厂的资金。厂址就在他自家住屋旁的一块空地上。

东方油漆厂，这东方第一家油漆工厂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时隔半个多世纪，座落在天津这个华北最大的商埠和工业城市东部的全国最大的油漆生产厂，以灯塔牌油漆驰名世界，在国内销量一直稳居首位，在该厂的厂史记载中，创办人即明明白白地写着“陈安甫”三个字。这“陈安甫”是陈菽良、冯树安（家遇的字）、孙润甫三人的合名。

很难相信，中国第一家油漆厂的第一批合格产品，会是一个学机械铸造专业的人调试成的。这首批“国货”的油漆，有个奇怪的注册商标：猫牌。油漆罐上印着一只瞪着两只机灵眼睛的小猫。

猫牌的来历有个小小的趣味故事。

憋着一肚对外国油漆（洋漆）的怨愤，冯家遇倾尽家资办起了油漆厂。厂房盖起来了，制罐车间、磨油车间、熬油车间、成品车间都按部就班建成了，连工人和管事的都招齐了。可临到要开工了，冯家遇才想起，自己连怎么配制油漆的生产过程都不懂，甚至也没见过，怎么生产法呵！

他在德国学的是化学冶金专业，回国后也一直跟机械冶造打交道，搞油漆完全是门外汉。其时国内还没有一家油漆厂，连找个点瞧一瞧门道都不行。亲友们都劝他算了，办什么厂不好，非得办这油漆厂？

倔性格的冯家遇却不肯作罢。他打听到天津有位出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姓刘，学的就是这一专业，便登门去拜访，又把刘教授请进家，热情款待一番，请他讲讲油漆生产的基本知识。冯家遇像个小学生似的坐着听讲，因为他学的化学冶金专业跟油漆多少有点沾边，所以很快就懂了些门道。

冯家遇下决心干了。

冯家遇把他配制油漆的试验室安在自家的书房里。把书房内的书籍、字画、笔砚之类统统搬开，又找来许多废玻璃瓶罐和一些借来的实验仪器用具，把个书房充塞得满满的，他向家人宣告，在他调制油漆期间，任何人不得擅入他的“实验室”。

那些天，冯家遇如痴迷了一般成日成夜地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凭着刚学来的一点基本知识，照着借来的几本简易的油漆专业书，一次次地调试配方。他不光忘了吃饭，每天用餐时总得家人在门外催过几遍，才勉强走出来吃一点，然后赶紧又钻进那屋里了，连睡觉也没有记性了。有一回早上妻子敲门让他出来吃早饭，冯家遇走出来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竟问，天亮了么？我还没来得及睡呢。妻子又好笑又心疼，你不会看钟点吗？可那屋里的座钟几天没上发条，早停了……

年轻气盛的冯家遇，在他的“实验室”足足呆了几十天，终于凭着自己的韧劲和一颗聪明的脑袋，借用几本普通的技术书籍，和临时学的一点基本

知识，苦熬苦干，把合格的油漆产品配制出来了。

成功的喜悦让冯家遇如过节一般开心。他让妻子为自己换去那身满是油污的衣衫，好好地喝了一回酒，然后倒床酣睡。等他醒来，揉开惺忪的眼睛，却见桌上盛置油漆成品的瓷碗倾倒了。猩红色的油漆从桌面流下，淌在地板上，积了一大滩了。

冯家遇大为光火，心想哪个家人这么大胆，敢撞入他的书房作下这等祸祟。正要兴师问罪，却见他心爱的花猫，怯怯地伏在桌子脚旁……原来是花猫惹下的祸水。

由此事故触发灵感，冯家遇就将东方油漆厂的首批产品商标定作了“猫牌”。

经过数年努力，“猫牌”国产油漆终于打开了销路，在全国十几个省市都有代销，连新疆甘肃云南都有较大的销量。其质量可靠，售价公道，成了外国油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打响了国产名牌油漆的旗号。

东方油漆厂在抗战时期，因日军封锁了太平洋马六甲海峡的商运通道，断了原料来源，几乎造成停产歇业，为了维持工厂生存和数百名工人的生计，冯家遇决定将库存的一些原料省着用，限量生产，仅以维持厂家不垮、工人不散为准。在这艰难的八年中，冯家遇时常得靠变卖家私以贴垫油漆厂的亏损。好不容易才熬过了最困难的年头。

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天津的大员们整天只把心思用在营私舞弊打内战上，将天津当作了他们的钱财库和淫乐窝，根本不顾及民众疾苦和民族工业，东方油漆厂依然是朝不保夕，难以发展。

此时，冯家遇已年及花甲，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其他疾病，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油漆厂这么不死不活的模样，他失望至极。这位年轻时便有鸿图在胸，立志创业，以实业拯救颓败国势的留学生，经历了满清朝廷、军阀割据、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四个时期，结果没有一个政府鼓励支持民族工业，重视以工业增强国力基础，走向强国之路。

在绝境中，冯家遇忽然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听说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宣传，其中就有重视民族工业之说。所以冯家遇在共产党解放天津之前，就对当时主持油漆厂的大儿子说：“看来办工业还得靠共产党。”

天津解放后，因为有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上有王光英等民族资本家的努力和共产党干部的支持鼓励，整个城市的工业生产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东方油漆厂也如愿以偿，厂里来了党的干部，新政府拨给了工厂添置设备和购买原料的贷款。生产很快就上去了。三年内产量和销路都创了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众所周知，解放初期过激的斗争和接踵而至的运动，也开始挫伤那些热心爱国的人们。三反五反运动中，工作组只凭主观想象，就把东方油漆厂当作了“大老虎”来打，强令冯家遇、冯海 交待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严重罪行”。

冯家遇此时已年老多病，面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真是辩说不清，服罪不能，一惊一气就病倒了，去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胃穿孔，须立即手术治疗。

但这个个性刚强的老人却拒绝手术。他躺在病床上摇头说：“不用了，让我死吧。”

没几天，冯家遇就去世了，终年 65 岁。

此后经严格核算、检查，东方油漆厂没有一分钱的偷漏税，至于偷工减料也难以立罪，工作组最后仅以核查成品罐装油漆，其中一听份量差了几克论罪，给东方油漆厂安上个“基本守法户”，以示它不是很清白无辜的。

顺便说一句，当时天津被查的私人厂家没有一家是“完全守法户”。

冯家遇的一生经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回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奋斗历史的缩影，海外世界很精采，海外世界也很惊险，很让人积怨积恨。

冯家遇留学德国四年多，期间他也周游了法、英、奥等国。他惊服西方列强那强盛的创造能力和那种民族的自强精神，同时也十分痛恨那些国家鄙视他国的做慢秉性。

冯家遇这位留学生，回国后便再也不穿西装，也不说洋话，整日是长袍马褂瓜皮帽，手执线装古书。他认为欲强己国，必先自尊自爱，因而，这位脾气固执的留德学生竟让自己的儿女们读私塾，读四书五经，尊孔子礼。他还给后代留下三条戒律：

第一，不能在租界购置房产，谋求外国保护；第二，不许出洋读书，娶外国老婆；第三，女人不能戴钻石戒指，因钻石戒指最昂贵，而且都是从外国进口的……

儿女们都严格遵守着他立下的戒律。他们都呆在国内受高等教育，在此之前已在自家的私塾里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背得滚瓜烂熟；但他们在国内选择的大学又多是外国人开办主持的名牌大学，如燕京、辅仁、育德、南开等，而且多注重选读实用专业，并如其父一般精通德、英、法、俄等国语言。如长子冯海 读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接受德国教授严格的教育，精晓本专业，会德、英、法、日等数国文字，毕业后进东方油漆厂主持技术工作，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和接替人。

冯家遇一生正值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国势颓败、屡遭他国侵略掠夺之时，因而其受的教育和处事经略总处在矛盾交织之中。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欲其强盛，又怨其民不争，其政无能；他叹服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工业水平，却厌恨西方列强的政治文化和强权政策；他办实业为振兴民族工业，却不屑与官僚政客合作；要生产国产油漆，却不得不从德国进口原料……

冯家遇几十年办实业，投入资金最多耗费心血最多的是东方油漆厂，但这厂始终未有大起色，直到 40 年代末也不过是个几十万资产数百工人的中型工厂。他一生不愿与官家合作，抗战期间，日伪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克敏，原是冯国璋的嫡系部下，他几次邀冯家遇出山做大官，冯均力辞，以黄胆水涂脸以示疾病缠身，不能出门。此事曾见诸于报端。共产党接管天津后，老先生一反常态，积极支持配合，参加一些工商界会议，与共产党领导人商议拯救天津实业之大计……但最后又在失望和沮丧中默默死去，没留一句有关他此生经历几代朝政理该告诫后人的临终嘱言。

冯巩出生时，他的爷爷已故去数年。幼小时，他偶而从父亲与伯父叔叔们的交谈中得知一点爷爷的旧事。有时他独自在堂屋凝望那帧挂在堂中的已逝老人不苟言笑的照片，感觉自己很渴望与这位脾气刚烈固执的爷爷说说话，听他讲讲出国留洋读书，与德皇见面的有趣故事。外国是个啥样子？家里这么多伯父叔叔，还有同是辅仁大学毕业的父母，都没出过国，没见过德国那个街上连一张纸屑都没有的柏林城，这是爷爷生前说过的，还有伦敦那座著名的大桥，巴黎的凯旋门，还有爷爷去实习做过工的德国最大的工厂克虏伯钢铁厂……

海外，对尚在童年的冯巩来说是个虚渺而又不可捉摸的字眼，并且充满着神秘和惊险感。家门外不远就是流贯天津的那条叫海河的河流。他时常在夏日里去海河游泳，捉鱼，有时玩着玩着就发了愣，脑子里忽然就想：这海河外面就是大海，大海的那边是什么地方呢？我能不能从海河游泳出去，一直游呵游呵，游到那里去玩玩呢？

可是当某一天，他忽然听说，他的十三叔冯海山去了香港了，他竟没有一点兴奋，而是有某种凄惶和失落感。

这是 1973 年，因为林彪“自我爆炸”，“文革”的热浪稍稍有点平息。冯海山和一个华侨的女儿结了婚。由于那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叶剑英的热心帮助，他和妻子终于办妥了移居香港的手续，离开了冯家世代代生息和繁衍的这块古老土地。

冯海山走得很急，很隐密，甚至都没跟天津这边的亲友们打个招呼，因为那时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风浪，万一泄出此事，让哪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局外人去捅一下，就可能再也去不成了。

那天冯巩去北京马季老师处学相声，照往常一样又去东单三条 36 号居民大院。可原先几个叔叔住的那间小屋，只剩下十四叔冯海岳一人了，孤零零的。他见了冯巩，只是苦涩地一笑。

晚上，冯巩睡在曾是十三叔海山睡的那张床上，脑子里总是想着十三叔那张很少有笑容的脸：短短的板寸头，眼角和额头有几道与他不足 30 岁的年龄不相称的深纹。原先床头擦得很高的书都没了，只剩下一副用旧木料拼制的简易书架，如剔除了血肉的兽骨，还有墙上贴的一幅松鹰图也没了，那是十三叔前两年画的，是他的得意之作……

冯巩很想问问十四叔海岳，十三叔为什么要到香港去？那儿好吗？听说那边资本主义花花世界里，富人享福，穷人很吃苦的。十三叔去那儿，算是富人还是当个穷人？

少年人想不通这道理，也不敢发问。他看十四叔，还有小六姑小九姑她们自大哥一走，也都失魂落魄似的。

还是父亲给他解答了这道难题。“海山这也是被逼上梁山呵。这几年他家祸灾不断，父母死了，前些日子海岭又疯疯癫癫了，最后竟自杀了，弄得远远近近的人都用鄙视的眼光瞧他们。海山海岳他们都是有艺术才华的青年，绘画和装裱方面都有专长。可偏让他们整天敲铁皮，干那种毫无创造价值的粗活，而且还得常听别人喝斥、批判。你说这日子能熬到白头吗？唉，他们也是冯家的后代，也遭了罪了！”

冯海山到了香港，有了施展自己艺术才华的较好条件，经过几年的潜心磨练，他的绘画水平提高了许多，终于开始向外界展露他的艺术。他先后在香港、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区和国家举办了个人画展，赢得诸多艺苑高手的称道，认为其国画源出先师风骨，又独添一己异彩，形成了独特风格。

冯海山在香港生存其实也不容易，为了生活和艺术前途，他还须给初学画者作指寻，教习作，以增加点收入贴补家用。另外他还以自己曾研究多年的气功用作教学，满足当地气功爱好者的需求，也获得一些经济来源。

几年后，渐渐在香港立稳足跟的冯海山，又帮海岳办了手续，把他接到了香港。这时海岳的装裱艺术才有了施展的天地。数年后，他有了“著名装裱技师”的美号。当时《星岛晚报》还以“冯国璋嫡孙冯海岳装裱技术誉满艺坛”为题发表了长篇报道。冯海岳在其兄的帮助下，打开了他的装裱艺术

的天地，为许多慕名而来的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欧美、日本等地的收藏家的古旧字画及现代书画，进行了修复和装裱。他后来还创办了香港中承中国艺术中心。祖国大陆政策开放后，冯海岳又数次回到老家，为祖国大陆的艺术家的书画装裱，或是介绍作品到海外开画展，做了许多有益于艺术发展与交流的工作。

冯海山于几年前移居去了澳大利亚。他去那个位于南半球的国度，是被那儿的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所吸引。据说现年已届半百的冯海山渐渐由绘画和气功而移情于佛学，潜心攻读佛学著作，并吃素行善，做了一名在家带发修行的居士。

远在大海那一端修身念佛的冯海山的这种“彻悟”，其根源是否还是几十年前的那场巨祸，便不得而知了。

幼小时那个蔚蓝色的梦，忽有一天就轻易地实现了。不过他不是游泳游出大海的，是波音 737 飞机的巨大羽翼把他带出去了。

1984 年 4 月，冯巩刚调进中国广播说唱团，就随同由马季为团长的“中国广播艺术团曲艺相声演唱团”赴港演出。

起程前，他们在密云水库的骆驼宾馆进行了 40 天的封闭式排练，冯巩和刘伟准备了好几段相声：《拍手歌》、《生活的强者》、《家乡的歌》、《约会》、《旅行家》等，一个个精雕细刻，背得滚瓜烂熟。

毕竟是头一回到香港。那香港虽说是中国国土，可咱老祖宗无能，把它割租给大英帝国，去那儿得费很大劲儿，一点儿也不比到别的国家容易。1984 年，祖国大陆和香港还没正式通航，北京的飞机得在广州降落，再乘火车经深圳过关，才能进香港，光是排着长队办理入境手续就得等几个小时。

终于乘车驰入了那个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车进香港闹市区时，正值夜色已浓，夜香港的景致特别诱人，一幢幢摩天高楼拔地而立，如携手并肩的巨人；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异彩，将夜色描画得妖烧无比；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让人觉得置身于奔腾的江河；还有那些衣着新颖得体的男女，琳琅满目的商店……

那时的北京及祖国大陆的其他城市才开始加快改革步伐，高楼大厦才开始设计图纸，或刚刚打下一排奠基的钢桩。香港那风采四溢的市容自然就让初次赴港的冯巩大开眼界，感叹不已。同是中国的土地，一样是说中国话的华夏子孙，只是因为人家稳稳地搞了几十年经济建设，不像祖国大陆上老是“革命”，老是“运动”，把一次次良机错过了，把一个个都弄得意懒心灰了……

当然，感叹归感叹，冯巩忐忑不安的还是演出问题。虽说节目准备了不少，也很熟练，可他怎么说也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嫩得很。香港人只晓得侯宝林、马季、姜昆，有谁知道冯巩？还有，香港人都说广东话，没有多少能说标准国语的，谁会爱听相声？

所以，刚在宾馆住下，冯巩就向马季老师探探口风了。

马季呵呵一笑，细眯了眼对爱徒说：“甭吊着心，京剧、相声的根在祖国大陆，北京的相声是最正宗最棒的。香港人都想瞧瞧啥是正宗的相声艺术呢！前年我和侯先生来香港，算是投石问路，没料想引起了轰动，这回咱们这套精良兵将有备而来，不轰动一下才怪呢，放心大胆地上台吧。”

真让马季说着了，祖国大陆的相声果然在香港引发了一场旋风，连日里大报小报消息，连篇累牍地介绍著名演员和祖国大陆相声发展的繁荣状况，

八场的演出门票早已订购一空。到首演这天，香港大剧院门前挤满了等着退票的人，其中不少是希望能有机会一睹祖国大陆著名笑星丰采的。

冯巩的担心确是多馀的，他以为在马季、姜昆、李文华等众多名家之中，他在香港人眼底只是无名小辈，可没想到他们两个年轻人一上场，观众的掌声却格外热烈，说完相声退场时，掌声便如炸雷一般。

这使冯巩深受感动。他联想到 1981 年初次在首都体育馆演出差点被撵下场的尴尬情景，深感祖国大陆和香港两地观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一是重资格信权威，敬慕既定成就者；一是注重实际，奖掖后生，鼓励后来居上。无疑地是后一种对社会进步和人才培养更有益处！

在祖国大陆尚无名气的冯巩、刘伟的相声表演，竟引起香港观众和新闻媒介的极大兴趣。连续有报道对他俩的表演表示赞赏，“刘伟热情、潇洒、声情并茂；冯巩幽默、含蓄，憨中见智。一曲《家乡的歌》、一段《旅游家》带我们游历了整个世界……”港人认为，他们是继马季、姜昆之后的又一对优秀的相声演员，前程远大。

可这时祖国大陆许多观众还不知道冯巩这名儿呢！

1986 年 12 月，冯巩又随团去了新加坡演出。这是他的又一次渡海艺术交流活动。

与首次香港之行不同的是，此时的冯巩已凭着春节晚会的一段《虎年说虎》，赢得全国亿万观众的赞誉，作为新星的名气已如日中天了，所以，这次去新加坡便更觉压力重。因为你是明星呵！

新加坡，这个位于东南亚的美丽岛国，弹丸之地，270 多万人口，眼下竟建成世界第二大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这个华裔人口占 70% 以上的国家，敬重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京剧、相声等都是新加坡人极喜爱的艺术门类，新加坡有“相声新风学会”，除了专业相声演员，业馀相声爱好者不下千人。因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相声艺术团体首次访新，自然会引来不小的轰动。

中国广播艺术团抵新后，当地的《新闻报》、《海峡时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报刊以及一些电视台、电台争先恐后地对中国相声演员首次抵新演出作了大量的报道。冯巩的成名之作《虎年说虎》已早在新加坡播放过，所以对他的评价文章特别多，采访记者络绎不绝。他外出走动一下，很快就被人们认出来，热情的新加坡人纷纷向他问候，请他合影和签名留念。令他很惊讶的是新加坡人的文明礼貌程度。问候声是那样彬彬有礼，即使一大群年轻人簇拥着他，也显得温文尔雅，既热情又大方，请他签名时会自动排成队，绝没有内地那种热情得让人难堪、受不了的场面。跟香港比较，新加坡人的文化艺术修养更高。香港人爱热闹，看电影看演出都是冲着名人去的；看相声演出是看新奇看热闹为多；而新加坡人则把相声当成一门真正的艺术来欣赏，对幽默的理解很透彻，听得很仔细，认真，有些相声语言在中国观众中间反应不大，他们倒可以品尝得津津有味。1991 年 3 月和同年 9 月，冯巩再次赴香港和新加坡演出；1992 年 9 月，他又随团第三次到香港；1993 年 4 月第三次赴新加坡演出。后几次渡海演出，冯巩已是名扬海内外的大牌明星了，和初次去香港的心境感触已不尽相似了。香港演出，依然那么火爆，那么受欢迎。香港人对演艺日臻完美的冯巩十分敬崇，献花、签名、合影、请吃饭，令冯巩应接不暇。但于此热烈欢快中也有不安和不快。冯巩随团到香港、新加坡，都由中国官方有关机构安排住宿和活动，他们为

节省开支，三人住一间房，又集体用膳，集体外出参观或游览。一些香港演艺圈的朋友去冯巩处，见他们三人挤住一间，便觉不可思议，“怎么，大陆最有名的相声演员就这待遇？”听说冯巩这位国家一级演员基本工资仅有180多元，在办公楼排演厅隔出一小间住了六年时，港人惊诧不已，“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便热情地邀请冯巩去吃饭，去逛商场，吃最高档的菜，选购最昂贵的衣物。香港朋友们热情，慷慨，他们的皮夹子塞得满满的是一沓沓的港币或美元。他们用自信的手指头麻利地点钞票付款。那种时刻冯巩便常看出他们坦然自信的脸上还流动着富足的得意。

这使他总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他觉得内心的某一处被触痛了。在这里，内地演员为什么不能住单人包房？内地演员为啥不能开私人宴会？内地演员为什么不能潇洒大方地出入高级酒店、商行，总让别人来关照，施舍一般地赠与，让别人装一肚子得意拿眼小瞧你们？……

冯巩不想折了自己的腰板，因为此时他的腰板不姓冯，而姓“中国”。他是代表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11亿人的，真正是举足轻重了。对纷至沓来的邀请和馈赠，他或坦然接受，或婉言谢绝。去酒楼应酬，他经常抢先付帐，别人送了礼物，他非回赠一份不可，虽然他腰包里人民币不很多，但他仍坦然出手，毫无窘涩，因为他是祖国大陆一个有着强烈的自尊自爱感情的人！

有一件小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某晚，香港大剧院。演出已经开始，冯巩立于舞台一侧候场，因舞台监督指挥失误，负责拉幕的职员一时手忙脚乱，顾不上拉幕了。

冯巩见状，立即上去帮忙。这种事，他在大陆做惯了，冯巩自开始登台演出到成为著名笑星，爱帮人干活的脾性一直不改。

不料他一插手帮忙，反使那位职员十分地张惶不安，满脸歉疚，用恳求的口吻让冯巩不必劳累费心。另一侧的主办人也赶紧过来劝阻冯巩，“冯先生，对不起，请让我们自己来，对不起，怎么能让冯先生……”

在香港，名分、地位是极讲究的，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应恪守身份，别降格做与艺术家无关系的事；普通职员则做自己份内工作。当然，一个职员也可凭自己的潜在才能争取做艺术家、教授，甚或总经理，但到那时你就不再是普通职员，再不能接触普通的活儿了。香港这地方就是按这种严格的等级制来明确各人的社会角色，通过这样的鲜明级差，促使人们严于职守，鼓励竞争。

港人已形成并习惯了这种社会角色分工法，不允许有“兼角色”的情况，像冯巩那样一个大牌名星去帮着拉幕，就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又破坏了别人的工作职责，那等于是指责那职员没做好工作……说严重点，冯巩一伸手拉幕，就做下了违反香港的社会分工原则和职业道德观的错事了。

这事让他百思不解，大概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缘故，他起先想，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不平等的一种典型事例，可后来却又有某种感悟：等级制如果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难道没有它合理存在的一面吗？

1992年3月，冯巩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飞往一衣带水的日本国。

自1895年冯国璋以筹事随员身份渡海去日本考察军事教育，时隔近百年，冯家后人才有冯巩作为中国青年人的代表再次踏上那个与中国恩恩怨怨千馀年的日出之国。

和同行的一些青年代表相比，身为冯国璋后代的著名相声演员冯巩，赴

日本的心境要复杂得多。

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住五星级宾馆，坐高级豪华车，走访了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等著名城市，参观了日本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公办或私立的大学；参观了日本的科技城和著名的大公司；品尝了日本人最爱吃的生鱼片，欣赏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伎表演。当然还有别的许多能显示日本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强盛繁荣的东西：东京银座号称太阳城的高楼群、世界上时速最快设备最先进的铁路新干线；东芝、丰田等公司的装配线……

置身于一个富足强盛的日本，对来自中国，物质享受相对贫乏的人们来说，除了敬服和感叹，也能引人心绪烦乱，甚至心底隐隐作痛。日本民族是勤劳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也有无数勤劳勇敢的人们？为什么就落在别人尾后？远的不去说它，单是近 100 多年，位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便一直是或明或暗的交锋对手，是一对恩怨难释的近邻。跟日本交手，中国是败多，吃亏受辱多。19 世纪末，两边几乎是同时起步，欲借西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之模式，崛起于东亚。结果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流产了，洋务运动半死不活，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则惨败于日本皇家舰队，清廷只能卑躬屈膝在并肩而起的日本国面前，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被世人骂了几十年卖国贼的李鸿章，当年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态，用颤抖的手签下《马关条约》的？这位北洋大臣创建北洋水师，创办北洋陆军武备学堂，难道不是为了中国的强盛和自立？1895 年 4 月，李鸿章代表清廷签了《马关条约》后，即赴日本，随行一千人中就有 36 岁的少壮军官冯国璋。李鸿章一向器重这个在北洋陆军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中考了第一名的学生，深知冯国璋胸有大志，且有韬略之才。冯国璋后来果如李鸿章所期望的那样，成了辅佐朝廷的实力人物。但是，李鸿章也罢，冯国璋也罢，又如何能凭一帖草药解救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人第一次在战败的日本人面前扬眉吐气了。然而内耗和自虐却又严重地伤了国家元气，再一次失去与日本争抢上风的机会。战败国的日本倒凭借美国的扶持，兢兢业业地挣下了一份富得流油的好家产，又可以抖威风了……

十几天的日本之行，冯巩真是感慨万千，经常久久难以入眠。

也许他是过于敏感了。他对那些献着殷勤笑脸，恭敬得过分的日本人不那么有好感，觉得那躬成 90 度的腰板后面恐怕还藏着一副傲慢轻蔑的嘴脸。有一回，他被邀去吃饭，在日本的小酒馆里喝清酒，吃那种别有风味的生鱼片。席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作陪的日本人称道生鱼片味道如何好，“价钱很贵的”云云，冯巩即毫不犹豫地抢先付了帐。那日本人执意要退钱给他，他坚决不收，大声说：“没关系，我有钱。”

一旁喝酒的日本酒客见他们推让着，便问冯巩：“你是韩国人吧？”

冯巩收敛了笑意，正色道：“不，我是中国北京人！”又特意用英语重复一遍，“No, I am from China Beijing!”

台湾，祖国的宝岛。

一条狭窄的海峡，将祖国大陆和台湾岛隔开了。多少个秋高月朗之夜，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默默地遥望彼岸，祈盼他乡的亲人们安康长寿，等待着两岸相通，重新聚首的一天到来。

这些年来，冯巩去香港、新加坡好几趟了，连日本也去过，却唯独未能去台湾。他非常想去那儿，带上最拿手的相声段子，让海峡彼岸的中国人听听原汁原味的京味相声，同演艺圈的同行人切磋切磋艺术。另外，他作为冯家的后人，负有代表本家族父老探望离散 40 多年的亲人们的特殊使命……

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中国广播艺术团受台湾民间的堂吉诃德公司邀请赴台演出。冯巩随团同去。一行人于 1993 年 7 月 27 日由香港转办手续，乘飞机飞抵向往已久的台湾岛。

抵达台北市中正机场时天色渐黑。来迎接的堂吉诃德公司负责人，将北京的客人们送往下榻的国联大酒店。

来机场的还有冯巩的堂兄冯小龙。他是台湾中广公司新闻部总编辑。曾到北京作新闻采访工作，和冯巩见过面，这回再次在台湾相见，两人异常兴奋。冯小龙说，这回来台湾得好好玩一玩，台湾还是有许多可玩的去处的。

车子进入市区，途中经常堵车，情状竟如近时的北京。原来台北最近大搞地铁工程，突击一段时间完工后，就可大大缓解市内交通拥挤问题。冯巩笑道：“北京、上海也都在修地铁，看来只要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总是很相近的。”

冯小龙拉冯巩到台北市最有名的一条食品街去吃上海菜，“让你尝尝台湾的上海菜味道怎么样。”

冯巩将信将疑，随冯小龙走进一片不那么起眼的小菜馆，门面不大，堂内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摆了几张食桌，十几位客人散坐着。

等菜上来，一看，一尝，哟，真是地道的上海味呢！在北京还吃不到这么正宗的上海菜呢。

吃罢，两人又逛了那条街。只见两边都是食铺菜馆，挂着各样店牌，或川味火锅，或扬州大菜，有广东菜，也有湖南菜，凡大陆上有点名气的地方风味，这条街上竟全齐备了。就连东北的酸白菜、酱豆腐都能货真价实地端上桌来让你品尝。

这就是台湾。冯巩心里暗暗感慨，虽然因历史原因而跟祖国大陆分隔几十年，可骨子里中国人的血脉还是相通的，文化传统、饮食习惯等等，不是靠一道禁令和一条海峡就可以阻隔的。这小小的一条食品街便是极好的例证。

中广艺术团到台湾演出的消息，早几天即由一些新闻媒介作了预告，所以台北人已在翘首等待了。到达的次日一早，“台视”《早晨你好》节目主持人便赶到国联大酒店，点名要采访冯巩等人。

采访是以漫谈方式进行的。

昨晚一到就逛街吃台湾的上海菜，后来在街上走时，冯巩瞧见商店橱窗里摆着四个男模特，套着很新颖的服饰，便问冯小龙：什么意思？

冯小龙说：今天是台湾人过男人节。又说如今台湾人如何爱过节，介绍了种种节日情况。

所以采访时，冯巩和牛群两人就从台湾人过节这个题目谈开去，用轻松幽默的语调谈论台湾人的种种节日，其中的许多节日内地人也一样要热闹欢度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而台湾则还有男人节、父亲节、七月初七情人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又叫“中元普度好兄弟”，还有十月十五下元节。最有意思的是十二月十七尾牙节。商店老板

在这天要请雇员吃饭，如鸡头对着谁就意味着炒了谁的鱿鱼了……两人妙语连串，简直就是一段好相声。

这十分钟的采访节目，当天就在《早晨您好》专题节目中播出了。据说很受观众好评。

这事“台视”还冒了风险呢。因台湾当局有令，凡播出涉有祖国大陆人士的节目，必须提前一星期交有关部门审查。“台视”没送去审查就播了。好在这种谈中国文化的话题不会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

28日这天是最忙碌，也是最兴奋的。

这天上午，冯巩和艺术团一些人去拜访了台湾“海基会”的秘书长邱先生，向他送了礼品，在随和的气氛中聊了两岸文化交流情况。

回到国联大酒店，冯巩就听人转告，张学良先生的秘书廖先主要见他。他赶紧去迎，那位年愈古稀的老先生已健步走来了，隔着很远就响亮地喊着：“冯巩，哈哈，我可见着你了！”

冯巩有些意外。坐下一谈才明白，原来这位廖先生从“卫视”节目中看了冯巩主演的电视剧《那五》，非常赞赏这个剧本和冯巩的表演，认为确实确实拍出了清末民初京城的风物人情味儿。他把该剧录下来，介绍给了许多人看，称赞不已。

冯巩很高兴能有廖先生这样一位远在台湾的老前辈给予的称道和热情。两人一见如故，说得十分投机。说到后来，廖先生竟是冯巩父亲冯海岗的同学，早年抗战时期曾一起就读于耀华中学。冯巩感慨地说：“真是和廖先生有缘呵。有机会请一定回内地去看看，天津如今可是大变样了！耀华中学旧址恐怕还在呢。”

冯巩和姜昆、牛群、倪萍等一行人在廖先生的引荐下，探望了年及九旬的张学良先生。在张的五弟张学森家，祖国大陆年轻的艺术家们和那位因著名的“西安事变”而受囚达半个世纪的老人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聚会。

90高龄的张学良精神矍铄，思维依然十分清晰敏捷。冯巩等人欲多说些趣事笑话让老人高兴。不想倒听张先生说了许多。老人见着了这些年轻的来自祖国大陆的艺术家，心情格外高兴，谈锋很健，也勾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从看戏听相声谈起他当年最爱听的东北蹦蹦戏，随即便唱了几段。唱了蹦蹦戏，又唱起了东北小调。唱罢，张先生意犹未尽，又说了不少当年流行东北的地方传说和笑谈。

在欢笑和愉悦之中一转眼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冯巩等人见夜已渐深，怕影响老人睡眠，便告辞了。张先生拉着他们的手不放，舍不得他们走，再三邀大家再来坐坐，聊聊天。

廖先生高兴地对冯巩说：“今晚是大爷近几年来最开心的一次，谢谢你们了。请以后有机会再来台湾演出，观光。”

中国广播艺术团在台北市的演出始于7月29日晚。演出在国父纪念馆进行。演出反响十分热烈，次日便有《民生报》、《星岛早报》等五家大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了反映演出盛况的文章和剧照。

艺术团在台北市演出五场，场场爆满，8月2日又加演了一场。

8月1日晚上，张学良先生偕夫人一起来到国父纪念馆，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来自祖国大陆的艺术家的精采表演。

冯巩在台上原有一段与台下观众交流对话的开场白，还要向台湾观众抛赠“吉祥鸡”。看见张学良先生来了，便与倪萍商量临时改改词，他热情地

向在场观众介绍，今晚张学良先生也来观看演出了，场内即响起了掌声。随后他向张先生抛赠了“吉祥鸡”，表示中广艺术团全体人员和故乡人民对老人的敬意。

在台湾的那几天，日程安排得很紧，除了每晚的演出，冯巩还作为《综艺大观》的客座主持人采访了台湾著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傅达仁先生，以及台湾演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文章、千百惠等。性情开朗的文章原先在北京曾与冯巩一起演出过，谈得很投机的，见了他便惊喜地大喊：

“哇——冯巩！没想到我能在台北见着冯巩，真是太高兴了！”

中广艺术团还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台湾新闻媒介介绍了本团情况以及目前祖国大陆相声曲艺等艺术门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另外还开了几次小型的研讨会。冯巩、姜昆、牛群等人跟台湾的专业相声演员及业余爱好者欢聚一堂，切磋艺术，十分愉快。

总算有了一点空隙时间，冯巩即由冯小龙陪同去看望了住在医院养病的三伯父冯海（著唐）。

赴台之前，冯巩回天津看望父亲和伯父海。两位老人再三嘱托冯巩，一定要向台湾的伯父说，请他身体健朗的话就回老家来走走，看看老兄弟们，祭扫祭扫祖父和父亲的墓，几十年没见了，真想他呵……冯巩将父老们的话录在磁带上，带去放给台湾的伯父听。老人听着那既陌生又觉熟悉的苍朗之音，不觉眼眶里已噙满了泪花。

冯巩在台湾的三伯父冯海，于1949年独自一人去了台湾，此后便一直在台湾的商贸协会担任秘书及负责主持一些商务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曾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做了不少事，算得上是一位有功之臣。前些年因年岁已高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

叶老归根，人老思乡。这是中国人的一条人生信条，离乡客居40多年了，年年都有中秋月圆时分，岁岁除夕盼阖家欢聚，冯海怎能不思念故乡，不想远在海峡那边的亲友们？

见着了朝气蓬勃的侄儿冯巩，这位冯家海字辈的离乡老人不由得心潮起伏，联想万千。他的思绪回到了昔日时光。他向侄儿谈起了少年时代快乐无优的趣事。那时他们海字辈的兄弟们，海、海岗、海巍、海等都活泼、好玩，诸人常在一起打球下棋，下海河游泳，寒冬便去溜冰。他和海岗、海，还有跟他们年岁差不多的五叔家周又都是京戏迷，经常一起去戏院听戏，逢节假日还凑在一块儿自拉自唱，十分开心。

三大伯冯海退休后的一大乐趣，便是少年时便喜爱的听京戏，唱京戏。去年他儿子冯小龙赴北京，他把自己唱的京戏唱段录下来，带去给老兄弟们听，几段余派腔唱得苍然凄切，韵味十足。

因为高兴，冯海和冯巩足足聊了近一个小时，医生护士和冯小龙多次劝阻才算罢了。老人心脏不适，这次一兴奋过度，当晚便病情加剧，幸及时抢救治疗才缓转过来。

8月3日，中广艺术团又去了台中演出。冯巩抽空去看望了另一位亲戚，台中大学姓陈的老教授，是他六姑冯坤的内叔。

陈教授是1947年应聘去台中大学任教的，此后40多年就一直滞留在台湾了。他请冯巩等人去他家，吃住都可以。陈教授有一套100多平方米别墅式的独家宅楼，厨房、客厅、书房、卧室、花园，一一俱备，生活条件已很优越了。儿女也都成人，有了各自的家业。

他感叹地对冯巩说，现在我什么都不缺，就是心里老是空落落的，连做梦也常出现年少时候的情景，真想马上回家乡去，了却这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

冯巩便告诉他，祖国大陆如今政策非常开放，希望他早日回家乡。陈教授说自己68岁，再过两年退休，就可以自由自在了。听了冯巩对祖国大陆开放政策的介绍，他决意要回家乡去，托冯巩帮他在天津买一套住房，以备返乡时住宿。

在台湾，短短的七八天时间，耳闻，目睹，接触的每个人，遇见的每桩事，都给冯巩留下了很深印象。尤其是那些远离家乡故土，久别亲人的老兵深切的思乡之情，使他感触尤深。

冯巩遇见了好几位六七十岁的老兵，都已满头白发，皆剪作如北京人喜欢的板寸头，据说是台湾老兵们保留军队退伍老兵身份的一种习惯。老兵们要冯巩转达他们的思恋家乡之情，说他们在台湾生活都不错，请家人们不必挂念，说话间，那满头白发便微颤了，布满深深皱纹的老脸上已有泪光在闪烁……

冯巩已“出游”香港、新加坡、日本、台湾。不久的将来还会有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地区在迎候他。冯巩的渡海之行，令他欣奇、惊喜，也令他深思、忧虑，感慨万千。

初次踏上罗湖桥去香港时那种新奇和惊叹，再不会有了。香港经济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比内地人普遍要好，但那里能感觉出文化的浅薄，人格的缺憾，那种人人为钱忙的市景总难以给人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新加坡人要比香港人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高，严明的法制使得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很有保障。但那毕竟是个弹丸之地，就像一池清水一样一眼探到底，很难再有什么撼惊世界的人物和壮举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创造了奇迹的是日本。在那个日出之国处处都有令日本人自豪的经济奇迹的象征物——从战争废墟中耸立起来的高楼和最先进的电气火车等等。但是，这个看来是如此富足的国家却给人一种奇怪的形象，似乎是一个非常密集的蜂巢，正由无数工蜂护卫着修筑着。压在激烈竞争和繁重工作下的日本人生活得并不轻松。相比之下，倒不如台湾人恬得舒适、自在，知道享受生活寻找乐趣。从经济实力上看，台湾有800多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人均收入上万美元，很少有失业之虑……

然而台湾也有它的致命弱点，地狭人众，资源匮乏，朝夕难顾

冯巩认为，渡海周游一大圈，最终还是觉得祖国大陆好，北京好。无论从文化艺术角度，还是经济前景看，祖国大陆都有了一个极好的基础，正在快速走向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之境。

所以，当一些朋友、记者，提问他的海外之行的观感，冯巩便有一番由衷之词。而当有些亲友试探着问他有无到海外谋求发展的念头，冯巩总是很干脆地说：“没有，现在不会有，将来更不会有。我相信祖国大陆会有我艺术追求的广阔前景，我艺术生命的源泉在中国！”

第十章 80年代，冯氏家族重又崛起

李瑞环慧眼识珠，把犟脾气的冯容调到规划局，天津的城市建设果然有了大起色

美国洛利市的国际会议上，中国女学者冯友从容走上讲坛
西北荒野 26 年的风沙雪泥，把冯幸耘磨练成一个干练的女干部
从米箩跳进糠箩的冯信，一心想造起一幢全天津最高最漂亮的大楼

冯家后代的出色成绩单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新中国展现出了一轮新曙光，改革开放终于使新中国的航船驶向了更加广阔的海洋，社会主义再一次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十几年来，在中国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也包括那些已被动乱年代耽搁了青春年华的知识分子，还有整整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他们是目前中华大地上创业的主力军。

在这支队伍中间，也有冯家的后代。他们在过去的年代中曾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现在，当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毅然决然地走在了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前列。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冯容来说，童年的美好记忆依然清晰如画。

童年时她们三姐妹，冯容、冯友、冯宾是父亲冯家迈最喜爱的宝贝女儿。每次他要出门去买东西、会朋友或者要去戏院听戏，总要带女儿一起去，那时就会招呼她们：“乖女儿，你们去不去听马大爷唱戏？”三个女儿就欢蹦雀跃地飞过去，拖着父亲的手和衣角，去听戏了。

那时她们都很幼稚，去戏院光为了好玩，并不认真听戏，只是嗑嗑瓜子儿，窃窃私语着，评判哪个旦角长得漂亮，哪个小生扮相俊秀。只有等马大爷上场时，她们才认真地看一回，然后就可以跟父亲讨论今儿个马大爷的唱腔棒不棒了。

马大爷唱老生，他就是后来很有名气的马连良，和冯家迈是很要好的朋友。马大爷常来西堂子胡同冯宅。来时身后必跟随着他的琴师李慕良。这李慕良的胡琴拉得好，因为仰慕马连良的好嗓子，就随了马，还改了名叫“慕良”。

马大爷一来，冯家就十分热闹。父亲让她们三姐妹来给马大爷请安。马大爷应声响亮，而后必然有随带的礼物：糖块、冰糖葫芦，或是小手绢之类的。马大爷很喜欢她们三姐妹，称赞她们长得漂亮，小嘴儿又甜，对她父亲说：“这三个丫头过几年准是唱戏的好材料呢。”冯家迈笑而不语。冯容她们三姐妹却齐说：“我们不唱戏，爸说了，要我们读书，学本领。”

马大爷来了必定要唱一回戏，不过他不多唱，冯家迈唱得多，另外凑热闹的有五叔家周，还有侄子们，也就是冯容的堂兄们：海、海岗等。海、海岗和五叔家周当时都在北平读辅仁大学，节假日不回天津，就必到西堂子胡同来。这几位也都是痴迷的票友，一听胡琴声响，嗓子眼就痒痒。最爱唱的是堂兄海岗，年方 20，仪表堂堂，又有一副好嗓子，学着马连良马大爷的唱词，字音尾腔都能十分逼真，维妙维肖。

有一回听海岗一曲唱罢，三姐妹中不知是谁，拍掌叫着好，又冒出一句：“海岗哥哥比马大爷还唱得好呢？”

在堂的大人们都愣了，做父亲的冯家迈板下脸斥道：“小孩子，懂得什

么好坏？快去外边儿玩去吧！”

女孩们不知父亲为何要生气。过后冯容悄悄问了母亲才得以知晓这个道理：当着名角马大爷的面，你们说海岗哥哥唱得比他还好，那不是把马大爷贬下去不值钱了吗？

冯容这才明白，原来在世上说话做事时常得防备着点，得忌讳着点，不然就可能挨斥，让你“一边儿玩去”！

可是秉性耿直的冯容度过了大半人生，还没学会怎样忌讳和防备。这使得她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时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不过有时又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951年，冯容以优异成绩从贝满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四年后毕业分配到了二机部第四设计院任技术员。

这个设计院是军工企业性质的，有相当的保密程度，它要求工作人员须纯洁无瑕。1957年反右时，在设计院内发现了大批的“不纯分子”，或戴帽或不戴帽的“右派”和“右派言论者”出了不少，结果被“请”出了该院大门。冯容属于“右派言论者”，被发配到天津盐场去了。

位于塘沽海边上的盐场，有啥建筑可设计的？可他们这一拨被赶去盐场的竟有三个是学建筑的，两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个来自天津大学。面对一大片白茫茫的盐田，三个学建筑设计的大学毕业生真是欲哭无泪，望洋兴叹。

但既来了，便得找事做呀。没有大建筑物可设计，那就搞小的吧，譬如一丈多高的简易工棚，男女厕所、食堂、家属宿舍等等。学建筑，在大学里课程是分专业的，建筑设计和楼体结构是两大独立系统。冯容学的是建筑设计，重在建筑物内部装饰和外形设计，可如今领导分给你的设计任务是男女厕所或食堂餐厅，你怎么分结构和建筑？成不成，你一人干吧。

这样一来，冯容很觉憋气，忍不住要去领导那儿说几句，但任务还是完成了。她只得又给自己开了兼学结构的小灶，很认真负责地把厕所或食堂的设计图纸画出来，然后又作为设计者，每天拿着图纸费尽口舌跟一帮从农村来的民工比画着，说该如何如何建造这厕所或食堂，那些农民泥瓦匠或木匠根本看不懂她这左一张右一张的图纸，面上不说，肚里好笑：造个茅房，还用得着在纸上画来画去的吗？

到了“文革”期间，冯容连画那种小型建筑图纸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你这种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配给无产阶级江山搞设计吗？资产阶级大小姐，请下盐田去干粗活，清洗清洗头脑和灵魂吧！她的鸭嘴笔三角尺工作台都被拿走了，下到了盐田，整天地扛盐包，或是干别的粗活。

在盐田劳动改造的几年，是她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日子。因为冯容喜爱自己的专业，只要趴在工作台上画图纸，再苦再累她也觉得心底踏实，一旦手中夺去了鸭嘴笔三角尺，那滋味真不好受呵！

几年苦熬过去了，到70年代初，塘沽要建体育场，有关领导慕名来盐场借用工程设计人员，点名要冯容。体育场工程干了近三年，盐场才发觉自己也需要搞建筑设计的，又把她要回来，给“革委会”办公大楼搞设计。

一年多以后，冯容设计的办公大楼落成了，果然新颖别致，比别单位的楼漂亮许多，这使得盐场头头们很得意，就“开恩”让冯容回到了工作台上画她爱画的图纸。

若干年又过去了，冯容设计的住宅楼房、医院、商店、影院、厂房、街道改造工程等等在塘沽纷纷竣工，越来越多，她的名气也大了。时间延至1980

年，发生了一件令许多人惊讶更让她本人大吃一惊的事。

某日在街上走，冯容遇见一位曾给她开过刀的大夫。那人见她便神秘地一笑，然后说，“听说这次区人代会上，把你列入塘沽区副区长的候选人名单上了。冯容，回去把你的工作台收拾收拾，准备去政府坐办公室批文件吧。”

冯容笑起来了，“你真会开玩笑，我冯容能当区长，那塘沽区谁都能当区长了。”

她哪里会相信这消息，回家又当流行笑话给丈夫莫介然学说了一回。她丈夫是同班同学，两人一起进设计院，又一同被放逐到盐场，这对患难夫妻一直在一起搞建筑设计。他听了这个“笑话”想了想，很认真地说：“恐怕真有这可能呢。”

冯容说：“怎么会呢？我连个组长都没当过，又不是党员，也没有一点政治背景半个后台……”

莫介然就给她分析可能性了。“现在不是提倡干部‘四化’吗？你搞建筑设计在塘沽有名气，头一批就评上了工程师；你非党员，又是女的，也算一条优势；还有你独特的家庭背景，冯国璋的孙女，如今又成了国家优秀人才，不是很有号召力影响力吗？”

果然让丈夫说准了。组织部的人找冯容谈话了。她着急得不行，再三推却，说她只会画图纸，去当干部只会坏事儿，决不能接受。

接连好几天，干部们都来做思想工作。区委书记最后说：“这是组织决定，你先得服从。选上了，你就干一阵试试，不行再调动工作嘛。”

冯容知道再推也是不成的，只好咬咬牙应下。不几天人代会上一选，她得票数还挺高的。没法了，人民代表信任你，把你选上了，就再不能推托了。

从没当过官的冯容副区长，负责城建规划工作。这也算专业对口了。没想到这位年龄已不年轻的新干部，才上任便差点被撵下利用职权乱批土地，在那些官场混了多年的干部眼里是小菜一碟。可冯容却不懂这“惯例”，对每份上级要批土地的报告都认真审阅，剔出了许多不合规定的报告，这一下子就得罪了不少干部。那些人很懊恼，“早知道是这么个不通人情的女人，不该选她当副区长。”

这种话传到冯容耳边。她不以为然地一笑，“不让当才高兴呢。让当，我就不能当贪官。”

不怕丢官，无后顾之忧的冯容，不久又遇上一件差点要丢官的事。

丙烯是一种易燃易爆有剧毒的化学物质。那些发达国家在本国都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就只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燕山石化厂生产了一批丙烯，想从天津港出口运到日本。港口按规定不让装，他们就给了大沽一笔钱，在海口大桥上游不远处的居民区上风方向建了码头，欲由此装运丙烯出口。这是严重违章的，因为装丙烯的车进了塘沽还要从闹市区通过，稍有疏忽，这丙烯就极易爆炸，一爆炸这破坏力就相当于一颗小原子弹，整个塘沽就会彻底炸毁。燕山石化厂在没通知当地政府的的情况下已装运了一回，那车队前后由警车押送，整个公安分局都出动，作安全保护工作。此事公安、环保、城建等部门都有很大意见，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

这事让冯容知道了，就拼命顶住，不让装丙烯的车队进塘沽。这事激怒了天津市计委的一位副主任，说：“谁顶住，就让谁下台！”

燕山石化厂的经理找上门来，对冯容说：“你们还是放开手吧。给你透个实话吧，这事是中央定的，你再顶也没用，这丙烯运出去，能换回多少外

汇你知道吗？你们塘沽不是缺钱吗？要多少你说嘛。”

冯容坚决地摇摇头，“我们塘沽是缺钱，可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玩赌博。中央谁定的，他也得问问塘沽百姓乐意不乐意。只要我当着人民选出的副区长，我就得替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

由于冯容硬顶着，装运丙烯的车队就进不了塘沽。后来由于压力大，连当时的市委书记胡启立也没法子，只能同意装运。但冯容仍坚持不让。枯水期到了，海河封闸，那码头已进不来大船，丙烯就算让运也不行了。冯容的目的达到了。

这件事震动了天津，一些干部传说着此事，说塘沽某女副区长如何如何硬气。有人说，知道她是谁吗？是冯国璋的孙女。当年她祖父领着千军万马东征西战，靠实力当上大总统，这孙女当然也会遗传有那股子强悍不羁的血性气质的。

这样的事又遇上许多回。天津碱厂要在开发区建粉煤灰场，可那儿已定了是外贸加工区，要建合营面包厂等项目。于是就开会，一连三天会议，大家各不相让抢话筒陈述理由。冯容和城建口的同志顶着，哪怕区负责领导劝说也不松口，最后弄僵了，有人便说：“你冯容才当了几天干部就狂成这样？下届塘沽区政府决不会有你的位置。”

冯容坦然道：“我本不想当官，也确实不善于当官，可就建粉煤灰场这事我知道哪是对哪是错。粉煤灰场是不能跟面包厂建在一块的，面包里不需要胡椒面，这是连三岁孩子都懂的道理，你们这些会当官的怎么就想不通这个道理呢？今天我在管城建规划的副区长位置上，我得管事。明天你们撤了我，我就不管了，还回我的设计室去画图纸……”

结果，冯容的官没丢，反而又提升了。

还有一件“舌战群儒”的事。

1984年，天津定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市政府组建了专家班子做开发区前期工作。冯容当选址组组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最后形成了两种不同方案。30多人的专家班子中，绝大多数赞同一个易开工见效快的选址方案，唯有冯容提出的方案与之相左，而同意她的仅有半个人，就是说该人心里赞同，开会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30比1.5，冯容仍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方案，在会上她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众人看说服不了她，就说：明天你这位当组长的去汇报，可不要把大多数人的意见给隐藏不报。

她说：“放心，我会很客观地把两种方案向市领导一同汇报的，并说明哪是多数人意见。”

第二天她到市政府，向市委书记陈伟达、市长李瑞环、副市长李岚清等领导汇报了两种选址方案。冯容的方案花钱多起步速度稍慢些，但有长远的发展余地，这是她从多年实践和专业视角得出的经验，是具有战略目光的。

听完汇报，市长李瑞环当即拍板，“选址要从长远和全面考虑，第一方案虽然省钱省时，可是限制了长远发展；塘沽方案是有战略眼光的，留有发展余地，就用这个方案。”

李瑞环以前从没见过这个从塘沽来的女工程师，会后陈伟达、李瑞环就问了她的情况，得知冯容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就决定把她调到天津市规划局当副局长。

李瑞环在天津当市长那几年，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是他着力解决了人民衣食住行的几桩大事。他在改善天津市交通和城市建设上抓重点定方案办实事

时，冯容成了他麾下的得力助手。

冯容一进市规划局，就主持设计了几项重大市政建设工程。天津市“三环十四射”道路工程指挥部，她担任总体设计规划和施工的副总指挥，东站铁路枢纽工程她又是指挥部的主要成员；还有郊县区的城镇总体规划设计，一些大楼桥梁工程设计施工……她既搞总体规划又抓具体实施，直到工程全部结束验收合格才能松了一口气。为东站铁路枢纽工程她几乎整天督在工地，吃饭睡觉都在那儿。等工程结束开庆功会时，谁都有奖状奖金，偏偏把她给忘了。事后她听别人为她抱不平，反而笑着劝别人，“我这些年完成一项工程戴一次大红花，够多了，少一次两次的倒还印象深记得住呢。”

确实，这些年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工程，荣誉只能映衬出她付出的心血的极小部分。有时她自己也纳闷，我这样拼命地干，图个啥？想来想去，她自我肯定了几条，我在什么岗位上就得干好什么工作，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学之不易的专业知识；还有，那就是我是冯家的后代，得为冯氏家族争口气，为从前在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和维护共和国国体作出贡献的祖父，还有曾立志实业救国而不得展其志最终惨死的父亲，争一口气冯容永远怀念着她敬重和爱戴的父亲。不是父亲的慈爱和严格的教育，她也许就不可能一心读书上大学，也不可能有此后的学识成果。

父亲在1966年夏天惨死的消息，使得冯容连续多年不能静心。1972年，她终于忍不住满腹悲愤，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为其父主持公道，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写此信时她考虑得很细，叮嘱丈夫和她的弟妹们，千万别说知悉她写过此信。她防备万一自己被当作“反攻倒算”者抓起来，就矢口否认与任何人有牵连。

后来周总理读到了她的信，认真处理了此事，让当时的市委书记吴德安排了为冯家迈平反的追悼会。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邀齐了冯容以下共九个儿女后代。那是1975年。

冯容如今已年及六旬，但她清瘦的脸上仍然闪动着生命的光彩和活力。她依然是个忙人，几年来，除了事必躬亲的大工程规划设计和施工，她还连着在全国和天津的专业杂志上发表《略论塘沽区的城市发展方向》、《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天津中环线沿线建筑的色彩》等论文，设计的一些项目获市规划设计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曾被评为市城建十大功臣之一。除了行政职务，她还是天津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任委员、海外联谊会理事；在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代会上，她又作为一名光荣的人大代表步入了人民大会堂，参与了国家重大政事的决策。

冯容，冯氏家族中的这位女强人正在她选定的人生道路上坚定地迈步前进。

冯友，这位自小立志要在医学事业上作出成就的女教授、研究员，到年过四旬才圆了她渴望已久的出海之梦。

那蔚蓝色的梦幻，或许源自京城那所教会中学音乐厅内那架油黑锃亮的钢琴？或许因为某位外籍女教师一双蓝眼睛中如水的柔情？

冯友对那段中学生涯是那么地留恋难忘，几十年过去了，脑宇中仍时常涌动起一些美妙的旧时情境：一群白衣素裙的少女排列得整整齐齐，在圆拱型屋顶的音乐厅里，在钢琴那悠扬动情的旋律中，用纯净脆亮的嗓音唱起一支支圣洁的歌，慰藉人世间无数痛苦的灵魂……美籍教师点名要她站起来背

诵一首赞美诗。当她用流利无误的英语充满感情地背诵后，见那位一向刻板着脸的老处女蓝色眸子上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花。

“Miss 冯，非常好，非常感人。你应该信奉上帝，献身圣洁的宗教事业……”

但冯友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对不起，我更愿意当一名医学家，用高超的医术解除百姓的病痛……”

从贝满女中毕业，冯友考入北京医学院。195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却被分配去了山西。政治歧视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而到1957年便迅速达到了高潮。冯友的丈夫，一位性格耿直、纯朴、善良的牙科医生，仅仅因为敢讲真话，得罪了上司，便被打成了右派，压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而后这对夫妻便一直生存在不公正的歧视和压抑之中。

冯友却是个十分达观的人。即使那一次次政治运动席卷而来，也仍然不改。思想改造、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丧失了志向和信心，冯友仍坚信这样一条真理：社会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一个国家不要知识不要人才，只能走向倒退。她坚信有朝一日知识分子会重新被“发现”，会有云开雾散，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就在“文革”造反最凶猛，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的时期，冯友周围的同事们，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下放到五七干校，或被驱逐到农村劳动改造，对前途感到茫然时，冯友依然保持乐观，总是跟他们谈自己的见解，劝他们往远处看，前景会光明起来的，并对自己的子女一再教育，要好好读书，不要随波逐流，追逐那种过眼烟云一般的“革命浪潮”。

在“文革”最艰苦的那些日子里，冯友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专业，一直坚持她的实验课题，有时间也温习一下英语。她的同事们都很惊讶，这年头了，你何苦还这么痴迷在学术研究上？就连她丈夫都劝她打退堂鼓，苦笑道：“你我这样的身份背景，再大本领也甭想出人头地了，你还学啥英语？真还想出国深造不成？”

冯友正色道：“你以为不可能？那咱们等着瞧，看咱俩谁对谁错。”

终于盼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高考恢复了，教育走上了正规之路。冯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同时一个已在胸中萦绕了20多年的夙愿又强烈地复现出来。她想到国外去研修，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她主意已定，马上着手重点复习英语。她以前读过教会中学，打下了很好的阅读和会话基础，以后也一直没放弃温习，所以她的英语水平很高。1981年山西省要派20名中年教师去美国的大学作访问学者。冯友参加了有100多人会考的出国考试。结果她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获得了赴美研修两年的资格。

80年代初，尽管已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正在进行着拨乱反正的艰巨工作，可一些人头脑中“左”的思想还相当顽固，认为像冯友这样有着复杂家庭背景的人，不该放她出国留学，谁能保证她不会“黄鹤一去不复返”呢？

冯友对那些流言蜚语不屑一顾，“让事实来作最后的回答吧！”

费了一番周折，冯友终于登上了飞往国外的波音飞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航行时，她透过舷窗朝下看，望见一片晶莹的海水，不由得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20多年前本该实现的梦，却一直拖到年近半百时才起步，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悄然而逝，现在出国研修虽说年

龄偏大了些，但她雄心依旧，信念倍增，要把失去的宝贵光阴追回来，补回来！她发誓要作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回国来，为自己曾遭受的歧视猜疑和所有不公平的对待，争得一口气！

赴美国访问研修的学者，一到那儿就须经英语考试。冯友一考就顺利过关了，随即就到实验室去工作。而一些英语基础差的人还得花很长时间在美国过外语关。

美国的医学界，大多是男人，冯友所从事的公共卫生专业也不例外。所以当那位美国教授见着来到他实验室的中国学者竟是位女士，不禁大为吃惊，问她选择什么课题，回答的又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关于大气中多环芳烃监测的研究》这个尖端课题。

教授颇感疑惑，将面前这中国女士细细打量了一番，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面容清秀，举止端庄得体，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看似一位活跃于上层社会的名门闺秀。怎么这样一位“东方淑女”型的中国女士却要研究多环芳烃这样一种可恶气体，这二者之间太缺乏联系的纽结了！

一个生活在美国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中的科学家，确实无法理喻中国女知识分子冯友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的人生之路。她知道这是很难向美国人表述清楚其中因缘的，只是告诉教授，她来自中国的煤都山西省，作为山西医学院从事这一专业的学者，就有责任和义务研究煤燃烧不完全所产生的多环芳烃这种致癌气体，做好监测预防工作。这是她的工作专业所需，也是她的祖国和人民的迫切需要。

美国教授耸耸肩，表示仍很难理解。但没过多久，他就信服了。他发现这个年过四旬的中国女性有着丝毫不亚于任何男性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毅力。她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还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别人每周工作五天，剩下两天假日都去玩去度假，唯独她还留在实验室工作，或是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研究，冯友以其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科学悟性，终于在大气中多环芳烃研究这一课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她提出了具有独创见解的看法，并写成了两篇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论文，先后发表在美国两家著名的专业杂志《环境科学与技术》、《色谱》上。她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和学术团体的重视，因而她被邀请参加了在美国洛利市召开的一个国际性的环境监测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60位人士中仅有三名妇女，其中一名就是冯友。

洛利市那个庄严肃穆的科学会议大厅内，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专家学者。他们对探讨和解决人类面临环境污染危机担负着重大责任。每个走上讲台的人都深信：为了地球的清洁和人类的健康，我献上了一副特效药。

轮到冯友发言了。主席台一侧的电子屏幕上映现出“CHINAFENGYOU”时，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尽管在此之前别人问她，头一回在这种重大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紧张不，她坦然地表示不紧张；然而，此刻，当她走向那个主席台中间的讲坛时，胸中仍禁不住涌起阵阵热浪。这是荣誉。我是中国学者，是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冯友在讲坛上立定，镇静地用纯熟的英语宣读论文，然后又对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精确有力的阐释。当她结束发言，说“Thankyou”后，下面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又有许多人走过来，伸出手跟她握手，表示敬佩和祝贺。

在这庄严和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位感情丰富的中国女学者确实感到能为祖国争光的那种振奋，那种激情，同时也为自己多年来的刻苦学习有了丰硕收获而欣慰。

冯友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有两年研修期限。她深知时间对她来说，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十分珍贵的，她尽量利用每一个工作时的空隙，了解美国，交结新友，扩展视野。

她经常参加美国一些社会团体的学术研讨会和公益社交活动，如妇女界、教育界等一些团体组织的活动。她在那些聚会中结识了不少朋友，探讨学术和社会诸方面共同关切的问题。冯友还很乐意应邀向他们介绍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已取得的建设成就。

冯友有着很好的艺术修养，能弹一手好钢琴。当她在一些聚会场合即兴弹奏出《圣母颂》、《欢乐颂》，以及其他一些古典世界名曲时，竟让与会者大为惊讶：怎么，这位搞自然科学的女学者居然有那么高的音乐素养！而且这还是一个从中国来的中年女性，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在美期间，许多美籍华人和华侨听说中国政府把冯国璋的孙女也派出国作研修学者，起先都不那么相信，直到亲眼见着她，一起细细地交谈，听她谈起祖国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他们才相信，如今祖国大陆的政策确实是开放、昌明了。

两年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严峻的选择：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研究、深造？

一些教授及在美国的亲友都劝她留下。但冯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犹豫。美国固然有比中国优越得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她的心却像明镜一样澄澈，“我的事业在祖国，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得回国去。”

她婉言谢绝了专家们的聘请及亲友的挽留，按时搭乘中国民航的班机，回到了祖国。

冯友回国后，正值国内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老一代的干部陆续都退下来了，需要一批年富力强的新生力量充实领导岗位。她旅途的倦尘尚未洗尽，省委组织部门的领导就上门来，找她谈话，希望她能出任医学院的领导工作。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该如何选择呢？趁着有限的工作时间，继续从事教研工作，可多在专业上出成果，也能给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工作留下一份有份量的答卷。但新的岗位可为更多的人创造、提供更好的工作和学习条件。从国家的大局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看，也许她选择后一条路更有必要和价值……

最后，她决定了，服从组织的安排。她担任了山西医学院副院长一职，具体负责外事和科研工作。

冯友上任后，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创办了外语培训中心。她从自身经历体会到，学院要把教学科研质量抓上去，首先要提高教师素质，多接受外国先进的东西，使他们的眼界开阔，知识不断更新。要走向国门，第一个关卡就是外语。因此，她充分发挥高薪聘来的外籍教师的作用，组织了十多个内容、水平、形式、时间不同的班，鼓励大家听课。有数百名教师、医师等积极听课，课堂常常爆满，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挤在听课的人群中。

冯友的外语培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年省高教系统准备选派五十人出

国进修，有 100 人参加外语考试，结果前 30 名中，山西医学院的考生就占了一半！

冯友又主持建立了仪器中心，对大型仪器实行集中管理，并对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经考试合格的颁发证书。而后她又组建了计算机中心、语音实验室及两个研究所。她还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影响、关系，“请进来，派出去”，有效地开展国际医学交流活动。

她的出色工作赢得上下一致的好评。1985 年，这位昔日民国冯代总统的孙女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又选为民革中央常委。因工作需要，1988 年她调回北京，任中华医学学会副秘书长及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主持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而今，年近六旬的冯友依然那么精力充沛，笑意盎然。她为人正直，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为活跃国际医学交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学术交流，举办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她亲自主持盛大的有数百名各国医学专家参加的联谊晚会。在晚会上她和丈夫一起，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各国名曲，从日本的《北国之春》到德国的《欢乐颂》，法国的《卡尔门序曲》，到苏格兰的《友谊地久天长》

……用音乐这个国际语言沟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们的内心情感，架起一座友谊之桥。

为了开拓外事工作领域，冯友几次出国商谈合作项目。1993 年又联系确定了两个中美学术会议，在中国北京举办。

乐观健谈的冯友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日臻成熟，现在的她正处在人生事业中最有活力，最能发挥作用的时期，她还得扎扎实实地为中华医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做更多的工作。

冯幸耘，这位在西北戈壁荒丘上苦苦追求了 26 个春秋的性格坚强的女性，在冯氏家族冯海岗一支中，排行为长女，也就是冯巩的大姐。

1969 年，就在她最艰难的岁月中，她的 11 岁的小弟亲手为她设计制作了一只“多功能”木箱柜，这木箱柜至今她还保存着，几十年来，随着她家的一次次搬迁，这只凝聚着深厚姐弟情谊的木箱柜一直保留着，在她家里占有重要位置。

冯幸耘比小弟冯巩大十岁。初晓世事时，家庭便遭重大打击，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刑。那罪名又是最可怕的“反革命”。因而冯幸耘幼年时便似乎有一大片乌云压在头顶，总觉得低人三分，抬不起头。

但她偏又是好胜心很强的女孩，读书特别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唱歌、体育、班级活动，都是公认的优胜者。学校生活总不会太忧郁沉闷，欢笑和歌声伴随着她走过了小学、初中的历程，然而到了上高中的坎儿，她被“绊”倒了。

还是因为家庭问题。你是大军阀冯国璋的后代，你父亲是判过刑的反革命，你还想读那么高年级的书？没门！60 年代初，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开始绷紧了。

不甘失败的冯幸耘咬着牙又去读业余高中。她一心要考大学，像冯家的前辈们一样，学一门心爱的专业，做个有作为有出息的新中国的新女性……但她的梦想还是被严酷的现实揉碎了。

1966 年初，19 岁的冯幸耘主动报名，要求到祖国的西北边疆去当一名农垦战士。这是在郁闷和彷徨中无法自解的一次冒险突围。这次报名便奏响了

她整整 26 年的西北人生之旅的前奏曲。

孩子是母亲身上落下的一块肉，一拖一牵都揪心呵！女儿要去的大西北，是那么遥远，那么偏僻荒寂，听说那原是土匪强盗充军劳改的地方，一个大城市的姑娘家受得了吗？身为母亲的刘益素时时地牵挂着大女儿。尽管这年“文革”闹得很厉害，她家被抄，家人被打骂、批斗、游街，银行存款冻结了，工资扣发。刘益素还时时地想着远在边疆的女儿，总想去看她一眼，探个究竟。那地方到底咋样？幸耘来封信得半个多月，信中只说还行，大伙儿一块挺带劲的，生活伙食是好是坏却从不说一个字儿。

好坏终于还是知道了，隔了一年即 1967 年，女儿的战友写来了一封急信：冯幸耘得重病住院了。她是因为伙食吃得太差，干得太累，有了病痛又硬撑着，才病倒的。请家中父母来接她回家疗养，不然怕有生命危险……

接到此信，刘益素急坏了，限丈夫商量马上去西北接女儿回家。冯海岗苦涩地说：“钱呢？眼下咱手上只有几块钱，盐水熬白菜都难撑到下个月了……”

刘益素想了想，对，自己还有块大英纳格表，卖了它不就有钱了吗？她决然拿表出门去寄售商店卖了六折价，得了 200 多块钱，揣了这点钱，登上了去西北的火车。

去西北的路途真远呵！火车咣当咣当走了好几天，窗外看见的多是荒滩野岭，少有人烟。刘益素悬着心：幸耘在这种地方能活吗？

火车到了酒泉。刘益素下车，要换乘汽车去女儿所在的“十八站”。不料去那儿的客车一律停开，是啥原因车站工作人员也不说。刘益素急坏了，心想困在这地方动不了，吃住花销，钱就这点，还指望它带着女儿回天津的！

怎么办？她便去车站想法子拦车，可怎么拦，那些车也不肯停。恰好遇上个天津籍的扳道工，挺热心的，见她一个 40 多岁的妇人，为探病中的女儿，几千里外赶来，半夜里拦一辆车都拦不下，便说了实话：“大妈，你来得不巧，正赶上基地要试爆原子弹，谁都不让进去的。这有纪律。”

“那怎么办？”刘益素急了，嗓音颤着。

“别急，我看你准是个好人，不能为放个原子弹把母女两隔着不见吧。我给你拦一辆车！”

好心的扳道工到公路上去拦车。一拦就拦下了一辆。是建设兵团的车，就给捎上了。

第二天，千辛万苦的刘益素总算见着了女儿幸耘。一看才一年没见的女儿又黑又瘦，脸色苍白，想笑一笑都挂不住脸了，做母亲的心里酸痛，眼泪就下来了。

城市姑娘冯幸耘这一年多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大戈壁滩上，千里荒凉无人烟，唯有建设兵团驻扎的痕迹。那儿一年四季要刮 300 多天大风，住的是地窝子，大半埋在沙坑里，只有顶上一小截支出地面，朝天镶一块玻璃是地窝子唯一的“天窗”。他们种玉米、向日葵、养麦，往往是辛苦半年，一阵风沙或几天奇寒就前功尽弃。那本不是种庄稼的地，偏想挖出一堆黄金来。收不到粮食，吃的够苦了，玉米面是发了酵还不知咋弄的，吃起来苦涩味很重。刘益素在家什么都能吃，可这儿的粗劣伙食实在让她难以下咽。看着女儿幸耘端着饭盒吃那烂不烂糊不糊的东西却是那么香，那么急。她清楚，这是饿的呀！

刘益素领着女儿回了天津。按理冯幸耘病成这样可以办返城手续，不料

上面发了文件不让办理。结果，犟脾气的冯幸耘又回到了她的建设兵团，住进土窝子，吃上烂糊玉米面，扛起大铁镢头，硬是在那个连牛羊都不肯去的地方生存着。

重回大西北的幸耘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是艰难的，当你什么指望依靠都没有了，就只能靠自己，这是条唯一的路。她给自己鼓劲：咱家庭出身不好，可我是我，我非干出点名堂来！

冯幸耘除了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别人都睡了，她还在看书，写文章。她的通讯和快板诗陆续在团、师部的小报上发表了。“冯幸耘”三个字渐渐跟“女秀才”挂起了钩。然后她就被借调去营部，又调去团部、师部搞宣传。

她用比别人更多地付出劳动的代价，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承认。冯幸耘成了兵团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她又组织和主办了许多项群众性的活动，成了一个有组织才干和很有口才的女干事。如果那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背景，换个红五类子女的话，冯幸耘一定是一个重点培养提拔的女干部。

但那不行。冯幸耘再有才干也只能帮着敲敲边鼓，干点杂事儿。这是很痛苦的。但此时的冯家长女已不会想不通了。她心里清楚，在这种时代她只能这样，这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她和一个爱慕她的大学毕业生结了婚，调到了丈夫家所在的陕西咸阳，在一家小企业里当会计。渐渐地，岁月便揉皱了她年轻光润的脸庞，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似乎就这么着了。

时光滑过了70年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又开始萌生春意。年过30的冯幸耘耐不住那平静如一池秋水的生活，家族赋予她的好胜争先的秉性在她的血脉中涌动。她重新捡起了扔开十几年的课本，走进了久违的教室，读夜大、电大。一面顾着家庭和日常工作，一面读书应考。她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成了一名迟暮的大学毕业生。

而后她又走上了社会。咸阳市筹组政协和民革，把她吸收进去。于是冯幸耘，这位冯国璋的曾孙女得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冯幸耘凭着自己的过人才干和工作热情，在咸阳市政协干得很出色，是当地女干部中各方面素质都较强的一个。她成了陕西省政协委员、民革咸阳市副主委，成了一个敢作敢为敢说真话的民主人士，很受当地政界的器重，也很受群众拥护。1992年，在西北生活了26年的冯幸耘终于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父母身边。老人们年岁已高，父亲又有痼疾，需人日夜服侍，冯幸耘就重新走进了天津民主道58号这幢楼。现在她在天津市河北区政协任副秘书长，是市政协委员，她对工作还是那么富有热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冯信比姐姐幸耘晚出生一年，又比她晚下乡两年。1966年，冯幸耘去了大西北；1968年，20岁的冯信领着17岁的妹妹冯书传去了内蒙古东北部的科尔沁草原，插队落户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胡斯教公社新民大队第三生产队。

这年冯家一家七口拆散得七零八落，西北的大姐，东北兄妹俩，冯父被押送回原籍河间，留在天津的只有冯母和两个年幼弟弟，读小学的冯达、冯巩。

出门这天的情景，冯信总也忘不掉。不知那些人揣着啥心思，偏在他和妹妹要下乡这天，把父亲也押解回原籍去劳动改造。

这是七月一个闷热的早晨，全家人都一声不吭早早起来了。几个人一起

整理出门的行装。家中的许多东西都在抄家时砸坏、没收了。棉被、脸盆、漱口杯这些必备用具都得准备三份。冯信望着母亲忙碌着，把家中稍软厚的被子给出门谋生的丈夫和儿女，从清贫如洗的家中尽可能找点有用物品往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里塞，就说：“不用了，妈，这些家里要用的。我们去那儿要用，可以再买的。”

做母亲的摇摇头，“在外面那种穷地方，你们哪有钱，上哪儿买去？”刘益素去过大西北女儿的住处，已对下乡有了深刻的概念：孩子下乡，就等于去受苦受难！

上午，冯海岗所在单位来人来车，把他的铺盖卷儿往车上一扔，押回原籍去了。

下午，冯信和妹妹冯书传背着铺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家，由表兄赵炳俭陪送着，去了火车站。

站台上挤满了下乡知青和送行的家人亲友。宣传车开足了喇叭哇哇地大放革命歌曲，间或夹杂着刺耳的锣鼓声。等到车要开了，那些十七八岁二十岁的男女知青们都忍不住号陶大哭了，一个个把脑袋探出窗口，泪眼朦胧，涕泗滂沱，叫着喊着哭着，把一个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弄得湿不拉叽的。

冯信却和别人不同。他很平静地跟表兄告别后，便稳稳地坐在座位上。他的旁边是文静的妹妹，头顶的行李架上有他俩少得可怜的全套行装。车已经开动了，路住哪儿铺展延伸，他不知道。可他心里清楚，从此将面临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在他看来，这新生活也许并不比原先那日子更差。

冯信愿意离家外出。这个念头早在多年前就有了。在姐姐幸耘被剥夺读高中的权利后，看她那痛苦失神的模样和束手无策只能暗暗叹息的父母，冯信便明白，姐姐的命运就是他的结局，不论你读书成绩再好，革命表现再优秀，家庭出身那一条又黑又粗的尾巴就把你紧紧地裹挟在一个由人们早已挖好的烂泥坑里。你永不能逃脱！

少年人的思维是直线形的。因这可恶的家庭出身，有那么个让人指骂的曾祖父，他就成了“天生贱民”，被剥夺了应有的志向和欢乐。他老觉得胸口憋得慌，便天天去打排球，把一腔难诉的怨愤宣泄在乳白色的橡皮球上。他是块搞体育的好材料，体育教师很看重他，说等他上高中了准是校队的主力，很有可能选上市排球队。冯信听了这话，心里只是苦笑：我这样的人哪有资格上高中？又有谁敢选我去市排球队？

冯信在家被抄，父母、亲人遭批斗，挂牌游街的那些日子里，不敢回家，也不敢在学校里露面，借宿在要好的同学家，像一只失群的小兽，伏匿着，舔舐着受伤很深的创口。

此后两年，本来言词就不多的冯信话更少了。他憎恨嘈嘈嚷嚷，也暗暗地咒骂这个他不愿归属却偏偏降生于此的冯氏家族。但他的心情又极矛盾，既厌恨这个家，又对父母怀着很深的感情，还有怜意。尤其对母亲，冯信觉得她太苦太累了，每天要去上课关心几十个学生，回家还得顾着丈夫和五个孩子的吃喝住行，默默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冯信也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一个柔弱女性内在的刚毅和韧性，学到了人处在逆境和危难中坦然自若、笑涉险滩的处世之道。

在内蒙古东北部插队的日子很苦，七八个男女知青得和蒙族农民干一样的农活，种玉米养麦，种土豆红薯。干一天活回来，还得开夜工给自己推碾子碾玉米，要不明天就喝不上玉米粥了。都是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吃不惯那

种主食，干不动那累人的活。头顶一轮火辣辣的日头，弓背割那地上高不过尺馀的养麦，累得腰腿如注满铅汁，想挪动一步都很艰难，实在受不了了，就仰面朝天，腰背搁在凸起的地垄上，四肢和头往地沟里压，来矫正畸形的弓背，稍减酸痛。

他们落户的生产队很穷，辛辛苦苦干一天，挣十个工分，才值两三毛钱，干一年还不到 100 块钱，扣除了粮食等开销，分红时到手的钱往往不够买张回天津的车票。六年里冯信只回了三次家。

吃苦，冯信咬咬牙，都挺下来了。难以承受的还是那无论怎样也躲避不开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自插队以来，冯信和妹妹冯书传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冯书传还是队里的经济保管员。可是一旦来了招工招生的指标，却总也轮不上他们兄妹。一年又一年，一拨又一拨，知青们都先后上调，奔甜蜜的前程去了。渐渐只剩下他们兄妹俩，是最“老”的知青了。

终于有一回，村里乡亲觉得该把好姑娘冯书传送去读书，就为她争来了一个上学的指标，让她填表去上学。谁想，填了表高高兴兴送去，等着盼着入学通知书飞来，不料等来的却是个伤心的消息，公社某头头让他亲戚的儿子顶了她的名额去上学了。

冯信看着痛苦流泪的妹妹，心里又恨又悲。他是哥哥，他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妹妹，为她争得一份应有的权利！他蹭地站起来，一路奔跑去了公社，找到那头头，高声责问：“干吗顶了冯书传的上学名额？这指标是分到新民大队的……你凭什么？”

那头头不慌不忙，皮笑肉不笑地按按冯信的肩，“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是公社组织决定的。上大学，那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冯书传这样的出身……不大合适吧？”

“你……”冯信竟被他问住了。

“好吧，以后再有什么合适的招工指标，我们再考虑考虑。回去好好干活吧。”

身高一米八三的冯信，呆呆地在那个破院里站着，任北风吹凉了脸，吹僵了手脚。他的脑子里已一片空白，仿佛置身于无边冷寂的荒漠之中。那天，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村里去的，只记得天色已十分昏暗，寒风卷着沙尘，一阵阵抽打着他的脸，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几声凄厉的狼嚎……

直到 1977 年，即冯信插队的第十个年头，公社那头头才给他找了个“合适”的工作。安排在车站赶毛驴车送货。

从 1977 年到 1979 年，冯信赶着毛驴车走遍了胡斯教公社的每条大路小道，村村寨寨。

在知青返城浪潮中，冯信终于和妹妹一起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父母亲人身边。

他被安排进了五金商店当营业员，他干得很认真、诚实。而后又去蹬三轮送货，跑购售，在年近 40 时才第一次当上了最小的官：商店柜组长。后来他以踏实勤奋和肯吃苦耐劳而成了本公司的楷模，连年评上先进，又入了党，当了商店负责人，又提升到河北区五交化公司，先后任副经理、经理。

当他被评上河北区优秀党员时，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时间，“什么是推动你努力工作的动力？”他直爽地说：“做工作跟做人一样，就得踏踏实实地干。”又问：“你那么卖力地干，比别人多干就多一分辛苦，不觉得自己很吃亏吗？”

冯信摇摇头，“你还年轻，还不懂什么才叫真正的苦。我下乡插队那些年比这苦多了，而最苦的还是那种看不到前途和命运归宿的内心痛苦。现在大家都信任我，支持我，给我权力，给我荣誉，这是那些年想都想不到的。我哪里还会觉得吃亏呢？”

在经济大潮到来之际，已是处级干部的冯信不安于拿铁饭碗坐铁交椅。他被河北区政府选中，出任一家合资企业“天津东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是香港某大财团在天津的一项重大投资项目，旨在天津承接危旧房的改建翻造工程。

冯信当上了总经理，把原先的职务、工龄、医疗保险等等都弃置了，把自己放在了滚滚翻腾的浪潮之中。许多亲友都劝他，“算了吧，冯信，你都四五六的人了，还逞这个能干啥？稳稳当当坐几年公司经理位子，得个平安退休颐养天年多好……万一弄不好，后悔都来不及啊！”

冯信笑笑，“就是这个年数才把我逼上梁山的。我这辈子恐怕也就这一回可以放大胆量试一试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了。这时候再不去干一把，老了才真正要后悔莫及呢！”

冯信说的是心里话。人这一辈子只有几十年可以干事业。以前因为戴着冯家那个沉重的历史高帽，压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大好青春年华都泡在荒原泥沟里了。到40多岁才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景，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冯信当了总经理，扎扎实实地开始了他的创业新路。他经营的公司已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现在又已有了一个极宏大的计划，要在天津这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的金融中心建成一幢大楼，投资数亿，到时天津市最高最漂亮的大楼就是出自于一个曾经在东北荒原挖过地赶过毛驴的知青之手。

冯信对未来很自信。

关于冯家后人的故事还可以说许多，有的单是一个人就足足可以写一本厚书。这里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

近十几年来，冯家无论是年逾古稀的前辈，还是青春年少的后代，都向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祖国交出了一张张出色的成绩单。

老一辈的如冯海，改革开放后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他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医药工业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年过花甲仍积极工作，在研制心脏起搏器电池材料方面取得突出成果，1980年获得国防科工委技术进步三等奖。并和人合作编写《普通油漆工艺学》，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他热爱事业，学识渊博，在研究所工作到70多岁才退休。然而他退而不休，因他精通德、英、法数国语言，尤其是德文、在天津算得上是一位权威。常常有本系统的年轻同事或素不相识的人来拜访他，向他请教学术和外语。老人的晚年生活很充实，很愉快。

冯海的长子冯勇，1967年大学毕业，现在天津市造纸研究所工作，系高级工程师。

冯海，是冯巩的四叔，曾在河北工学院任教，后调天津大学化工系任讲师、教授，几十年来在哺育青年学者和学术研究上卓有成就。他曾编著《有机立体化学》一书，又被聘为高教部工科院校有机化学组教学指导委员。

他的几个儿女都学有专长，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小女儿冯众书1987年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冯巩的六叔冯海，1954年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后，分配在河北水利厅设计院工作，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为繁荣河北省的水利事业出了大力气，

现任该院高级工程师。

冯家迈的三女儿冯宾，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在航空企业部门一干就是数十个寒暑。在当时的逆境之中（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丈夫又是伪满洲国尚书府大臣吉兴的长孙），她毅然顶住了各种压力，30多年来一心埋头专业，钻研活塞工艺。改革开放以后，她在年近半百之际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著有《我国活寒冷加工工艺探讨》、《国外活塞生产浅析》等论文。她历任河北省政协五、六届委员，石家庄市民革副主任委员等社会职务。

冯家迈最小的女儿冯玖，“文革”开始时年仅14岁。父母惨死，家破人亡，给她稚嫩的心灵以重创。她失学了，无所寄托，濒临绝境。幸亏有人怜悯她，帮助她进了一家化工厂做工。后来她又去当招待所服务员。她不甘沉沦，在逆境中顽强自学中医学，先后在北京中医研究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医班进修基础中医和临床医学。她终于学成了，1979年调到了北京宣武中医院，成了一名中医内科医生。

冯玖在医学上不断攻关、上进，1983年又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继续深造，1987年毕业后任中医医师。现在宣武中医院老中医经验研究所从事著名老中医的医学研究工作。为宣武区政协委员。

冯家逊之子陈海辰，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又进北京协和医学院，1943年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入了党，解放后和父母一起将大批资产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先后任北京第四医院和第一医院院长，宣武区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曾被选为两届宣武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副主席。

陈海辰是我国著名的小儿科专家和卫生组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曾多次获得北京市及国家卫生部的嘉奖。

他的儿女也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儿子陈泉，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401研究所工作，又攻读硕士学位。之后考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该校核物理学博士。女儿陈禹，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工作，接着又攻读内分泌专业，获硕士学位。后去美国深造，已成为一名神经内分泌研究领域的专家。

冯海音的儿子赵炳俭，是冯巩一向敬重的大表哥。他大学毕业后，也因家庭出身不好，几乎连教师都不能当了。近些年来，他在教学上取得突出成绩，被提为天津市大港区教育局副局长兼第二中学校长，又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冯家后人很多，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可嘉可庆的成就，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崛起尽心尽力，表达了他们一片赤诚之心。

时代造就一代新人。冯家更年轻的一代也在茁壮成长。毋庸置疑，他们会获得比前人更多的施展才华的机遇，也必然会有更辉煌的前程。

第十一章 不穷分的灵魂

让《业馀警察》引诱上了影视的“贼船”
演小品上了瘾，《融》让女歌星们感动得落泪
说相声还是最棒的，三年捧得三个第一名

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是一句古话，是中国人历来遵循不悖的敬业信条。

学海无涯，未有尽路。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将治学之难之趣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此喻学海茫茫，无边无际，学到何时是尽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此时学已入门，却苦辛异常，劳其筋骨，磨其意志，要的是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精神。“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即最高境界。至此，倾毕生之力的登山者终得以攀上苦苦期盼的高峰。俯瞰身后，但见巍巍群山变得那般低矮渺小，尽在脚下，四方眺望，只觉云海起伏如波，日月丽天，伸手可及，顿觉胸臆间无限开阔，吞天地山川，拥星辰宇宙。到这般境界，犹如佛门高僧进入了物我相忘的妙境了。

冯巩，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借助几次可遇不可求的好机遇，终于跃上了相声的“龙门”，成了全国有名的相声演员，一个人见人爱的笑星。

专家评断他是继侯宝林、马季、姜昆这几代人之后的第四代新生力量的佼佼者，且有“鹤立鸡群”之势，有望成为一代艺术大师。

于是，众望所归，作为第四代相声演员的杰出代表，则当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向无止境的相声艺术的巅峰攀援不歇，切忌徘徊他顾，心生他念。

然而冯巩却未按众人期盼的那样做。上了高处，视野开阔了，渐渐地，艺术群峰那多采多姿、蜂飞蝶舞的迷人景致，又使得这位相声之子驻足四望，“心猿意马”了。

1986年的春节晚会后不久，珠影厂、上影厂等几家厂的导演都拿着剧本来找冯巩，让他参加拍摄电影，扮演剧中角色，他婉谢推辞了。

这年11月，在去南方演出的火车上，刚刚接任广播说唱团团长的姜昆把一个名为《业馀警察》的电影剧本递给冯巩，说：

“这本子是冲你来的，潇湘厂的原野导演请你看看怎样。”

冯巩记起数月前，原野曾在一次碰面交谈对说过，有合适的本子一定请他演一回电影。没料想这位导演言出必果，来真格的了。他接过本子浏览了一遍。

这是个轻喜剧，剧情反映某厂职工何大壮，从自己被窃到反窃，当上一名业馀警察，智擒扒手，为社会除害惩恶，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主人公性格憨厚而又不失机敏。本子写得一般，这个角色倒真有点适合他的。

“不错，这角儿有戏。”他笑着对姜昆说。

“那行，你就接下来吧。不过，团里的事也别耽搁。”初上任的姜昆团长自然得打打“官腔”。其实他们内心想的完全一致，艺术无门槛，博采众长是艺术的常青之本，能有机会在他山采玉，只有好处，而无坏处。

不过那时对相声演员进影视也有较大争议，姜昆本人拍过一两回电影，也让人说长道短了一回，可见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常常是很不一致的。

年轻气盛的冯巩自然也懂得姜大哥的言下之意。他爽快地应一声：“放心，什么也误不了。”

《业余警察》在年底开始投拍。作为主角的冯巩拍摄任务相当繁重，全片720个镜头，有他的镜头680个。麻烦还在于，这时他还得准备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还有赴新加坡演出的任务。

事儿多冯巩不怕，咬咬牙，白天黑夜连轴干，紧张一阵就顶过去了。倒是演电影角色，可把他难住了。

他本以为说了那么多年相声，台上台下练得口舌伶俐，表情生动，动作潇洒，拍个电影还不是玩儿似的？不想隔行如隔山，到了拍摄场地，一投影，一开机，他便觉得手脚别扭，面部肌肉酸胀，半天进不了戏。

寒冬里拍盛夏戏，虽是在广东，那温差也是很悬殊的。有场戏，严冯巩这角色与女友在海边游泳，谈情说爱。这段情节设置得有点硬，表演起来就更别扭了。

12月的广东，北风吹来也是寒意十足，池里的水温只有13度。瘦巴巴的冯巩剥得只剩一条短裤衩，还没下水，就开始哆嗦了。导演一声“开始”，冯巩和女演员先后跳进水里，然后按导演的设计得在水中表现出热恋男女的亲密情景，把戏推向高潮。可两人在水里尽顾着颤栗哆嗦了，怎么也“热恋”不起来。

导演着急了，在岸上一个劲地喊：“要热恋，要热，热起来……”

冯巩忍不住了，冲着导演嚷道：“热不起来，这水太凉，咱都冻得情感麻木了！”

好歹总算把这部片子拍下来了。

电影拍得一般，好在观众喜欢看冯巩，这片子拷贝卖得还不坏。

初次涉足影视，让冯巩尝到了甜头，也吃了一回苦头。艺无止境，那山更比这山高。作一个相声演员，你也许算得很优秀，拔尖儿了；可进了影视圈，你仅是个小学生，是个“学龄前儿童”。

从来不服输的冯巩，就跟影视撞上了。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声基本上以第三人称去叙述表演，叫作“半真假表演”，而影视则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去再现事物，引人入胜，是一种很投入的“自我表演”。学了影视表演，可以丰富作为一名相声演员的表演特色，扩展相声艺术的表述形式，何乐而不为？

初生牛犊不怕虎。冯巩经过一次拍电影的尝试，忽然生发奇想：我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视喜剧片！

这新奇念头萌发于山东荣成大渔岛。

那次，他为了给马季老师助兴，参加《笑破情网》电影的拍摄，闲来无事就跟青岛市曲艺团的赵保乐一块儿乱侃。一侃就侃对了劲儿，就在那个木板架起的简陋的村民俱乐部里，两人足足侃了七天七夜，从青年夫妇结婚前后，到盲目的新潮追逐者；从自私自利的行为谈到义务劳动的形式主义；从好高骛远的心理特征扯到服务行业的不正之风……结果侃出了一个庞大的拍摄计划：一部几十集的一系列短喜剧，塑造一个名叫“阿0”的现代“阿Q”形象。

冯巩的创作意图和剧本得到中央电视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但却有一条，拍摄的所有工作、经费、人员得自个儿解决。

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冯巩，心一横、牙一咬，就把自己这百多斤往自筹自拍电视剧的“火坑”里抛下去了。

1988年初的几个月里，他频繁奔波于京穗之间，修改剧本，聘请导演，

物色角色，选择外景，筹集资金拉赞助，准备道具灯光、购买火车票飞机票，等等。事无巨细几乎包全了。有一回，拍摄时发现缺一样道具，二话没说，他蹬着三轮车就去拉，穿街走巷，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望，疑惑不解，这不是大笑星冯巩吗？他怎么汗淋淋脏兮兮的，蹬辆三轮车？该不是犯啥错误处罚下来……由于操劳过度，开机不到一个月，他身上原本不多的肉就唰唰地削下去了一圈，眼睛因时常睡眠不足而充血，眼眶则显出黑晕，被大伙戏称为“瘦猴型熊猫”。

好在他邀请来的剧组人员都是志同道合，情深谊笃的良师挚友。大伙儿全身心地扶助他拍好这个剧。大胡子导演张子扬不光负责导戏，整个剧务的事也帮助操持。李文华老师哑着嗓子，也一天到晚守在拍摄现场，帮着修改本子，比画着手势发表自己的意见，抢着做一些杂事。冯巩拍阿0下水救人的镜头时冷得全身发颤直哆嗦，李老师快步奔去买瓶烧酒往他身上涂抹，使冯巩十分感动……戴志成、郑健等小哥们瞧着冯哥累得全身酸涩手脚麻木，就挽着袖子给他按摩，那模样就像足球场上急救受伤的运动员……

17集的《开心阿0》总算拍完了！

在剧组散摊的那天，冯巩掏出这几个月辛劳所得的500元报酬，请全组人员上北京“小天鹅”酒楼吃涮羊肉。席间，冯巩举杯深情地对众人说：“咱感谢各位的大力协助。其他不说了，全在杯中，还有这涮羊肉中了。今儿咱吃饱了喝足了，下回接着再干！”

1988年5月7日开始，系列短喜剧《开心阿0》在中央电视台周六晚上黄金时间里连续播出。卡通式的变格节奏，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寓言式的深邃内涵，积木式的外景结构，集幽默、趣味和思想性于一体，给人以新颖的感受和深刻的启迪，在广大电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中产生轰动。许多小朋友见他都直呼“阿0阿0”了。东北和内蒙的一支由400多名少年组成的“争做矿山小主人夏令营”，到北京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亲眼看看阿0！”

《开心阿0》成为当时文艺新闻的一个热点，全国30余家报刊杂志作了报道。因成功扮演了阿0这个艺术形象的冯巩，在《电视月刊》举办的评比活动中，以46万张选票一举夺得全国第二届电视十佳演员的金杯。

《开心阿0》的成功尝试，增强了冯巩拓宽影视表演的信念和决心。但有了这一番自编、自导、自演、自制的一体化实际操作，他也意识到，一个人的精力和才能毕竟是有限的。自己得找准强项，把重点放在表演艺术上。所以，当中央电视台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请冯巩再接着拍《开心阿0》，争取出50集时，他歉然地推辞了。

然而，他却推不开影视这条“贼船”的又一次诱惑。

74岁的著名老艺术家谢添有心要把作家邓友梅的中篇小说《那五》搬上屏幕，在自己有限的艺术生涯中，拍摄我国电视剧史上的第一部悲喜连续剧。

谢导全身心地投入此剧的筹备之中，而物色主角那五则是关键中的关键。《那五》写一个没落八旗子弟的可悲命运。主人公的性格和经历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感，能与当今观众沟通，产生共鸣。

因此也决定着这一角色人选的难度了，演员不光要有相当的艺术功底和社会经历，还得具备与该特定时代和人物身份在外型气质上相近的优先条件。谢添在作案头准备时，曾一而再地把全国有名的、不那么有名的男性演员都反复捋了几遍，似乎只有冯巩最合适，无论气质还是形象，都没得说了。

但他在征求有关人士意见时，却遭到反对。“冯巩是相声演员，相声和影视差距太大，他会把戏演砸了，像个闹剧的！”

“您老这是第一次执导电视剧，得慎重，别把自己一世英名砸进去！”

谢添却“执迷不悟”。他看过冯巩的相声和近来拍的电影电视片，深知这个年轻的相声演员有极高的表演天赋和艺术悟性。他知悉了冯巩那个历史渊远的家族之源，了解了冯巩的家世和艰难求艺之路，就更坚定了要清冯巩演那五这个角色的决心。

他亲自登门去找冯巩。

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接上头，没见着人。

老头儿急了，第三次又拄着拐杖来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排演厅，敲门之后，又吃了“闭门羹”。他真有些气恼了，掏笔写了一张纸条。

“冯巩，已经找你三次！我是74岁的人了，登门求贤，这还是第一回。收条后请速与我联系，有要事相商。谢添。”

当时冯巩正奔波在外地演出，谢导来访留下便条之事是妻子艾慧告诉他的。

冯巩一听，也急了，“这还得了，大导演三顾茅庐，还没见着一面，我成啥啦？”

赶紧就去谢寻家，登门致歉，说明原委，请求原谅。

谢导哈哈笑过，说你人来了，就够了。咱们谈正事。

在谢导的勉励下，冯巩打消了顾虑，决定接受那五这个角色。尽管他心里对自己能否演好这个难度极大的角色没有多大把握、可他信赖谢导的才能和艺术功力。“谢导，我可把自己托付给您啦！”

“放心，我不会看错人的。”

谢添是中国才华出众的电影演员，又是杰出的喜剧导演，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创造了许多艺术形象，拍了不少优秀影片，在影视界享有很高威望。他慧眼识珠，把冯巩带进了一个广袤而深邃的艺术境界，使他如鱼得水，自由翱翔。

在冯巩心目中，谢添一直是他尊敬和学习的前辈艺术家。自有了《那五》的合作，就使得这一老一少成了共同探求艺术新境的亲密挚友。冯巩的艺术修养受到了一次高质量的锤炼。

谢添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谈吐中不乏幽默和风趣，像年轻人一样富有朝气和生命活力，但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剧组人员要求严格，对演员几近于“专横”。对扮演那五的冯巩，更是“苛刻”了。

冯巩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对艺术的精雕细刻，尽善尽美。

那五在餐桌旁吃多了，打了个饱嗝又想掩饰。这个镜头，冯巩反复做了不知多少次，还是没法让板着脸的谢导点头通过。

那五因阎五爷买通衙门而被判死刑，遭狱卒推来打去。这场戏，冯巩被人一次又一次摔在地上，肩肘背腰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连扮演狱卒的演员都不忍下手了，但谢导在一旁仍催道，“不行，不够真，再来一次。”

演戏把握分寸是极难的，不入戏不行，戏过了也不成。每场戏中谢导都把眼睛死盯着冯巩，“现在不够，不像那五，像那一，再生活一点，再真实一点，现在到那三了。对，那四，再添点激情。哟！又过了，成那六啦！好，好！那五，这是那五了！”

冯巩的脾性像弹簧，越有压力他越来劲。为演好那五这角色，他一再地请教谢导和其他配戏的演员如倪萍等，反复地琢磨剧本，细细地体验和思索。他还借来《我这一辈子》、《茶馆》、《骆驼祥子》等片的录相，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通过对历史环境氛围的体味来探索把握那五的内心世界和基本特征。他从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极似那五的外形人物，他的五爷冯家周。

有一点谢添真是看得很准，冯氏家族的后人，多少会留下旧时代权贵遗老遗少的痕迹。冯巩对其家族中的许多长辈都极熟，了解他们的习性、爱好，包括一些习惯动作。譬如五爷冯家周那习惯反手弓背，细碎着颠步的走道，冯巩小时候玩耍逗乐时就维妙维肖地学过，学得像极了。这回他就把五爷的步形姿态移给了那五，然后又细细地为这个没落的八旗子弟设置了许多特征，从一招一式，到一个细微的眼神，吃饭的架式，说话的腔调，都想了又想，试了又试，就连平常休息、娱乐时，冯巩也从角色那五的特征行事，让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冯巩的较真劲儿比谢导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谢导已连声叫好了，但他却仍不满意，“谢导，我想再来一遍，试试另一种表演方式，看看是否好些。”像这样总不满足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比试，使他得了个“好再来”的绰号。拍摄了那五挨打那段戏后，众人一起看样片，剧组有的演员看着看着，便联想到他拍摄时，总让人家狠劲打他摔他的憨劲，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了。谢导和冯巩的心血没有白白耗费，忘年之交的新老艺术家为中国观众捧出了一部力作。《那五》在电视台播出之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极大反响，博得一致的好评。对谢添导演的朴实精致的艺术风格，尤其对冯巩的细腻真功的演技，给予了很高评价。在首届全国电影厂电视剧评比中，《那五》荣获一等奖。1990年大众电视金鹰奖评选，“那五”冯巩成为夺魁的热门人物。可惜距金鹰奖仅差一步。冯巩又一次以自己的勤奋和才华，获得了开拓新领域的成功，在喜爱他表演的广大观众面前又竖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行家和观众的称赞声扑面而来，一直关心爱护他的师长和亲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就连当初对他涉足影视有看法的同志也不得不心服口服：这家伙还真能折腾出名堂来！冯巩在影视界的名声大了，就有许多的影视厂家，制作单位和导演找来，要他演这部电影，演那部电视剧，一时间片约如潮。

他的回答却不似当初那么爽快了。因为自己的本专业是相声，演电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采他山之石，以攻自家之玉。他不想重复扮演某一种类型的角色。譬如演过那五，他就不想再演此类落魄八旗子弟的角色。他想：要打破因成功地塑造某一角色而将自身凝固在某一模式上的格局，就得不断地将角色拉开时代或年龄、性格上的距离，作表演上的多方面尝试。这样，才是积极的、有益的。

1990年，他接了长影厂的一部电影《离婚合同》。这是一部轻喜剧，写现代社会一对青年夫妇离婚后，因住房紧张而不得不挤住一套房间，因之闹出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这部电影剧本写得并不是太出色，冯巩看中它，是因为喜欢剧中主人公那种“无奈的真诚”的特定性格，觉得值得尝试一下，看自己能不能把握此类小人物心态的表演分寸。

电影拍完后，很快就投放各地上演，观众对他的表演表现了浓厚兴趣。这部电影的上座率当时在国产片中名列前茅。

因成功扮演了剧中男主角刘流，冯巩在“小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最佳

男主角奖。

时隔两年，冯巩又应著名导演黄建新之约，在《站直了，别趴下》一片中扮演一个正直而又带点迂腐味的中年知识分子。在此片中他不是一号主角，但表演上一丝不苟，极有分寸感，让人物显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看得出来，经过数年的影视实践，他的表演已趋于成熟了。

《站直了，别趴下》在1993年上映后，被视作近几年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经典力作，在“93年上海影展”中，经观众评选，该片所获选票数高踞榜首，把当年十分走红，拿了国际金奖的《秋菊打官司》、《香魂女》撇在了下首。

冯巩近年在电影表演上的出色成绩，终于得到了电影界专家高手的赞赏，他获得1993年电影“学会奖”。紧接着在1993年“百花奖”评选中，他因参与《站直了，别趴下》的演出，又被广大观众评为“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1957年出生的冯巩，生肖属鸡。他这只“鸡”是只不安于现状的“司晨鸡”。在相声这方天地，他一“鸣”惊人，博得四方应和，八面风光，为自己迎来一个清朗朗的新天地。他却不安分地守住这块“领地”，不甘心只在这儿单调重复地刨土啄食，偏又跑到别的地方去，鼓着劲去“争鸣”一番，惹得众人评说纷纷，褒贬不一。

可也就是怪，他每次“不务正业”，偏又每每能干出名堂，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能在别人的“领地”有滋有味地“鸣”出他特有的音韵旋律来。

人们便送他一个“奇人怪才”的雅号。

有人问冯巩，何以如此不安分守己，喜欢“旁敲侧击”，搞“歪门邪道”？

他总是憨态十足地有点吃惊地反问：我不是演员吗？艺术领域都是相通相应的，我演电影演小品，别人不也可以学说相声吗？

其实，冯巩这种不安分源于他个性的本能，源于他自小就生成的好动好胜。也许，因为在冯氏家族中，他上面的一两代人生不逢时，让战乱、不稳定的政局和偏激的政治排斥耽误了太多，太久，他的祖父冯家遇留学德国回来，满怀报国之心，想振兴民族工业，可干了几十年，仅办成一个小小的半死半活的油漆厂；父辈们更惨，尽管都学有专长，却因家庭背景而多遭排斥，学无所用。而今，山不转水转，好容易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冯巩这一辈人逢着这百年未遇的好时光，不加紧干能对得起谁？他不仅仅是在为冯家几代人的缺憾而玩命地干，更多的是为了艺术，非有声有色地干一番事业不行！

也许，这才是真正造就这位艺坛奇才的根本成因，是他永不知足，探求不息的本源和动力。

近年，冯巩又开始对小品感兴趣了。

小品的走红，源于陈佩斯和朱时茂。他俩曾合领了几年风骚。继而就有宋丹丹和黄宏的《超生游击队》粉墨登场，轰动一时；东北又冒出个土老帽式的赵本山；随之出了牛振华、蔡明、郭达、杨蕾、巩汉林、潘长江等一大批受观众喜爱的小品明星。

小品的兴盛成因有诸多说法，且不论，但它对相声的冲击却是有目共睹的。最明显的就是原来由相声独领风骚的春节联欢晚会，近几年的叫好喝采声都给小品夺去了。

冯巩心里也着急，相声怎么办？我怎么办？

相声界有的人只会骂娘，“什么小品，都是相声的变形。把相声的手法偷过去，加上戏剧表演而已。”

冷落多年的戏剧界也有人叫骂，“这也叫小品，夸张，变形，一逗一捧，嘻嘻哈哈逗个乐。这算戏剧的哪门哪类呀？完全是杂耍，是怪胎……”

冯巩却不这么看。而今小品走红，自有它的道理。小品能融相声和戏剧情节为一体，采用表演的方式，诙谐幽默的语言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揭示社会各类人物的特征性格，让观众在开怀大笑时又受到某种有益的启迪，这不是很好的艺术门类吗？

冯巩决定，作为相声演员，对小品的“大举入侵”，要奋起反击。

他要以攻为守，夺取阵地。

1990年10月，拍完《离婚合同》不久，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主任找上门来，请他为准备开办的“经济半小时之夜文艺晚会”出谋划策，要冯巩出个好节目压台。

冯巩思忖着，能不能试个小品呢？与编辑部主任一合计，行！

说干就干是冯巩的一贯作风。他即与人合作写了一个《临别絮语》。这个小品写假冒伪劣产品给夫妻生活造成的不良后果，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商品经济生活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他找了在《离婚合同》中扮演妻子的任梦为搭档。

急急地写，匆匆地排，火火地上演，没想到这个小品还在社会上和他的朋友圈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大家赏识他的新姿态新尝试，认为他将相声表演带进小品中与之结合是一条成功和有价值的探索之路。

初涉新路，冯巩对自己成功的把握不大，听到了朋友们的评价，未免意外惊喜。原来小品有那么大的艺术张力，看来真得闯进去折腾一番了。

这之后，他就找牛群商量。

“牛哥，我的《临别絮语》看了没有？”

“看了，不错。本子和人物性格的把握都挺好，要是表现手法再生活些就更好了。”

“对。别的朋友也这么看。”冯巩点点头，“牛哥，我现在老琢磨，小品热还在升温，大有技压群芳之势。相声受冲击太大了。你看现状就这样，咱们后备力量空虚，好段子难以产生，如果不认真考虑对策，观众真会对咱们失望的。”

听了这话，牛群也皱起了眉头，“这是严峻的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认真对待。可不能让相声在咱们这一代垮下来。”

冯巩趁势就把自己的想法端出来了，“你说咱们介入小品，开辟新路，同时抓住相声不放。这样既有攻又有守，攻守兼备，怎么样？”

牛群兴奋地一拍沙发扶手，“行！就按这个思路走！大型电视转播机会一定要抓住不放，尤其是春节晚会，一定要上新相声好段子。其他一般演出，没有好段子，宁可不上，滥了就砸。小品节目咱上，节目主持人咱干！通过参与、介入，四面出击，博采众长，以求稳住相声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一对相声好搭档，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确定了这两位相声艺坛骁将此后冲锋陷阵的主攻目标。这也是对相声艺术前景的一次深刻反思的思想碰撞。时代在急剧变化，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精采的世界也孕藏着危机，机遇稍纵即逝，把你抛在无奈的荒野！

好胜好斗不甘寂寞的个性，决定了冯巩的艺术流变方向，他又开始在小品领域里不断出击。1991年4月，中央电视台筹办庆“五一”文艺晚会，导演与冯巩、牛群商量出节目的问题。两个搭档一商量，决定牛群参与主持节目，冯巩出一个小品。可后来再合计，同一台节目两人拆散了上台，易让观众误会以为两人都改变了相声专业，所以又商定这次只上冯巩的小品，牛群上别的节目主持人。

冯巩即与人合作，创作了名为《探亲》的小品。它写的是，荒凉的戈壁滩来了探亲的漂亮嫂子，给地质队的哥们带来了欢乐和笑声，通过几个人来探望“嫂子”，风趣地展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展示了地矿勘探者的博大胸怀和奉献精神，小品写得很感人，演出时剧情环环紧扣，人物表现诙谐生动，入情入理。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进展而起伏，时而会心微笑，时而忍俊不禁。

这个小品一反以往小品大笑大闹，讲求火爆的特点，以细腻含蓄，以情感人而取胜。冯巩在小品中扮演那位丈夫在“久别胜新婚”的夜晚，不断被同事拜访而弄得处境尴尬。这个人物的台词不多，冯巩多用动作表演来揭示人物的特定性格和内心活动。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丝尴尬的笑容，半截欲言又止的话头，都表现得恰如其分。当剧情进入尾声时，冯巩弹起吉他，“妻子”深情地唱起了《小草》，悠扬的旋律，淡淡的忧伤，观众为之感动，潸然泪下……这场演出以后，冯巩对小品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他也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介入小品的创作表演，应该有个主攻方向，临时出击，东抓一把，西探一爪，这样不行，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找准目标才能有所建树。

他将当今小品名家们作了排列分析。陈佩斯以他特有的光头丑角的外型为资本，采用大幅度夸张变形手法，表现社会某种人物的特征和心态，造成强烈的喜剧气氛，让人们畅怀大笑，制造出淋漓酣畅的舞台效果。

赵本山则借助他一副地道东北农家汉的脸型和浓重的东北腔，以朴实憨厚和维妙维肖的人物模仿技巧，着力表现农村乡民独特的性格和思维，亲切可人，给观众以幽默而不失纯朴的艺术感染，让人们在捧腹大笑中领悟人生的哲理。

其他如宋丹丹和黄宏，郭达和蔡明，潘长江、牛振华、巩汉林等，又各以一己之特长，撷取社会生活的某一花絮，再现日常生活中某些人物的趣态。有的擅长追踪社会关注焦点，有的拿手情场趣事，有的专攻家庭琐事，也有注重开掘人物内心独白……正因为他们都形成了适合自己戏路的表现，这才深受观众欢迎和承认，成为有独特魅力的小品明星。

在面前耸立着许多个“山头”的情况下，冯巩想，我该另立一个“山头”才对。

他发觉迄今为止小品中还缺乏反映以都市文化为特定背景的揭示文化人性格特征的作品。城市怎么说也是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龙头，是众目瞩目的中心地带。揭示城市生活和现代都市人的真实心态，更能展现这一时代的面貌变化。不过，农村易写，城市难描，是众所周知的，搞不好就弄巧成拙，砸了锅。

冯巩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演城市文化人的小品。

当然，他也有优势。自出生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大都市，从天津到北京，从街巷小院到宾馆大楼，种种人物形象心态，每个时髦热点风行事物，他都

极熟悉，而且他的家庭渊源、自身修养及艺术技能和外形气质，都具备某种优越条件。

1992年3月12日，他刚从日本国访问归来，风尘未洗，就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第41期的演出。

这天晚上他既与倪萍联袂携手作主持人，又表演了他的得意之作：小品《融》。

《融》细腻地表现了一对离异夫妇破镜重圆、感情回归的心理过程。他和中央戏剧学院的王兰合作得天衣无缝，两人只以自然的坐势对话表演整段小品，语言精巧贴切，表演真实又略带夸张，把观众带入了一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环境之中，甚至把在场边观剧的歌星毛阿敏和郑绪岚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这个小品反映了城市生活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在人与人之间、夫妇情侣之间，以真诚相待是何等可贵，相互理解又是如此不易。它那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演播后赢得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以为是上乘佳作。观众反应也十分热烈。与此同时，各省市，如北京、辽宁、天津、黑龙江等数十家地方电视台、电台都作了转播重播，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评介，认为冯巩此一番出征小品阵地，内容独树一帜，表演很有特色，前景看好，有充分发展的广阔天地。

时隔不到三个月，见好就上的冯巩，又与“戈玲”吕丽萍联手，在第45期“综艺大观”中表演《开锁》，这个小品以中心道具——一只神秘的小箱子——为矛盾焦点，以锁的开与闭，蕴含夫妻间心扉的敞开与关闭的寓意。告诉人们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哪怕是夫妇，也允许隐私存在，让对方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小绿洲……

这次表演，冯巩大胆采用新手法，借用相声表演中的人物可以跳进跳出的灵活形式，让自己的角色与节目主持人倪萍“套瓷”，又把在场边的赵本山、毛阿敏都扯进戏中调侃。使这个小品别具一格，生动风趣，令人耳目一新且收益非浅。

冯巩演小品上了瘾，时隔仅两个月，他又和马晓晴配戏，在中央电视台文艺专栏“艺苑风景线”中推出了又一部力作《鬼子进村了》。

这个小品以夫妻对话的方式，假借神侃中国足球队而抨击旧体制，推崇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足球队近年来水平长进不大，令国人大失所望，球迷更是捶胸顿足，恨骂不迭。这种情绪自然也夹带着人们对国家体制改革缓慢迟钝的一种变相宣泄。北京电视台青年编导冯小刚大胆抓住这一现实热点，创作了《鬼子进村了》小品剧本，对制约足球发展的旧体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冯巩读过本子，觉得很有冲劲。然后征询了一些人的意见，也都说不错，但又说要慎重，别因一个小品招来一群“仇敌”。“不能把中国人克得太狠了。民族自尊心咱得保护呢。”“你在《亚运之最》里把足球队克得无地自容，这回简直是穷追猛打，不怕招恨太多吗？”冯巩对大家的劝解，心中自有把握尺度，他只对本子作极小的改动，便大胆地把它推上了屏幕。果不其然，《鬼子进村了》的演播，似投了一颗威力巨大的重磅炸弹，在普通观众中赢得一片喝采声，也有瞠目结舌而后气愤填膺的，而真正关心社会进步国家兴旺的人们则由此而感叹，而振奋，觉得解气解恨，真正能启发思索和想象。几次小品的创作和表演大获成功，冯巩已基本确立了自己在小品领域里应占有的一席之地。自从找到了“冯氏”风格的戏路，他已很有自信心，确

信在冯小刚等搞创作的朋友的协助下，完全能够不断地推出有现实冲击力且有强烈艺术感召力的小品作品。1993年夏季，冯巩和牛振华合作，推出了反映都市出租司机生活的《面的与皇冠》。这个小品是冯巩和冯小刚一起策划，共同创作的。该小品敏锐地抓住现代都市发展中出现的交通问题，从两个出租司机的邂逅对话，透示都市普通人的现实心态。冯巩和牛振华两人的表演自然流畅，对话精采诙谐，透溢出地道的京味儿。冯巩为创作和排练这个小品化了很大精力。他特意找来开“面的”和开“皇冠”车的出租车司机，把小品台词念给他们听，征询他们的意见。有思想、有才气，再加上对完善艺术一丝不苟的追求精神，正是冯巩取得成功的重要的基本原因。

《面的和皇冠》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节目中播出，使人们又增添了调侃的话题。北京的出租司机特别开心，因为是写他们真实生活和切实心态的小品，说的话就像是他们常说和想说的话，觉得特解气，特有味儿。

这几年，拍电影，拍电视，演小品，还有另一“业余爱好”——当节目主持人，加上主持筹办“艺苑风景线”，冯巩四面出击，大掷“开心炸弹”，让圈内圈外的朋友大感意外，令众多喜爱他的观众目不暇接，大饱眼福，兴奋异常。

尽管不断地“侵略”其他艺术领域，冯巩可没忘了守住自己的大本营——相声。

冯巩和牛群这一对相声搭档，依然顽强而自信地守着自己的滩头阵地。他们深知，只要有好段子，观众还是喜爱相声的。关键是要拿出好节目，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1990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长江流域各地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二是中国成功地举办了亚运会，体育健儿奋力夺得183块金牌。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筹备组的最初方案上，只有对头一件事抗涝救灾的大肆渲染，却忘了亚运会的优异成绩也该宣扬一下。

这个方案呈报到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那儿，他提议要增加反映亚运会的节目，且点了名让相声演员来表演，要热闹，要鼓舞人心。

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急急忙忙找到了冯巩、牛群，要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两人听罢，拍手称巧。因为两人原先构想要上春节联欢晚会的相声，正是要写亚运会的。不谋而合引发了创作的激情，他俩的采访表像一张简化的北京市地图。两人像旋风似的在北京城转了整整四天，采访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著名作家苏叔阳、国家体委副主任李富荣，以及其他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体育界权威人士和运动员、教练员。

然后两人闷在屋里整整三天，草成了《亚运之最》这个相声段子的初稿。

本子交上去，众人看了无不称好。主管领导爽快地下了通行令：就照这本子排好了，上！

这个浸润了冯巩、牛群许多天的辛苦和心血的相声段子，素材多、事件真、包袱足，叫得响。表演起来捧眼逗眼之间既有主动交流，又有具体交流，还有抽象交流，这题材也是众人关注的。亚运会闭幕刚几个月，运动场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人们记忆犹新。在大喜大乐的除夕夜，再让亿万观众回味一下亚运会的美妙胜境，顺应了人们的期待心理，是这个相声段子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亚运之最》果然一炮轰响，赢得了满堂喝采。在观众对整台晚会 54

个节目进行的评选中，共收到 39 万张选票，该节目获 19 万张，占选票总数的 48%，一举夺魁。1992 年春节联欢晚会，冯巩和牛群的相声《办晚会》，讽刺了不顾艺术只求捞钱的拜金主义倾向，观众鼓掌叫好。之后，在评选晚会优秀节目的 17 万张选票中，《办晚会》占了 7 万多张，再一次获相声得票总数第一。

1993 年春节文艺联欢会上，冯巩和牛群又别出心裁，拿出了一段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相声《拍卖》。

拍卖，是近年中国大陆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重新又兴起的一种市场经济的产物。这段相声以拍卖为契机，激励人们像体育运动员那样奋发拼搏。这个段子时间不长，又采用演员和观众交流上下串戏的手法，打破了原先相声表演只顾台上说、台下听的传统。这是他们的一种新尝试，借用的是现代戏剧的“打破第四堵墙”的新颖手法。

这段相声演播效果相当热闹，说相声的，听相声的，上下呼应，欢笑声迭起，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无疑，他们的成功之作又赢得了称誉。由《中国广播电视报》组织的观众评选揭晓后，《拍卖》又一次高踞榜首，获一等奖。

圈内人都知道，行不行，春节晚会上见。多少好演员等着盼着，想在这个有几亿观众，最受人们喜爱的晚会上推出自己的节目；可即使你是“大腕”演员，在预选、彩排、审查，这数道关卡上也得悬着心，而最担心的还是直播那天的观众反响！万一演砸了，那可就全栽了。

冯巩却总是那么自信地走了过来。

他自 1986 年春节晚会首次亮相后，便与这台晚会节目结下了不懈之缘。此后，他与搭档每年都会有叫得响的精采节目奉献给除夕夜辞旧迎新的亿万观众。

他拍电影也罢，电视也罢，演小品、当主持人也罢，人们只要看他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一亮相，跑不了还得公认他是个顶呱呱的相声演员！

第十二章 真诚是剑

扛袋大米上飞机，这“雪中送炭”的壮举让妻子夸奖了一番

为了拓展艺术新路，不得不迈出艰涩的一步

笑星号陶大哭，结果让牛群“抢”去了一个绝妙镜头

冯巩在已走过的人生道路上，许多人的真诚相济、帮助，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出荆棘，走向成功；在他许多次的成功表演背后，有多少人向他伸出了友情之手呵！

在家境窘困，被撵进“贫民窟”时，他遇上了韩大爷及邻里的一群热情善良的山东人；是蒋道燊老师、马季先生，还有天津市群艺馆的老师们领他踏上了艺术之路的第一级台阶；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时，又有制线厂的陈逸民书记，有沈永年老师，还有侯跃文等友人伸出的热情之手；而后他与刘伟、牛群相继成了艺术上的莫逆之交；此后又有谢添导演，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老师，在他探索新路时及时给以指教；当然，还有许多同行朋友，在各方面以真诚和友情相助。

逆境中走过来的冯巩最相信这句话：朋友的真诚友情赛过纯金！

冯巩有一句格言：“真诚像一把锋利的剑，刺到哪，哪出血。”

熟识冯巩的人都知道冯巩的朋友特多，从政界的高级领导到乡村边民，从科教界的知识分子到边防哨卡的列兵，从个体商到佛道教徒，从厂矿企业家到稚嫩的小学生……都有他的朋友。

有人问：“冯巩，你交际这么广，为朋友应酬，帮忙，不累？”

他一乐：“累啥？高兴！朋友是什么？朋友是兴奋剂，朋友是消愁素，朋友是智慧，朋友是生产力，朋友是财富……没有朋友，你会寸步难行，你信不信？反正我信这点。”

冯巩对朋友，绝不唯我是用。他讨厌那种求时堆笑而迎，转身便弃之脑后的人。他常对人说：“我真诚待人。别人怎么待我没关系。我只要求自己。”

他确是按照这条准则去做的。

李文华是一位极受观众欢迎的著名相声演员，后来不幸喉咙长有息肉，为了演出耽误了治疗，转成喉癌，不得不作了全喉切除手术，成了不能发声的“无声人”。

这对于一个相声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他不得不离开舞台，真是伤心之极。

冯巩十分敬重这位热爱艺术的老前辈。他知道光从口头上安慰无济于事。便想法替李文华找“活儿”。

1988年，冯巩筹拍《开心阿0》时，特意为李文华安置了一个不必说话的角色。李文华很感动这位后辈的好心，他不嫌角色小，每天跟着剧组到拍摄现场，除帮助冯巩作艺术指导，还手脚不歇地找零碎杂事干，拦都拦不住。

冯巩有个奇怪的绰号：人事干部。

他从自身艰难成长的体验中，深感我国人事体制上的弊端：有用人才难出头，平庸之辈却挤占着好位置不走。他的“人事干部”就当上了。因为他有朋友，有口才，还有一副热心肠。只要他认为是人才，值得推一把上去的，不论是剧组、处长、团长、局长甚至部长那儿，他都会登门去“说情”。

赵本山当初为了在中央电视台露面，很费了一番周折。这位辽宁乡间土

生土长的喜剧演员在东北闯出了名声，想走向全国，但1989年的小品《相亲》砸了。冯巩看了赵本山的演出，知道他确有才气和实力，很替他惋惜。隔了一年，又值春节晚会选节目时，他在节骨眼上拿出了《东北最红笑星赵本山》专辑录相带去了中央电视台，向有关决策者竭力举荐。结果决策人就拍了板：上赵本山。还是那个小品《相亲》，一举打响，红遍全国！

另外，如倪萍进中央电视台，牛振华、吕丽萍等人调动工作，冯巩都帮助“串”了。

举荐人才与拉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冯巩掌握一条“人的质量”大前提，恪守在教训中建立起来的座右铭：搞艺术赢得艺术，又赢得关系；搞关系丧失艺术，又丧失关系。

因为冯巩是热心肠，又有各方面的朋友，托他帮助调动、上镜头、出节目的很多。他也不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

赵保乐是冯巩自拍《开心阿0》以来，经常合作的铁哥们。他原总想上镜头演戏，冯巩看准他的优势不在表演，说服他向别处发展。1992年中央广播艺术团让冯巩筹组《艺苑风景线》专题节目。这是一个靠白手起家的棘手活儿，要想搞好，非得集聚一批志同道合，敢闯敢拼，又有才气的哥们不可。

冯巩想到了赵保乐。他善编写，又勤奋，还善于联络各方人才。冯巩就千方百计把赵保乐调进京来负责编剧工作。还把赵的妻子也调进北京。赵保乐如今在《艺苑风景线》干得很出色。

冯巩认为演员和观众应是平等的朋友关系，那种自尊自大和故意造作的亲善姿态即所谓的明星包装，都不足取。

一次，冯巩去青岛演出，两个小伙子在街上和他相遇，便十分热情地交谈起来。当两人说想看演出却买不到票，很感遗憾时，冯巩便约他们晚上开演前剧场门口见。

开演前冯巩已弄到两张票在约定点等，可等了近40分钟，两个小伙子也没来。他明白了，他俩以为冯巩说的仅仅是应酬话，哪有大明星给素不相识的小青年送票的？小伙子们想错了，他们失约了。

这类事冯巩已遇见过好多次了。

在广东某地演出之暇，冯巩到街上溜达。那座南方小城镇建筑别致，风采异常，吸引他很想四处看看，但街上没出租车。

正徘徊时，一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认出了他。热情地停下来和他攀谈。小伙子很乐意帮他，可眼前却没富余的自行车呀，若是普通熟友，搭坐在自行车衣架上就行，可这是大明星呢！

冯巩笑着问他：“你骑车技术行吗？那好，请你带我兜一圈，怎么样？”

小伙子便高兴地骑车载着他喜爱的笑星在小城镇兜起风来，一边介绍该地的风土人情。两人谈笑风生，好不快活。小伙子后来感慨地说：“冯巩，你这大明星真不错，一点架子也没有，就像很熟的朋友一样。”

冯巩“坐飞机扛大米”是圈里朋友常要笑话他的一桩事。

那是1989年初，他上辽宁演出，临要回北京，一位热情朋友硬塞给他一个双喜牌高压锅和一袋30斤优质大米。

怎么办？这让他为难了，他外出历来风风火火，轻装简行，这下多麻烦！想谢绝又怕失礼，只好收下，一再感谢。

朋友走后，他面朝大米和高压锅犯愁了。带着上飞机吧，确实累赘，而且人家也会想，这大明星也真是小家子气，连大米和锅子都要捞；不带吧，

又对不住朋友的一片真情。

想来想去，想了个折衷的办法，把高压锅送给了服务员，大米，自己带走！这东北优质大米是东北朋友的一片心，带回家去也让妻儿尝尝。

结果，他真的扛了30斤大米登机飞回了北京。当他气喘吁吁扛着米袋，拎着行装回到家门口，出来迎接他的艾慧一脸抑制不住的喜色：

“哎呀，家里正好没米，都愁没人去买呢。今儿个你怎么想得那么周到，好像会掐会算似的。也真难得呵！”

冯巩抹一把额头的汗，轻拍脑门暗叫庆幸，顺了竿儿往上爬，笑着对妻子说：“这才叫雪中送炭呢。”

广泛的社会交往是冯巩闲暇时主要内容。他有个特点，交往时总是主动热情上前，而不像某些大牌名星那样，保持一种矜持的风度，往哪一站一坐，非别人来笑迎，敬候。冯巩喜欢交往中的那种无拘无束的随意聊天，痛快喝酒，不用“您”或“先生”这类客套词，该喝酒该说笑，他总是首当其冲，毫不做作。

朋友们最喜欢和冯巩一块儿侃，觉得特爽气，开心。冯巩特有的爽直和幽默感会让大家欢笑不息。他时不时地唱几句，背几段台词，或维妙维肖地学别人的声调、动作，或来点粤语、陕西方言，天津话，逗得众人乐不可支。

冯巩爱说，得了个“话痨”的外号。他可以口惹悬河，滔滔不绝连着说一两小时不打磕儿。有时人已很疲累了，还不停地说，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在西安拍电影《站直了，别趴下》，两个多月没回北京，这天晚上10点才回到家，顾不得休息，先得找人侃一回，连打几个电话，把冯小刚、刘京几个朋友邀齐了，坐一处一直聊到凌晨3点还意犹未尽。

冯巩把聊天当乐趣，更把它当做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重要途径，在聊天中触发创作灵感，增长各方面知识，他的许多作品，如《亚运之最》、《开锁》、《我错了》等，都是在闲聊中产生出来的。

冯巩的随和大度出了名，所以他特别“结人缘”，到哪儿都有朋友，都有笑声。

有一回，他们一批歌星影星笑星去温州演出。这期间有位个体卡拉OK舞厅的老板变着法子拉明星们去玩。

他们一到舞厅便觉气氛不对，那儿什么人都有，嘈闹不已，一些阴阳怪气的酒吧歌手在台上狂歌乱舞，格调很低俗。从主持人的话中可听出，老板是有意拉明星们来为舞厅撑门面的。

这种场合令明星们如坐针毡，有人暗中提议撤走。这时老板又讪笑着，涎着脸来请他们上台表演。不识深浅的主持人还一个个地点着明星的名，怂恿场内人起哄鼓掌，要他们上台去。但没人答应，当时场内气氛尴尬极了。那个老板急得满头大汗，几乎是在央求了。

冯巩见状，蹭地一下站起来，快步上台，接过麦克风，恭敬地向大家鞠了个躬，先抖了个包袱作开场白，“各位先生小姐朋友，我是以最不会唱歌而著名的。”

下面顿时一阵笑声，气氛便缓解下来了。

他接着又说：“但我也唱上一首，为大家助助兴。”场内马上响起热烈掌声。

冯巩便唱了一曲《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嗓音不怎样韵味却十足，比那种当地的滥歌手强多了，于是赢得阵阵掌声，要再来一首。

他就放开唱了一首《雨声淅沥沥》，在掌声中叫好声中从容下台来。老板迎上去，拉着他的手，连声道：“真是感激不尽！”

回到座上，陈道明拍一下冯巩的肩膀，“老兄，你够大度的，今儿可为咱解围了……”

在处理朋友和艺术的矛盾的关系上，最棘手且引起较大风波的，便是跟刘伟分手，与牛群重组搭档的事。

时过境迁，再回头看看当时，冯巩便感慨，“当初我真有些为难了，现在看来这一步是走对了的。”

那是1988年5月，冯巩应牛群之邀，从广州电视剧拍摄现场飞抵南京参加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两人匆忙中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合作。因当时刘伟去了澳大利亚，大众电视金鹰奖揭晓专场文艺晚会邀请冯巩演出时，他又邀了牛群再次合作，反响十分热烈。此后，他们经过认真的商议，在沈阳的辽宁大厦会议室向记者们正式宣布组成新搭档。

他俩搭档，就意味着冯巩和刘伟分手，牛群与李立三拆开。著名相声演员的“裂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新闻！一时间，全国文化艺术界一片哗然，几十家报刊谈论起“裂穴”问题，电视观众和相声迷们也胡乱推测，议论纷纷。

艺术家在观众中的声誉，不仅取决于他的艺术造诣，还取决于他的人格魅力。“裂穴”发生在一个注重传统伦理的国度，出现在一个正冉冉升起的艺术界明星身上，处理不当，足以毁掉他的名声，继而断送他的艺术生命。

冯巩想了许许多多。

他和刘伟的友情已十几年了，他年长一岁，一直以兄长身份在生活上艺术上给刘伟以关照。刘伟跟他也是铁了心的。两人一起头碰头琢磨新段子，一起上舞台，一起去东北当“黑兵”，一起挨开除处分，又一块儿上北京，直到进中央广播说唱团，在春节晚会上合说《虎年说虎》，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十几年共同相处的艺术生涯中，两人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一块，欢笑和痛苦聚在一处，花的吃的不分你我，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使两家的家长们也亲热得如同“亲家”一样。

但是，对艺术的不懈探求，却使冯巩不得不早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和刘伟的合作虽已十分完美，但要想攀登艺术的更高层次，再发展，突破已成凝固模式的旧搭档，重新组合，势在必行。

这是一种痛苦的离散，也是一次冒风险的严峻考验。

冯巩终于走出了这一步。

他知道，只要是为了完成对艺术的真诚探索，只要他心海里还固存着友情的一池清波，刘伟会理解的，同仁们也会理解的，关心热爱他的观众同样会理解的。

他的抉择得到了马季先生的肯定和支持。这位相声大师当时就表态，支持冯巩和牛群的“横向优化组合”。

“这是时代潮流，不能抱残守缺，守着一些旧传统跨进新时代。以前捧逗之间讲‘死对’，是旧社会为生计所迫，‘裂穴’就等于砸人饭碗，对人不住，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相声艺术要突破旧框框，允许人才自由流动，自由组合，自由结婚还允许自由离婚呢！”

马季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关键是你们得让事实说话，用成功来证明优化组合的科学性。”

冯巩、牛群组合不久，恰逢当年7月的全国第二届专业演员“星海杯”大赛，冯巩和牛群携手联袂，以《出口成章》、《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和《灭鼠轶事》三个段子，连闯初赛、复赛和决赛三关，一举夺得金杯，品尝了新组合的第一杯成功的美酒。

此后，两人合作的几年中，连续作了《我错了》、《亚运之最》、《假话世家》、《为了孩子》、《干杯，庆功酒》、《银屏的歌》、《信不信由你》、《办晚会》、《拍卖》、《点子公司》……等20多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又相继在陕西音像出版社和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录制发行了《开心阿0·领导冒号——牛群冯巩为您献上笑与歌》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谜——牛群冯巩相声专辑》两盘由他们自己编辑、创作、演唱、演说的盒式录音磁带。前者运用电声乐队伴奏，将多种形式组织在一起，说、学、逗、唱融为一体，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揉合起来，用抒情、叙事、改词、转调、浓缩、外文演唱、方言对话等等变化多样的艺术手法，显示他俩出色的创作表演天赋；后者将四大名著中的人名地名巧扣谜底，联对工整，一句一乐，相映成趣，展露两人坚实的文学功力和娴熟的艺术技巧。这两盘磁带发行后，很受欢迎。

除此之外，他们经常在中央电视台的各种专题文艺晚会和其他晚会上表演相声，连续几年的春节晚会的相声都获得观众评选的最佳曲艺节目奖。另外，他们又各展特色，涉足影视领域，拍电影电视当节目主持人等等。如《那五》中，牛群扮演的那位故作庄重的贾骗子，表演很有分寸，与冯巩的“那五”配合得天衣无缝……

实践证明他俩的优化组合是成功的，已被广大观众所接受，很受欢迎。冯巩和牛群这对相声搭档在目前无疑是国内最佳搭档之一。

他们也曾推心置腹地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是不是就一直搭档下去了？结论是：如果艺术探索上发生停滞和严重分歧，就分手。但朋友依旧是朋友，友情不变，追求艺术高峰的决心不变。

友情是什么？艺术家的友情又是什么？

友情是挚友间美好的情感的交织，是平等而真诚的爱的相互奉献，它是无私的，也是无形的，但却能让奉献者们感应；而艺术家的友情似乎有些不同，更多的来自那许许多多喜爱你的艺术的不知名不知姓的热心观众，你唯一能偿还这种浩大无际的友情的，只能是你认真投入的艺术表现，一次又一次地予以报答，但你会觉得总也偿还不尽。

冯巩是这么想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但有一回，他却未能做好。因此，这位自懂事后便不知流泪是啥滋味的高大汉子，号陶大哭了。

那是1991年5月。冯巩接到参加中央艺术团赴西藏演出的任务。这是一次高规格的演出活动，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中央派出以李铁映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去庆贺，随去的艺术团自然都是国家一流的艺术家的。

不巧那一阵冯巩过分劳累，父亲病重入院，要去探守，儿子发高烧也叫着爸爸……他连续几天又是忙工作，又是跑家中，北京、天津来回奔波，终于病了，头昏脑胀，低烧不退。

临行前牛群见他那模样很替他担忧，“你这样不能走！拉萨海拔3700多米，氧气比北京少33%，发低烧的身体去那儿很危险。不行，我替你告假。再说你家老爷子病重，还有儿子发高烧……”

“不，牛哥，我没事，我能挺过去的。”冯巩很珍惜这次演出。“这许多年全国各地到处演出，唯独没给西藏的观众演过一回，咱得去！”

5月15日，冯巩从守候病中父亲的天津某医院披星戴月地赶回北京，次日凌晨5时顶着晨星奔往首都机场。7时正，他和中央艺术团的40多位团员在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的率领下，登上飞往拉萨的波音737客机。

但还没到拉萨，病魔就开始骚扰他了。在机舱里他脸色很难看，一量体温。37.8。一旁的赵本山惊道：“我的妈，这高原喘气都欠劲儿，你发高烧可咋办？”

到了拉萨，情况更不妙，一量体温上升到38.7了！大伙都急了。恰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丹增一行来艺术团下榻的宾馆看望大家，得悉冯巩患病，立即与医院联系。然后热地又亲自护送冯巩到西藏最好的一家医院，住进高级病房。这时冯巩高烧已达39.5了。

大夫急忙给他打点滴。不料又出现药物反应，心动过速，浑身发冷，颤抖不止。

看这情形，热地即令院长调来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要求24小时监护治疗。自治区党委又专派一名干事协同医生护士一道，日夜守护。热地书记回家还惦着病中的艺术家，又专程送了柠檬汁到医院给冯巩喝。

但是，三天治疗下来，他仍是高烧不退。

18日，李铁映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后，听说冯巩病重，立即派秘书和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到医院探望，叮嘱医院一定要全力救护，确保冯巩的安全。

艺术团的朋友哥们更多，牛群、赵本山、成方圆等人结伴到医院看他，见他烧得不省人事，脸色惨白，心里阵阵酸楚，走出病房就哭了。几个人去找团长陈昌本。牛群说：“陈部长，冯巩高烧不退，这样拖下去很危险，能不能把他送回去……”

一旁赵本山憋不住了，噗地在陈部长面前跪下了，流着泪说：“我求您了，让他回去吧！冯巩才34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得子呵……他父亲病危，孩子也小……”

陈昌本忙劝慰他们别急，马上去商量该怎样采取医疗措施。

幸好医生们在常规行法无效的情况下，决定使用大剂量的“先锋霉素”，高烧总算退下去了，21日夜间，体温降到37.6。

才从高烧迷糊中悠悠清醒过来的冯巩，想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演出安排情况。当听说23日的大庆日文艺晚会上准备让牛群说单口相声时，他急了，“不行，我得上台说相声！”

但领导和同志们见他身那体么虚弱，还有低烧，坚决不同意他上台。冯巩求牛群去向领导请战，不成。他就自己去找几位主要领导，恳切地说：“请理解我的心情。我来西藏就是演出的，可一个节目都不上，光在医院养着，我没脸向西藏观众交待呀，一辈子都会遗憾的……我不怕有什么后遗症，85年上老山前线慰问，我连遗言都写好留下了……”

领导们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答应了。

这天晚上，拉萨体育馆座无虚席，有8000多观众来观看中央艺术团的精采演出。冯巩在两位大夫的监护下，带着氧气瓶出了医院，来到演出地点。

等主持人报幕，由冯巩和牛群的表演相声节目时，一直吸着氧候场的冯巩，果敢地拔掉了吸氧管，蹭地站起来，如往常一样，满脸笑容，抖擞精神

走上了舞台。

场内掌声骤起，主持人不失时机地介绍：冯巩是带病来拉萨的。他为了表达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感情，不顾病重，从医院带着氧气瓶赶来为大家表演。台下顿时暴发了一阵热烈掌声。

冯巩精神饱满地和牛群说了《朋友，欢迎您》，又在观众的热情要求下，表演了一段《出口成章》，前后演了17分钟。

退向后台时，他只觉脑门发胀，胸腔发闷，气喘吁吁，脚下发软，赶紧套上氧气袋，一试脉搏，好家伙，心跳126次！大夫急坏了，下了命令：“咱们赶紧回医院！”

5月27日，中央艺术团将赴日喀则市等地向基层藏族群众慰问演出。鉴于冯巩的身体状况，决定他先行回京。

牛群、赵本山等哥们和艺术团领导到医院向冯巩辞行。

冯巩躺在床上，望着欢蹦乱跳的哥们，心里禁不住阵阵酸涩，失落、委屈、沮丧、伤心、羡慕……真是百感莫辨。当大伙儿起身和他告别，赵本山用他那特有的憨厚声说：“我们走了，老哥，你明天回北京，多保重。”

这一说，冯巩终于抑制不住，呜哇一声就哭出来了。

大伙围过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安慰他：咱们就回来的，用不了多久就聚在北京了。成方圆像哄孩子似的，“我明天不也回去吗？我陪着你去，还怕孤单吗？”

冯巩却越哭越伤心，“我这些年……哪这么窝囊过……上黑龙江，冰天雪地也没事……上灾区，上共青城……上老山前线、新疆二十一基地，还有……哪，哪次和大伙分开过……”

众人看他痛哭不已的样子，不知该怎么再劝。牛群灵机一动，拿起相机，对准冯巩“咔咔”就按了两下快门，笑着说：“嘿嘿，同志们，这真是千载难逢的绝好镜头呵，题目就叫‘笑星哭了’，拿去什么摄影节准获大奖！”大伙儿都乐了。

牛群又亲昵地摸着冯巩的头，“我说巩弟呀，今儿怎么像幼儿园小弟弟啦？牛哥还没见过你的眼泪是什么颜色的呢，该不是整天打点滴身上水分太多打眼眶里冒出来了吧……”逗得冯巩破涕为笑。

这以后，冯巩“哭别”的故事就在朋友圈里流传开了。牛群拍的那张“笑星哭了”果然成了他的得意之作，在中央电视台的《正大剧场》向全国人民“亮相”，在一次摄影赛上还拿了奖。

第十三章 凡人家事

冯父说：你们有出息，冯家有光彩，我死无憾事
作为名人妻子，艾慧爱丈夫，也怨丈夫，最后还是认命了
五岁的小诚诚连挫四位棋坛老将，有志要做谢军第二

关于“家”的注释，没有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赋予它涵意更多、更复杂的了。

家，首先是一个很小的社会单元，又由它们组合成一个个村寨，一个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由家而国，是中国数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立论支柱。“国之不存，何以言家？”“无家即无国”，这是对国与家二者共存共荣的辩证关系之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激励有志之士奋发向上的基本信条……

冯家，称得上是中国极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族。从 1405 年明永乐年间始祖冯祿率全家数十口自安徽奉命北迁，定居于河北河间县诗经村开始，就定了冯家将世代遵循“耕读”的传统文化原则，守着一方家园，一面踏踏实实地从事农家耕作，繁衍后代，一面择后人优秀者勤读诗书，蓄积才识，以供国家选用，为国效力，为家争光。

近百余年来，冯氏家族从十三世孙冯国璋起，按“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字排辈，到冯巩之子冯开诚，已是第五代了。尽管世事沧桑，风云万变，冯家依然保存着一些良好的家风。

冯家素来重孝悌，重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孝敬长辈；更鼓励儿女胸有大志，勤奋好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此良好家风至今犹存。

冯国璋年幼时受过苦，因其父颓废潦倒，致使家境败落，连儿子读书也供养不起。冯国璋于贫困中发愤向上，以博个出人头地，封疆受爵，重振冯氏门庭，再兴冯氏家风。所以他对儿女们管束非常严，即使已身居高位，富有家产，依然对儿孙们的开销支用管得很紧。

当年冯家遇 15 岁进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身为总办的冯国璋对这个寄予厚望的儿子从不给予特殊照顾，不单独召见，也不去探视，让儿子与普通学员同住简陋的集体宿舍，过艰苦的军营式生活，吃清汤寡水的饭菜。后来冯家遇出国留学，在异国异乡的全部开支，也仅有清政府给予的一点补助金。冯国璋不给分文，认为求学在外，只为求知识长学问，而身上钱多了只会多学些坏毛病，甚至走上歧途，葬送前程。

冯家最厌恶最瞧不起的是“学坏”。当年冯国璋在南京当都督，很有威望。其长孙冯海岱年方 20，却走上了邪路，借着祖父的威名在石头城横吃白拿，放荡不羁。此事让冯国璋知悉后，即命人把长孙抓回府来，问清罪过，当场痛责一顿，而后断然下令：逐出家门，永不召回！

从此冯家再没出过类似的不肖子孙。

冯巩出生时，祖父冯家遇已经去世。但他对这位曾留学德国，一心报效国家却终生郁郁不得展其宏愿的祖父，怀有一种特别敬崇的感情。

冯巩小时候听父辈们讲起祖父的轶事，特有兴趣，特感亲切。祖父怎样跟德皇威廉二世言词顶撞，因何为买外国油漆而发奋办油漆厂，如何去赴宴，用一口流利标准的柏林口音的德语与德国公使谈古论今，纵横天下，而回家后却长吁短叹，久久未寐……这些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了。

祖父那一辈人不容易呵，生在乱世，夹在狭缝中寻求着民族工业的生存之途。就是父亲冯海岗这辈人，正当年轻有为时也因政治运动风云变幻而多

灾多难，命运乖戾，想要奋发报国却已年迈力衰了。冯巩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备感珍惜，拼命地干，似乎身上累积着上两辈人未尽的重任。

每年清明节，冯巩再忙也要抽半天一天带了儿子开诚去天津，到祖父坟前祭扫一回，拔拔草，添点土，向长眠九泉的老人默默行礼，说几句话。

自古忠孝两难全。

冯巩这个出名的孝子，这些年实在太忙，总难得有较多的时间去看望陪伴年迈的父母，为此，他心里觉得十分歉疚。

他父母都已年愈古稀，体弱多病，父亲几年前患了尿毒症，而今每星期都得送到医院去透析治疗。身体折腾得十分虚弱，曾几次出现病危症状。幸亏家中哥哥们守护得紧，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父亲病危时，冯巩几乎都在外地演出或拍电影电视，未能及时赶回来守护，心里颇觉愧对老人家。1992年6月29日，冯巩在西安拍电影《站直了，别趴下》，因劳累过度，患了急性扁桃腺炎，高烧连续四天不退。在烧得神志迷糊时，忽然收到天津来的电报，父亲因尿毒症并发心脏病，在医院急救，生命垂危，希火速赶回，迟了恐怕见不着最后一面了。冯巩真是心急如焚，真想拔了手臂上的点滴注射针头，立马赶回去，要是真见不着父亲这最后一面，可就要自责一辈子了！可他实在不能走呵，因他生病，拍摄组已经等了四天了，等一天就是几千上万元经费的损失，还有别的演职员的宝贵时间，能离去吗？

他红着眼圈给家里通电话，拜望哥哥们好好照料父亲，代他尽一份孝心，他实在是无法脱身回天津……过了两天，病仍未痊愈的冯巩咬咬牙，坚持上拍摄现场，赶拍完了镜头，然后归心似箭，急急返家，赶去探望病情稍有缓解的老父亲。他走近病床，歉疚地抚摸着父亲瘦骨嶙峋的手，哽咽着问：“爸，好些了吧？”

父亲静静地望着儿子，“还好，我又活过来了，没事了。”

冯巩说：“前几天我没能赶回来，这次就在医院陪您了。”

父亲轻轻一摇头，“你忙事儿去吧。我知道，你现在是身不由己了，你好好干事儿，只要你们干好了，有出息，咱冯家有了光彩，我就心足了，死无憾事了……”

冯巩的眼圈又湿了。

他常这么对采访的记者朋友说：“在艺术上我有了点成绩，也付出了许多，特别是家庭方面。对父母，我不是个能尽孝心的好儿子；对妻子，我是不称职的丈夫；对儿子，我也欠着做父亲应尽的义务……”

妻子艾慧是他初中时的同学，那时两人都在校宣传队。一起排节目经常照面，彼此多望了几眼，那心思就活了。一个聪明活泼，一个漂亮勤快，都觉得对方好，有吸引力。先是借书，冯巩主动出击，勤借勤还，理由充足；接着艾慧也请他帮着挑买手风琴，顺道就去一趟冯巩家，顺手就帮着干点家务活。“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少男少女的情谊从此就种下了种子。

后来冯巩上了纺织学校，两人也会“偶然”碰面，谈些学校读书的趣事。冯巩决定去当“黑兵”，又征询艾慧的意见。“你说去好，还是不去好？”

艾慧心里并不希望他走得老远地去当兵吃苦，准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可她听懂了冯巩去意已定，便依着他，“你喜欢做的事就去做好了，别犹豫。”

两年后，冯巩从部队退回来，重新进了工厂。一对相恋多年却从不提一个“爱”字的年轻人终于把恋情摆上了两家的议事日程。

那年头，“红五类”与“黑五类”结合，可得费一番周折。艾慧母亲对

女儿的抉择全力支持，冯巩的二哥冯达与艾慧姐姐熟悉，又去做工作，艾慧则宣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冯巩哪点不好？他家的事碍他什么啦？”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结合了。

事物总是矛盾着的。艾慧爱冯巩，当初就是看他聪明，有才气有志向，相信他终究会成为一个好演员的。可没想到，冯巩一下子就成了著名的人物，成了整月整年在外演出，拍电影电视，忙着各种应酬的大忙人，把一个家全推给了妻子。作为名人的妻子，艾慧饱尝了家庭操劳的艰辛和孤独的苦涩。1986年，冯巩费老劲总算把妻子调到北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艾慧却发觉，团聚却总是形式上的。在北京住着，因冯巩经常外出演出，跟两地分居并没什么两样，在天津还有家人帮忙呢，这儿就只剩自己一双手了。

那几年真苦，艾慧住的是排练厅旁临时隔开的一间房，白天隔壁鼓乐齐鸣，歌声嘹亮，晚上整个办公室黑灯瞎火，静得吓人。她只身一人带个孩子在—幢空楼里，常常整夜通宵吓得睡不着，她还得每天起早摸黑上班，路上来回得骑三个小时。还有孩子，家务。孩子病了送医院，抱得手都快折了也没人替一把，她只有暗自流泪。

一次，冯巩去广州拍戏了。儿子发高烧四天没退，迷迷糊糊醒过来就叫：“妈妈，我想爸爸，妈妈，我想爸爸……”

艾慧忙哄孩子，“诚诚，爸爸在呢，我给你找来好吗？”

她找来的是冯巩拍的电视录相片，把那录相一放，里面有冯巩的笑脸，小诚诚看清了。“是爸爸……我看见爸爸了……妈妈，瞧，爸爸看着我在笑呢……”

艾慧搂着孩子，眼泪止不住地一串串流下来。

她怨过，也吵过，可回头一想，冯巩在外面是奔事业，也在吃苦受累，也够辛苦了，得体谅他。冯巩这几年干得出色，有成就，她脸上也有光彩，也抑不住的高兴。

艾慧想通了，“认命”了。她尽力操持着这个家，照管好儿子，也帮丈夫做些事。冯巩每次回家，她就把东西收拾整理好；外出父替他备好衣裤和用物。各地报刊关于冯巩的消息文章，她注意收集起来。按年月装订成册。见冯巩外出有时酒后还开车，她揪着心怕他出事，就下决心学会了开车，负责接送丈夫……

妻子的辛苦劳累，冯巩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他只能尽可能地想法弥补一些缺憾。外出时不能见面，他跟家中电话不断，在外遇见艾慧喜欢的东西，他就买回家去，有时也借拍戏的空隙，领妻儿到海边或街市走走。但这种机会毕竟太少了。艾慧病了几天，冯巩好不容易才赶回来，见妻子烧得眼里布满血丝，十分心痛。等她稍好些，吃了药，就陪着去公园静巷散步。才走出门没几步，电话又追来了，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剧组急需他去研究演出事项。众人都等着呢！

他为难极了，望一眼疲惫的妻子，艾慧轻推他一把，“你去吧，我一个人散步没关系的，我常这样独自走的，习惯了。”

对妻子，冯巩总是有种负疚感，熬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呵，何况身边还拖带者一个儿子。1984年7月艾慧生孩子时难产，需剖腹，冯巩接到加急电报时，正随马季老师在上海参加“消夏文艺晚会”。那是他首次参加全国知名艺林高手联袂献艺的大型演出活动。就在当晚要演的关口，电报来了，他为难极了，马季见状就劝他回去。他也真想立即飞回妻子身边，迎接做父亲

的辉煌一刻，可是，节目已经排定，观众都要进场了，能在此时打乱演出进程，离开那么多热心观众，丢下搭档只顾忙自己的家事去吗？

他未能感受儿子降生的那个痛苦而又幸福的时刻。当他演出完毕匆匆赶回妻子身边，抱起九斤重的白白胖胖的儿子，顿时喜悦和内疚交织而生。

他爱儿子。但总也抽不出太多时间陪儿子玩。幼时的诚诚常常很孤独，爸爸外出演出了，妈妈也早出晚归地上班，只有姥姥在，也得去买菜做饭洗衣服。他就一个人呆着，安静地玩小玩具、积木、拼画板块、小酒杯小勺之类的。稍大些，就看电视动画片，看小人书，特爱看少儿节目“七巧板”，听鞠萍姐姐讲故事。

大概因为这样独处久了，小诚诚的性格就有些孤僻，似乎找不出一丝父亲身上那种淘气活泼习性的遗传。

这是冯家的第五代属“开”字辈的孩子。可不能放弃培养呵。冯巩有这种家族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看儿子好静，就花了一笔钱买来一架星海牌钢琴，又请了老师，教诚诚弹琴。可儿子一上钢琴座就发呆，不想弹。

冯巩又想，儿子喜欢看动画片小人书，对画画一定感兴趣，就买来绘画用品，又给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来当家庭教师。诚诚起先还敷衍了一阵，后来又烦了，听妈妈说要去老师家学画，心里就别扭，满脸不痛快，这样没多久，画也不学了。

冯巩暗暗发急，怎么，我的儿子竟会对艺术毫无兴趣？那他以后能干啥？

有一回，诚诚看见姥姥和姥爷下中国象棋，他竟看得目不转睛，一动不动。姥姥看他那入神模样，就乐呵呵地指点他，怎么走象走马，怎样对杀输赢。奇怪，他一听就懂了，没几天就能跟姥爷对练五岁时，诚诚做完小手术后去天津奶奶家住了一段时间。这真如鱼得水了。冯巩一家都是棋类爱好者，大哥冯信年少时获得过天津市中学生国际象棋的亚军。二哥冯达是天津业余棋手中的佼佼者，受聘为河北区少年宫国际象棋教练，为国家一级象棋裁判。冯家每逢闲暇日，大人孩子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聚一块儿在黑白方格棋盘上厮杀一番。这可让诚诚大开了眼界，先是一旁看个不够，而后就跟伯伯哥哥们对起阵来，那认真劲儿，真没说的了。

那段日子，奶奶和二伯冯达天天领他去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的地下棋室。这也是20年前冯巩兄弟们常去的地方。

棋室里有不少人下棋，诚诚有一回站着看四个老人下棋，连着看了四天，特感兴趣。这小家伙专心致志的神态引起了老人们的兴趣。

“小朋友，你也爱下棋？”

诚诚点点头。

“会下吗？”

又点点头，“会一点。”

老人更来了兴趣，“那咱们下一盘，行吗？”

“行！”

结果，第一位老人很快就输，第二个又上，也败下阵来，一会儿，四位老人都败在了诚诚手下，老人们摇头晃脑，惊叹不已。

“嘿嘿，神了，这小家伙……真神了！”诚诚坐着，不吭声，脸上只一丝笑意。冯达走来，听说侄儿赢了棋，也挺高兴，给诚诚买了雪糕，以示鼓励。后来冯达下班回家就教诚诚下棋。围棋、跳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都教。诚诚学棋很快，尤其对国际象棋特感兴趣，学得更快。

冯巩得知后，不禁连连感叹“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古话的哲理了。总说儿子不像我，看来不对，爱好国际象棋这一点可像极了。他请了北京棋院的国家级教练张连成辅导儿子下棋。艾慧每周都带儿子去张老师家学棋。诚诚长进很快，1989年，他获得了北京“智环杯”学龄前组第三名，1990年获北京“天坛杯”少儿棋类赛国际象棋男乙组第六名。

可他也不是“常胜将军”，1989年冬参加比赛，第二盘就输了。没能参加复赛，回家后对妈妈说：“我下回非拿名次不可！”这股犟劲和好胜心，又像冯巩了。后来他果然获奖了。诚诚上学了，读书成绩很好，可对下棋的兴趣也不减，放学后，别人玩，他就找同学下棋，有时吃饭时还捧着棋书不放。冯巩从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执著学相声的影子。当然，如今的孩子外境条件好多了。再没有“家庭出身问题”的忧虑，不必担心学习费用的来源，还有最好的老师教，有父母和别的许多长辈的关怀爱护。

冯家的第五代孩子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在如此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中，他们也必然会有更好更新的创举，超越前辈，为他们的冯氏家族增添光彩。

第十四章 真诚的寄言

一次涉猎面广泛的对话

谈相声的现状与发展，艺术巅峰期的感受

谈金钱的二分法，人与钱的关系

谈出国和民族自尊心，以及与前辈们的情感延连

1993年，农历癸酉年，是冯巩的本命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30几年过去了，那个曾是“不准出生的孩子”，那个爱唱爱笑，爱玩爱闹的少年，已在人生旅途中翻山越滩，风风雨雨地走到了成熟的季节，成了一个海内外知名的相声演员，一位有深邃思想和独特艺术造诣的喜剧奇才。

36岁的冯巩，如今可谓是“功成名就”，“树大招风”了。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会员……还有许多社会兼职、荣誉称号等等。

然而，对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艺术家来说，已有的成就和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他的目光总是朝向前方，面向未来。未来必将更辉煌。

36岁，对冯巩来说，是走向辉煌时代的新起点，人生的金矿，才打开探取富矿层的一截通道。今后的路更长，更有意义，也更难！

在一个难得的清静环境中，本书作者和冯巩有过一番长谈。

作者：你从1972年学说相声至今已有20多年，独立创作和共同创作了相声段子近70个，演出有3000多场，应该说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如今有什么体会？

冯巩：我以为相声的本质属作是生活，而不是技巧。说、学、逗、唱，这些仅是相声的表现手段，是载体，而非相声的全部，更不是本质，相声演员如果只在说、学、逗、唱上死下工夫大做文章，忽视从生活中去发现和提炼，就只能导致艺术魅力的衰退。

相声艺术是为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服务的，而观众的心理需要是多层次的并且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反映生活，相声艺术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才能满足观众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譬如1993年5月23日文艺晚会，我和牛群说的《我错了》，反响很大。《我错了》好就好在有生活，触动了社会的某种敏感点兴奋点。如果没有生活，只凭说、学、逗、唱玩技巧是绝不可能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反响的。

作者：现在不少人担忧相声的发展前景，你对此有何想法？你打算怎么探索新路子？

冯巩：现代生活趋向于快节奏，这一点相声必须适应。在台上我有这样的感觉，几句话不抖“包袱”，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就坐不住。有的相声界朋友对此持不同看法，总强调自己是哪门哪派的，是正宗，保持了传统风格的。我认为，艺术上可以有阳春白雪，但应避免孤芳自赏，一段相声说下来，掌声寥寥，这总不行吧？譬如京剧，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艺术精华，是国宝！可如今绝大多数青年人不爱看，内容陈旧，一句唱腔拖老长，慢慢悠悠的，失去了青年观众就意味着这门艺术前景暗淡，就须探索新路。

我以为，今后相声还应坚持艺术上的创新。我在捧逗结合、影视结合、说与表演结合等方面做了些尝试，有过挫折，也尝到了甜头。相声不能有固

定的模式，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创造新形式新方法。相声艺术也该是一条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路子。开始是“山是山，水是水”，然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最后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了。不过此山此水已非最初之山水了。这是前辈艺术家说的，极有哲理。

作者：你走相声与影视结合的路子，取得了很好效果，但也有人认为这有碍于你集中精力探索发展相声，你怎么看？

冯巩：我的观点在许多场合说了无数遍了。坚持做一个好相声演员这点我绝不动摇，但我还不忘陆游那句古语：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要通过学习借鉴兄弟艺术的长处发展相声。程之、于飞可以说相声，陈佩斯可以用相声表演小品，相声演员为什么不能上银幕上电视？这说到底是个观念问题。今后我不会放弃影视表演的，有好的片约，我还会去演。当然，精力上的合理调配，扬长避短等技术性问题值得注意。

搞艺术我觉得应有这条原则：宁要不完善的新，不要完善的旧。新的内容和形式，开始总是不那么完善美满。但它有生命力，任是百般阻压也要破土而出，生枝长叶，开花结果的。相声事业应该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发展起来，而每一代人又担负着继承和创新的双重责任。继承是为了创新，而不是守旧、抱残守缺。

相声目前陷于困境，有多重原因。相声队伍自身固然也有问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现行体制的严重束缚。许多社会需要，观众欢迎的好段子出不来，一审查就被“枪毙”。相声演员后备力量薄弱，偌大个中国，仅天津北方曲艺学校中专文化部有个相声专业，师资及教学条件也不理想，相声应打破现在的小生产方式，朝社会化大生产跃进。现在只有相声还在自编自导自演，这种小生产要打破，要建立专业创作队伍和演员队伍，实行导演制，还应有理论指导，尝试推行优化组合、淘汰竞争机制等等。我曾几次向有关领导提出自己的设想。但要兑现很难。

作者：人们普遍认为你现在正处在艺术的巅峰期。你自己觉得这种势头能保持多久？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设计？

冯巩：人贵有自知之明。若说我处在艺术的巅峰期，能领风骚，有几年就很知足了。甭想总站在潮头前面，要让更多的新人出来。我当初能闯出路来，也是靠许多好老师好朋友，在各个十字路口拉扯我，如蒋道桑、马季、谢添、沈永年等老师，中国广播说唱团、铁路文工团，还有天津群艺馆和天津制线厂的一些老师、同行和领导，还有侯跃文、刘伟、牛群、赵保乐、冯小刚等好友，有许多许多人。我早就想过，也早已这样做了，我得同样帮助别人出来，尤其是那些有艺术才华却缺乏机遇的人。

我还得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艺术探索之路。不管在巅峰还是衰落朗。在坚守相声阵地的同时，还要拍有自己独特艺术建树的影视作品，也要演小品和当节目主持人。广告也是一门艺术，国外有不少人成了广告明星，这是现代艺术的新门类。我也要试试。

说句心里话，我很想再读书。社会发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较深的艺术理论功底，很难接受时代的挑战。和牛群去“中戏”学了一年收益颇大，毕业时我就对老师说以后再来。可目前不大可能，因为观众需要我，社会不断向我索取新的好的作品。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我会再跨进校门求知深造的。

作者：你对文艺界现状怎么看？对文艺界改革有设想和建议吗？

冯巩：我曾随全国青联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在日本了解了艺术界的有关情况。后来有机会参加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主持的一次党外人士谈改革会议。我在会上说了半个多小时。我主张对现行文艺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三种类型的文化机制。

第一种叫国家文化，或称作“博物馆”文化，由国家管理，给予资助和保护，如京剧、话剧、交响乐团等。这是高雅的艺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艺术精萃和民族特色。

第二种叫行业或企业文化。由各行业或企业与文艺团体联合，实行股份制，通过行业或企业，走市场文化之路。在日本、台湾及新加坡都普遍这么做。我国大部分文艺表演团体都可以这样办。

第三种是个体文化。由个人来办文化企业，如珠海就有个私营影视业公司；还有一大批个体演职员，如申军谊、马晓晴、盖丽丽、解晓东、那英、韦唯等，叫做“文化个体户”，他们自由驰骋在艺术领域，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我的建议很受主办座谈会的领导重视，在呈报中央的简报上选登了我的发言。

我们中广艺术团近年已试图改革了。搞“艺苑风景线”也算一个大行动，但弄了半年没成，团长找我挑头干。我下了大力，搭班子，拉赞助，搞协调，两个星期就开播了第一期，以后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固定节目。不知情的人看主办单位是中央电视台、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广播学院，以为有雄厚实力和人力，其实最初也就是张晓海、赵保乐、冯小刚，我们几个人，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里租了两间房，没黑没夜地干，没要国家一分钱。全部包下了。大家齐心协力就办成了，现在这个专题节目也算有点名气了。这就是改革，创新。

作者：谈谈你的金钱观好吗？

冯巩：行，现在人人都爱谈钱，咱也不能脱俗呵。我曾读过叔本华的《论财产》，好像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金钱就其本身而言绝对是善的。因为它具体地满足了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我赞成这话，钱是财富的代表，幸福的保障，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如今社会奔着钱去，不是坏事，是好兆头。

钱好不好？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你没钱就像一个灰孙子，没钱就证明你没社会价值，当然这前提是，钱必须是靠真本事走正道攒的。不能贪时而忘了王法，忘了基本的做人准则。社会上这种反面事例很多。

我爱钱。有钱我就有较好的生活，就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这等于延长了有效生命！

但我更爱比钱更好的东西：艺术、真理、儿子、朋友、父母、良心、诚实……那都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我妈常对我唠叨，说你的艺术青春不会太长，趁年轻红火时多攒几个钱，以防老来忧愁。我说咱眼睛不能盯着钱。我得把精力放在艺术追求上。这才是年轻时最要紧抓住不放的。我拍电影电视，还有演小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从经济价值上算，可以说是“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的。可我乐意往这方面投资，因为这是有意义的艺术追求。

另外，组织上和朋友们嘱咐的事，少钱，没钱也干。这些年来，义务演出了多少场已记不清了。单是“六一”为儿童义演就不下20次。还有社会福利、赈灾、重大节日等等的义演公演。最可恨的是那种借我名义捞钱的。石家庄和兰州某单位举办演出，既没通知我，也没邀请我，就擅自打上我的名

字做广告，目的是借名捞钱。我对记者说，观众不知内情，到时以为我失约拒演，会骂我架子大，贪财，多冤枉！我让记者公开内情，告诉河北和甘肃人民，要我给故乡人演出，随叫随到，千万别上那种贪财人的当！

作者：现在艺术界不少人都去国外淘金，你想没想过到外面去发展发展，冯巩：我父亲和母亲刘家都有不少亲戚在海外，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香港地区、台湾等，都有。确有邀我出去的。可我一直没动过这种心思。

从内心深处想，我这人骨子里的民族自尊心特强。恐怕是祖上遗传的吧。本世纪初，我祖父到德国留学，因德皇威廉二世问他是不是日本人，把他气得够呛，回国后就发誓要搞民族工业建油漆厂。别人留洋回来喜欢炫耀自己洋派头，西装革履，他却总穿长衫布鞋，让儿女们自幼读四书五经，而且不允许儿女出国留学。这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是骨气，国穷受人欺，咱中国人齐心协力把国家建好了，就有骨气有志气又神气了！

别人出不出去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的艺术生命的根在中国，我这棵苗只有扎在家乡的土地上才能长得好，才有指望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作者：最后一个问题。你作为冯国璋的曾孙，冯家的后裔，这些年来坎坎坷坷，有什么很深的难以忘却的经历和感受？

冯巩：这问题就复杂了。我出生时祖父已去世几年了。但父母每年领我们去给他老人家扫墓，总要说些祖父的故事。所以我自小便十分敬崇他，因为他是中国有骨气有志气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我想以后定要好好读书，也学得一肚子知识，干一番事业。可我上学时就明白根本就轮不到我上大学，让我去纺织厂当钳工算是最高待遇了。我的哥哥姐姐都只能下放劳动，吃尽苦头。

最痛苦的记忆是当黑兵退回天津，又让工厂开除那一阵。我真感到没出路了，真不想再说相声了。心里那么苦，哪里还笑得起来？过去的事我很少再去想它，现在情况变好了，我们冯家人有出息有才能的不少。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趁着好年景，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多出力，多贡献。前辈人没完成的夙愿，我们后人接着干。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也都会这么想，这么做的。

写到这里，关于一个艺术家及其家族的一些故事，暂时该画上一个休止符号了。

中国，正处在本世纪或者说是数百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机遇的大门正向中华民族敞开，就等着你怎么迈步，怎么走了。

中国需要无数个有志气有才能的优秀分子挺胸踏步走在前列，需要 12 亿人同心协力，共振强国伟业。

冯巩和冯家的人不少人走在了这支浩荡大军的前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倏忽而逝，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句，今天依然可作为每个中国人的座右铭。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前景无限光明，但前面仍须跋涉许多风雨旅程，过去的成就仅仅是小小的起步。

作为一个已有不少成功记录获得很高荣誉的青年艺术家，冯巩今后的路还很长，还要呕心沥血，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奏出生命的更加辉煌乐章。

